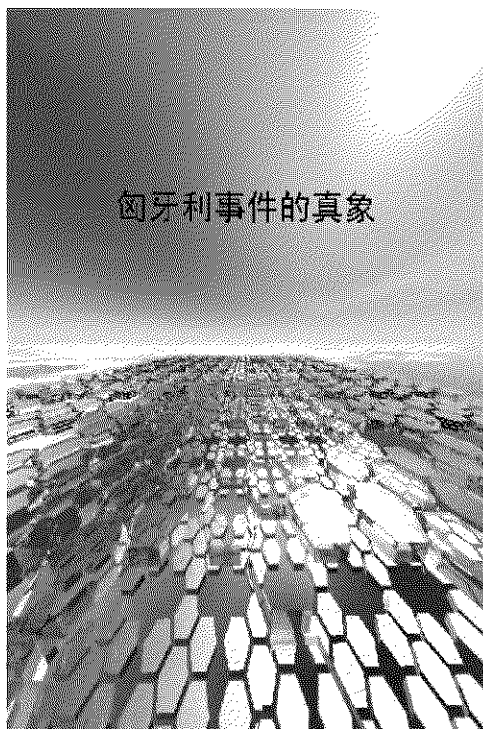


匈牙利事件的真相



0831i

230(37)

3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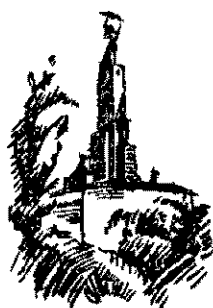
匈牙利事件的眞象

B. 扎哈尔琴柯

Ю. 波波夫 著

A. 斯达罗杜伯

刘玉鸣 于浩成 译



群众出版社

1957年10月

內 容 介 紹

“匈牙利事件”曾一时成为全世界注意的中心。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势力以及他們的走卒們圍繞这一事件，制造、散布了大量的謠言，至今还在那里狂吠不已。本書作者通过当时各报刊可报导材料的研究和实地調查訪問，有力地揭示了匈牙利事件的真相。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內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相互勾結，利用人民內部矛盾进行排擠离間、兴风作浪，制造出来的反革命暴乱。本書除告訴讀者，必須对帝国主义陰謀提高警惕外，也說明在社会主义陣營各國的国际主义和結偉大力量面前，任何反动陰謀都要遭到可耻的失敗。

匈 牙 利 事 件 的 真 象

B. 札哈尔琴科

Ю. 波 茨 夫 著

A. 斯达罗杜伯

刘玉鳴 于浩成 譯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行書刊印版出管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32开（总）24（文）19. 开本787×1092 1/32印張4+

1957年10月第1版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87,000 印数30,001~27,000册

定价（6）0.42元

作 者 的 話

不久以前，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一个位于欧洲中部，有着 950 万人口的不大的国家吸引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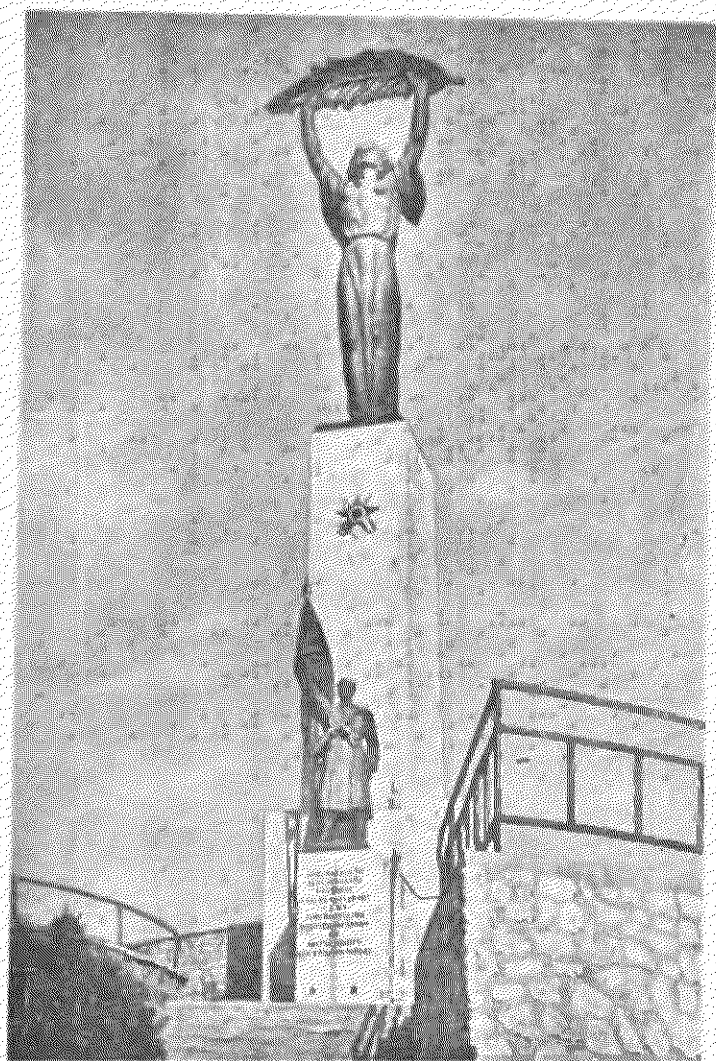
关于匈牙利，人們写了許多文章談論它，对它的命运人們进行过爭論，而且至今还在繼續不休地爭論着。

1956年10—11月，在这个国家的領土上所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不仅威胁到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設，而且威胁到欧洲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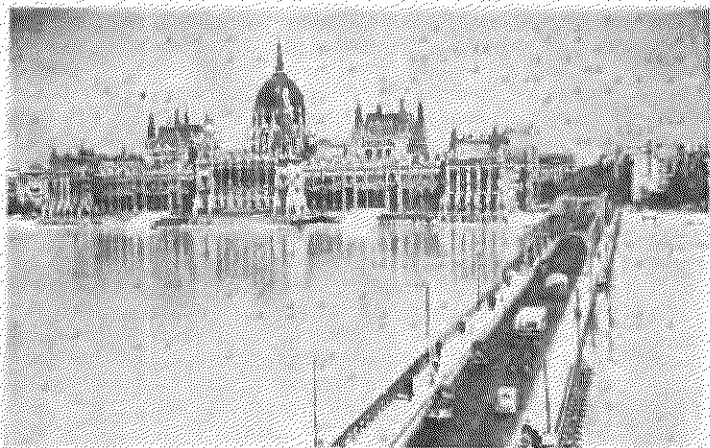
我們翻閱并研究了国内外的几十种杂志和数百种各界的报纸，想更深刻地分析一下所发生的事件。人們用各种不同的語言做了不同的报导；外国报纸对匈牙利事件的报导是矛盾百出的。

后来，我們以“共青团真理报”特派記者的身份到了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却是在十一月間。在匈牙利首都上空隨飄隨化的雪在也沒能使熾热的事件冷却下来。我們走在这个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上，会見了几十个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我們看了許多文件，了解到很多事实，最后写成了这本书。在書中我們所談的都是我們的見聞。請讀者不要指責我們引証文件过多；我們极力不讓自己做出主要的結論，而是得到一个全面的印象。



遭到暴徒破坏之前的解放纪念碑



面貼多瑙河的国民議會大廈。

被法西斯匪徒破壞後的布達佩斯的街道。





一位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匈牙利青年妇女。



被倒捆在树干上的一位匈牙利爱国者。



反革命分子将一个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刺杀后，又把刺刀插入他的口中。

在凱魯特街上，
一个行人被反革命暴
徒吊死了。只因为他
“好象是国家保安机
关的工作人员”。





被放出来的罪犯正在脱下囚衣，换上由百货公司抢来的大衣。这些人都是反革命势力的“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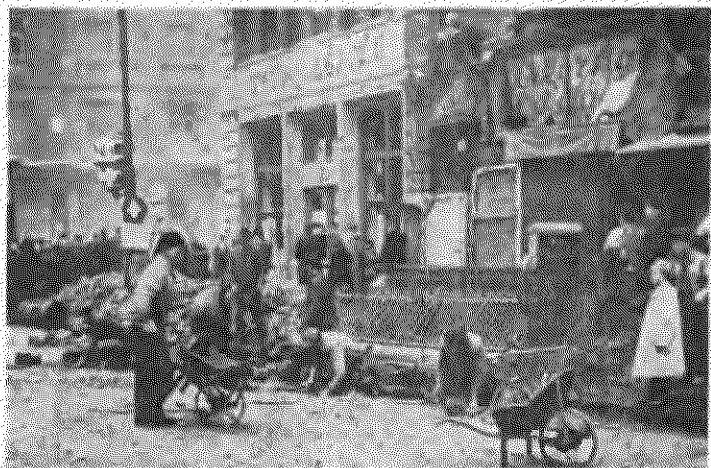
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暖水壶。



这就是暴乱分子为了寻找所谓的“地下室”而
在市委大楼附近所掘的大坑。

布达佩斯
的工人正在修
复列宁弯路上
的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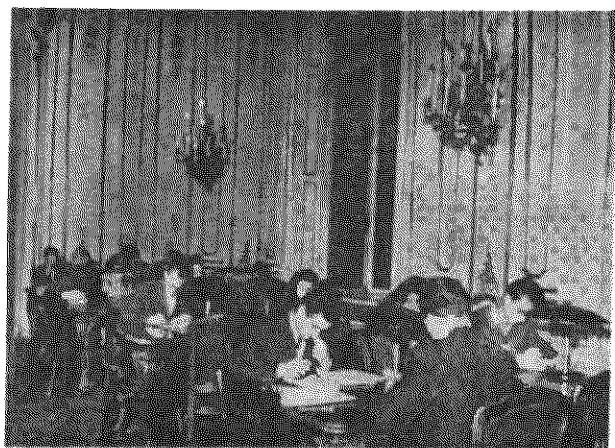




布達佩斯的工人們正在修復被毀壞的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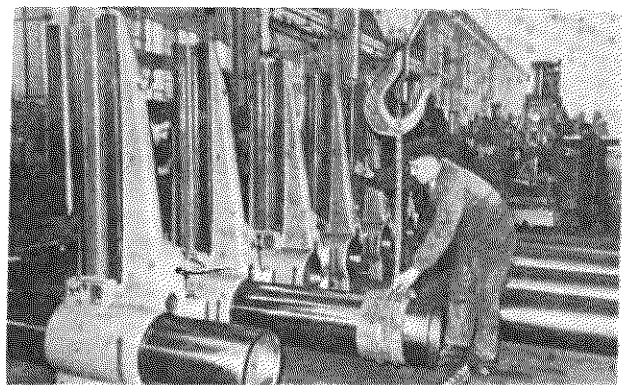
布達佩斯的工人們正在修復電車軌道。





布达佩斯的爱尔文·沙波图书馆里，现在已有不少人在看书了。这个图书馆在事件中曾遭到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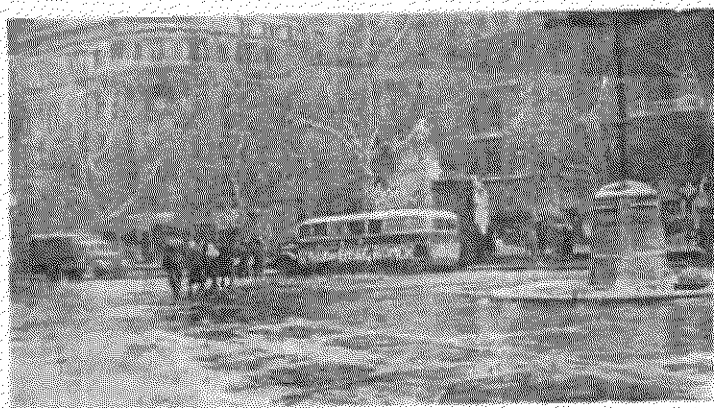
匈牙利著名的切佩尔工业区的各大冶金工厂的生产均已恢复正常。图为车床制造厂中正在装配鑽床。





“打倒通货膨胀！开始工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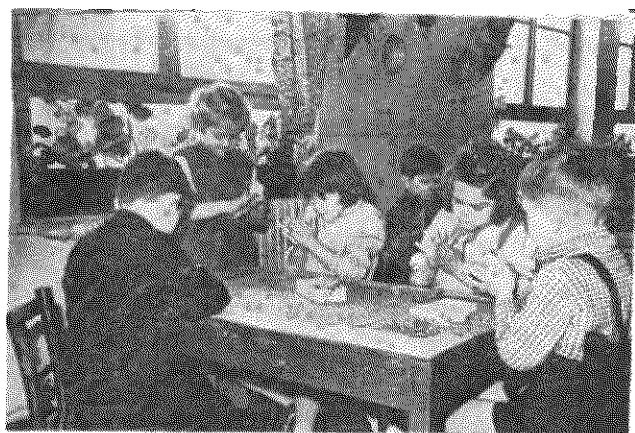
汽车上也写着：“罢工就是饥饿、贫困，工作吧！”





一个幼儿园里的儿童们正在作游戏。

匈牙利多瑙潘泰莱城“克鲁普斯卡娅”
幼儿园里的儿童们。



目 次

作者的話

在布达佩斯的最初几小时..... 1

在匈牙利发生了什么事情..... 7

杀人犯走上街头..... 24

是誰鼓吹、准备和进行的法西斯暴乱..... 41

与各种人的会见..... 72

光怪陆离的几頁..... 96

生活复苏了..... 113

代跋..... 125

在布达佩斯的最初几小时

“下边就是布达佩斯了。”我們飞机上的一位旅客說。
我們朝向机窗，前額几乎触到玻璃上。

大地伸展着，呈現着秋天特有的黃色，使人看去有些头晕眼花。它象几何图一样准确地被画成一块块的長方形，一直伸展到地平綫。这些一块块長方形的土地，就其形式和顏色而言，从上边看下去宛如散在广大空間里的一座雄偉的公园，道路象是刻划出来的細細的綫条似的，这些綫条在飄浮于地平綫上的霧气中时隱时現。在平原上緩緩流动的河川，弯弯曲曲，向着远方淡紫色的巨大山脉流去。无与伦比的美丽白雪皚皚的山頂在閃閃发光。

在平原上还没有下雪。如果說在基輔航空站有冰层在我們脚下沙沙作响，有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使我們时常得揉擦兩只耳朵的話，那么在这里却到处都是深秋的阳光。

小村庄上的紅屋頂、貯水池的水面、尚未冻冰的河上的有着雕鏤花紋的桥梁、火車头上的青烟、公路上小得像臭虫似的汽車、教堂的尖頂等等，这一切都在飞机翼下向后閃了过去。

“現在在这些村庄里，城鎮里，火車站上，公路綫上

生活怎么样呢？”我們每个人不由地想起这个问题来。

飞机开始降落了。由前边螺旋桨的上面可以看到，迎面而来的建筑物越来越近了。在火车头上升起的烟团也越来越大了。一个工厂的烟囱在冒着烟，好像誰在吸香烟似的。在馬路上閃过去的有徒步走的和骑自行车的人。

飞机猛地要着陆了。在我們的下边就是布达佩斯中央航空站。机场上停着几架尾部繪有匈牙利民用航空公司的三色标志的银灰色飞机。由站的兩側向外伸延着豪华的还没有完工的建筑。还有两个椭圆形的，四周鑲满玻璃的眺望楼……。

在航空站这里，我們就已經感觉到今天布达佩斯的气氛和它的生活的全部复杂程度了。整个用玻璃和石头盖成的明亮的候机室里空空如也。它很清静。只是偶尔有些身穿深藍色大衣，肩扛自动步枪的人走过，皮靴上的釘子碰在地上咣咣作响。据一位值班員对我們講，他們是不久以前为了维护秩序而成立的民警队。有一位上了年紀的人走过候机室，他穿工作服，全身都是石灰和油点，在他后边是几个妇女，手提水桶拿着刷子。

“这是燒爐工人和清洁員，”值班員說，“他們从十月二十三日起一直都在象誠实的劳动者那样地工作着。可是，我們的無線电報員們領了薪水和口粮，却坐着什么都不想干……”

航空站上的工作日就要結束了。妇女們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过候机室。他們每人手里都拿着提包，而每只提包里都有一只鵝。是的，是的，是鵝，这鵝并不是什么瘦小的，藍头的，而是肥大的紅头鵝，就象肥肥的小猪一样。

一个头上戴着无緣帽，穿着綠色大衣的男人来到了候机

室。

“請認識一下吧，”值班員向我們介紹道，“這是航空站工人委員會主席。”

“鮑利斯，”新組織用俄語自我介紹道。

一看到我們的照像机，他就象內行似地問起照像机是什麼牌的，底片感光速度是多少等等問題來。我們問了他幾個有關航空站的工作和有關布達佩斯的問題，他先是裝做好象沒有所懂的样子，後來才談了起來。

“我的俄語說得不太好……”

我們沒有能够由他那兒詳細了解到，為什麼今天航空站的許多工作人員都沒有來換班。鮑利斯解釋說，他早晨進了一趟城，去找部長。但是為什麼呢？在那裡談什麼了呢？城裡仍然在鬧事嗎？

鮑利斯做出一付表示不懂的表情。

這就是我們與眾所周知的工人委員會活生生的代表的初次會面。我們第一次感覺到，人們大概是有各種各樣的，他們受着不同的影響。

……我們坐在一張小桌旁想：汽車會不會從城裡很快就來呢？我們能不能在天黑以前看到布達佩斯呢？這裡沒有可問的人。但這時有一位姓瓦西里也夫的蘇聯軍官來到了候机室。我們認識了。瓦西里也夫知道我們是記者以後就出去拿來了一隻不大的綠色的象是軍用水壺似的東西。

“請看吧，你們會感到興趣的……”

我們接過水壺打開了蓋。里边是一個黑玻璃瓶，上面揸着金屬蓋子。水壺倒象是個水壺。瓦西里也夫看見了我們不懂的表情就解釋道：

“这并不是水壶。里边盛的也不是热咖啡，而是一种易燃的液体。看，在瓶底下有两个小玻璃管。把瓶一擲，小玻璃管就会破裂，这液体就能燃烧起来。霍尔蒂集团匪徒身上带着很多这样的‘水壶’。这显然不是匈牙利出品。”

随便再谈谈外国造的几件物品吧。就在航空站这里，我听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10月25日，一辆开得很快的小汽车停在了尤列雅街上。车上坐着四个小伙子，手里拿着自动步枪。“你们是到哪里，干什么去？”有人问他们。这些人没有作任何明白的回答。人们因此决定看看汽车后面的行李箱。原来里面全是一捆捆的传单。这些传单号召人们反对人民民主政权，后来查明，这些传单是送到各省去散发的。这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现在清楚了，是从邻近的国家弄来的。在乘客身上找到了八张来自维也纳的名片，这些名片就是他们在匈牙利会见某些人物的介绍信。

传单……维也纳的名片……“水壶”……这样一来我们就在匈牙利土地上第一次从几件事实上弄清了：在国内一切事件中起着恶毒作用的是盘踞在西方国家的匈牙利人民的敌人，是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企图在匈牙利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们……

汽车开来了，于是我们就乘车到旅馆去了。这旅馆离航空站十五公里，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穿过匈牙利首都的郊区，一路所见都给我们证明了：美国记者在报导匈牙利劳动人民的生活时是如何地说谎。就在上星期美国电台连续两天不知疲倦地广播说，什么布达佩斯发生了流行性斑疹伤寒。广播评论员还补充说，这种流行病好像是由“苏联派到匈牙利的蒙古士兵”带到城里来的。

可是在布达佩斯，我們沒有看到絲毫斑疹傷寒的征候。我們沿着窄窄的鋪着柏油的人行道走着，迎面看到的是下班或傍晚散步的工人和職員，他們不慌不忙地走着。許多人騎着自行車，在后边揣着或是一只手在前边拿着一袋糧食。在馬路左側的兩幢樓房中間的空地上，孩子們在熱鬧地踢着足球玩。在十字路口上，行人們耐心地等着車輛過去。一位老头，一对推着小孩车的青年人，还有一对互相搭着肩膀的青年，看上去在討論象世界那樣的永远是新的然而又是老的問題……我們几次赶过几輛不大的馬車，这些馬車用兩匹馬駕着，拉着枯树枝；城市居民在儲存燃料。如果不是那几件东西的話，恐怕可以說，布达佩斯及其郊区的生活和任何一个大城市的生活沒有一点区别。

欄路杆阻住了我們的道路。一列城郊火車用很高的速度从前面馳过。車上有几个窗戶被打破了，車廂里挤滿了人。人們站在脚踏板上，站在兩节車廂之間的过道上和后边的緩冲器上。只要能够站脚的地方全都站滿了人。看来，鐵路運輸开始恢复了，但还不是全部的恢复。

行过一公里多，又有一条鐵路横过道路。我們的汽車在車站附近停住了。一个服裝很整齐，戴着紅色帽子的面容严峻的姑娘把一列由兩节車廂組成的火車指揮过去。小車廂里也挤的不得了……在十字路口上以及一路上和在航空站上一樣，也有武装人員来回走动，他們穿着深藍色大衣，胳膊上系着三色的臂章。有人對我們說，郊区还不太平，夜晚有时听到槍声。反革命都已轉入地下，但仍然在繼續作惡，暗中活动。

我們进入了匈牙利的首都……經常举行檢閱和游行的多

若广场在这晚上相当清静。几辆汽车穿过通向广场的马路。有一辆车从侧面街道开了出来，一辆公共汽车停住了，一长串候车的乘客都向它跑去。敏捷的交通警很神气地挥动着小指挥旗。在稍远的地方站着为了维持市内秩序而成立的军官团的军官，他们穿着浅绿色的大衣，皮带上挂着自动手枪。一辆带拷斗的摩托车驶了过去，一位上了年纪的人駕駛着，后座上是一个穿长袍的妇女，拷斗里有三个孩子。

现在，傍晚的时候，在城里的街道上，行人要比在郊区多得多。在一些楼房的墙壁上可以看到被破坏的痕迹，但这些房子上被打坏的窗户已经安上了玻璃，有的是用三合板钉死或是用紫色的纸糊住的。在沿街的树木之间拉着长长的，精心摆好的横木，就象是菜园的木栏一样，还有一堆堆的残砖瓦砾。看来，这是在几天以前就堆好了的，只是还未来得及运走。

街上有很多孩子、穿着几乎紧贴在身上的男装裤的姑娘、戴着蓝色无檐帽和有帽缘的滑雪帽的男人、还有披头散发的妇女，他们手里几乎都拿着一卷卷的东西、提包、皮包和网兜。大多数人的面孔都很紧张，有些人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安的神色。很多人常常在商店旁边或街道上停下来，谈论着什么……

我们感到城市的生活还很复杂，人民过着忧虑重重的生活。但是，总的来看，这种生活虽然还很艰难，可是它已经颇有信心地走上了正轨。了解布达佩斯的最初几小时所得到的印象被以后的几天所见到的一切证实了。

我们长时间地沿着市内的街道走，到商店、咖啡店、到饭店里去，到工厂、以及布达佩斯人的住宅去，和许多匈牙利

利人——由科学院士起到工人——进行了訪問，談到关于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关于現在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思想 and 情緒。我們也看了許多有关对匈牙利人民來說如此慘痛的那几天的文件。結果我們肯定了：如果不了解在10月23日以后发生的事情，如果不了解是什么样的势力——內部的和外部的——参加了这一事件，或者正確些說，不了解誰推动了这一事件的話，要想真正了解今日的匈牙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要談談我們在匈牙利的所見所聞，我們想稍稍离开本題，回溯一下不久以前的事情。

在匈牙利发生了什么事情

纪录影片的几个镜头

我們有机会看到了关于匈牙利十月和十一月那些日子的简短然而意味深長的纪录影片。这影片是匈牙利纪录影片厂的一些攝影師拍摄的。他們自己主动地到布达佩斯各处去，想編制一部有头有尾的故事片來說明那些悲慘的日子。影片是无声的，也沒有加任何說明詞。但它的那些镜头却很有力量，確能把观众帶至不久以前的事件中。

布达佩斯。10月23日。源源不絕的游行队伍沿着晨光照耀下的街道走着。交通停止了。但有的地方游行的人只走街的一边，好讓电車和公共汽車通行。很多人笑着，然而臉上

也閃現着緊張的表情。看，一個知識分子戴着夾鼻眼鏡，挽着他妻子的手。在他們的旁邊有一對十二歲到十四歲的男孩和女孩在无忧无虑地走著。在銀幕上出現了一位上了年紀的工人的面孔，他正在對他旁邊那位笑著的人說話。一位年青的婦女走到陽台上來，手上揮舞着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的小國旗，向中間有很多青年男女的游行隊伍致敬。游行的隊伍都涌進了國會旁邊的廣場，形成不寧的人山人海。

為什麼這些人走到布達佩斯街上來呢？在廣場上，一個一個的講演人隨着自己說的話，揮動著手臂，他在熱烈地發論著什麼呢？涌進市中心區的游行群眾在討論著什麼呢？

在這天早晨以前，在家庭和咖啡店裡，在俱樂部裡，甚至在街上，人們進行過長時間的熱烈的爭論。對一切妨礙生活前進，把生活拖出軌道，給生活加上重負的人的不滿情緒聚積了決不止一兩個月了。究竟誰應當負責使生活免于陷入混亂，打開前進的道路呢？當然是領導國家和黨的首要人物啊。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對勞動人民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不聞不問。拉科西和格羅領導集團不只不改正所犯的錯誤和缺點，而且還繼續堅持己見。

“只有瞎子才能對國內發生的事情這樣的鎮靜”——在那些日子裡匈牙利人彼此這樣談著。

過去匈牙利的領導人不去徹底醫治內部的病症，反而極力地掩蓋它。人們建議他們不要機械地搬用蘇聯工業化的經驗。他們不聽，結果在象匈牙利這樣一個不大的國家裡把很大一部分資金投入新的巨大企業的建設中去了。工業化在加速進行。但，如果這種速度對蘇聯來說是需要的和正確的話，那麼這在匈牙利的條件下就完全是不需要的了。過去匈

牙利的領導人對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

匈牙利黨的和非黨的勞動者都對這種情況進行了討論。

拉科西和格羅領導集團脫離了現實，滋長了官僚主義，實行了宗派主義、教條主義的政策，結果也就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於是錯誤一個跟着一個地接踵而至。民主沒有能夠擴大，社會主義的法制受到破壞。不僅是在工業方面，就是在農業方面也執行了錯誤的經濟政策。集體經營的思想在農民的心目之中大失威信。

這就是擔心自己國家命運的那些人們所熱烈爭論的東西……

過去，匈牙利勞動黨的領導對每個願意入黨的人都大開其門。它一共擁有90萬名黨員。進入黨內的有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包括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人、小農分子和乘機企圖達到個人目的的冒險分子。結果，在困難的時候，黨就無法把握複雜的情況，發動人民同反動派進行鬥爭了。黨陷於瓦解的狀態。前些年形成的以依姆雷·納吉和格佐·洛齊松為首的黨內反對派，超出了對拉科西和格羅領導集團的批評，開始進攻整個黨，進攻人民政權的基礎。這都是有助於反革命事件的爆發的。

過去，匈牙利勞動黨的領導人歪曲了社會主義國家統一性和國際團結的思想。他們嚴重地傷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感情。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和民族風尚。拉科西和格羅卻踐踏了它們，把軍服搞成和蘇軍的軍服一模一樣。在匈牙利的學校里，向來學習成績最高分數是一分。他們把這個制度改變了，按照蘇聯的給分制度實行新的制度：最高分數是五分……

这些以及其他許多事情都是匈牙利工人和农民所非常不滿和坚决进行过批評的，他們要求抛弃这些誰都不需要的，有害的思想……

民主制度的敌人利用匈牙利党所犯的錯誤，千方百計地用民族主义来毒害人民的意識。在匈牙利，还躲藏着过去霍尔蒂的拥护者、法西斯分子、旧制度的渣滓，他們一直都在等待着有利的机会。反动势力在西德糾集了逃脫人民法網的反动势力来帮助他們。国际帝国主义窥伺着国内的情况，指揮并鼓舞了反革命分子，給他們以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企图乘机在匈牙利夺取政权，并在欧洲中心建立起一个新的战争策源地。

在这种情况下，人們的不滿情緒在匈牙利增長起来并尖銳化起来了，最后，形成了10月23日的街头游行示威……

……在我們眼前，和平游行的镜头一个个閃現过去。人們走上街头，对过去的錯誤表示了正当的不滿。他們打算的是：达到改正錯誤的目的，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劳动人民游行的队伍走过馬尔基特大桥。他們举着標語口号“社会主义万岁！”毫無疑問，参加游行的絕大多數工人并不想把工厂、矿山和銀行重新交給資本家。农民也并不打算把自己的土地交还给地主。不，一个边走边和自己的同志談話的上年紀的工人，当然不想讓法西斯再回到匈牙利来。同样，这也不是那位帶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参加游行的戴眼鏡的知識分子和用國旗向游行人致意的青年妇女所希望的……

可是，在一群青年中間出現的是什麼口号呢？他們竟号召：“打倒紅五角星！”，“不要使用‘同志’这个字眼！”，“不，不，永远也别使用！”这是反革命分子发出的声音。

出現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些躺着受伤者的病床。有些人被射穿的腿包扎上了绷带，另一些人毫无生气地伸着用绷带包扎的双手。还有疼痛的苦脸。

誰使这些人受害的呢？为什么开枪射击呢？那些人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一切都出于反革命分子之手。一开始他们就混入了青年学生和劳动者的游行队伍。是法西斯的喽罗們和前霍尔蒂的軍官們开始射击的，还投擲了手榴彈。流血事件就这样地开始了。

这些有着骯髒的历史，暗中很快就弄到了武器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改正錯誤。他們是想消灭人民政权，想把他們在10月23日掀起的武裝暴动冒充成“革命”。但这既不是革命，也不是什么民族革命。这是反革命。

人們可能会反对說：“在10月的日子里出来游行的人絕大多數都不是反革命分子，走上街头的还有忠实的人們，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人”。对，是这样的。但是，旨在反对民主制度，反对人民共和国及其組織的武裝暴动，有些参加了暴动的人，即使并未抱有此种目的，实际上也就是为反革命服务了。同样，在反革命暴乱期間所有参加反对人民共和国的罢工和游行的人，都应当了解一个痛苦的事实，即他們已經用行动削弱了人民匈牙利国家制度的力量，这實質上也就是帮助了反革命。

几乎同时，在国内其他城市，反革命分子也利用和平的游行进行了卑鄙的活动。毫无疑问，他們老早就准备有这一天了。在布佩达新，他們在惊人的周密的組織之下襲击了无綫电台、停車場、約瑟夫中央电话局、国际連絡部，西車

站、兵工厂和基莫特街上的軍械庫。难道学生們能够这样有计划地組織劫夺重要的国家机构和軍事目标嗎？反革命势力早就事先准备好了劫夺軍械庫的人和运送武器的汽車以及分发武器的地点了。

暴乱的計劃是經過詳細制定的。美国国务卿約翰·杜勒斯的弟弟美国情报局局长艾倫·杜勒斯很清楚这一点。在10月23日以后，他很快就承認了这一点。

法西斯颠覆活动的公开企图就是这样在匈牙利干起来的。这种颠覆活动是經過准备，受外国帝国主义反动集团的供应和鼓励的国内外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势力所进行的。英国“每日邮报”記者10月25日公开报导說：“为本星期爆发的动乱进行了整整一年准备工作的那些人們，近几天同我一起吃过飯。”

这些人是谁呢？

反革命的积极力量，以其活动的方法和殘酷无比的特点來說，就是公开的法西斯。在最初几天，这些喽罗們还害怕人民群众很快就会把他們看透，于是他們就以社会主义的口号来掩盖自己的黑暗勾当。匪徒戴着假面具走上了街头。但这样并没有持續多久。政府剛一下令停火和苏軍剛一撤离布达佩斯，法西斯血腥的狂暴活动就开始了。是的，难道法西斯分子和战犯从国外投送到匈牙利的前霍尔蒂軍官和宪兵以及暴乱分子从獄中釋放出来的刑事犯罪分子——所有这些憎恨人民民主制度，憎恨人民所創造的一切的人們能够長久地克制住自己嗎？

进攻人民政权是从10月30日襲击市委会开始的。影片映出了殘杀的場面、市委会大樓受到了无謂的破坏。这件事情

发生在共和国广场。观众的眼前是遍布着由市委会抛出来的文件的街道，遇害者和被碎尸的共产党员的尸体以及着火的大楼所冒的烟。在一团混乱之中，有手持武器的人来来往往。

一个满脸胡子的杀人犯的特写镜头閃了过去。他穿着短大衣，新鞋子的裤脚好象是被匆忙地塞进了皮靴筒，一部分还露在外边，头上戴的显然是别人的帽子，腰带一旁搖摆着不知是从谁的手里劫夺来的大皮包，皮包里装满了抢到的东西。这个匪徒挺着沉重的皮包走路很不方便，但他还是不肯把它丢下。他手里拿着一只自动手枪……

襲击市委会是法西斯分子的信号。在銀幕上是用世界著名进步作家的書籍以及匈牙利和苏联的报刊燃起的火，正在冒着烟。周围聚集着一群带着满意的表情的人。……被打碎的商店橱窗里已经一无所有，就连店里的货架子上也是空空如也的了。商店就这样地被法西斯喽罗们搶劫了。住宅在燃燒。没有一个人想去救火。被打翻的电車。从房上扯下的和在列宁街上被踐踏的牌匾。被自动步枪和手枪打破的金属制成的大紅五角星。撕成一块块的紅旗被抛到地上。被打坏的“自由人民报”編輯部的房子。用紅旗升起的篝火……

在布达佩斯上空升起了法西斯的魔影。

反革命分子撕下了假面具，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他们掀起反对匈牙利进步力量的血腥恐怖。他们要屠杀所有的国家保安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党的工作人员、先进的工人和人民政权积极分子，把他们吊起来，砍掉他们的头，枪杀老人和孩子们。法西斯分子飞扬跋扈，公开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依姆雷·納吉政府在这些日子里做了些什么呢？它阻止了流血屠杀和消灭国内进步力量的企图了没有呢？依姆雷·納吉没有做任何打算，来阻止白色恐怖。相反地，它一再向反动势力让步。它总是向右转。这个政府通过扩音器来和人民联系。在七八天的时间内，它的成员更换了好几次。依姆雷·納吉政府到了后来就成了反革命势力活动的屏障。法西斯分子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政府是以共产党员依姆雷·納吉为首的这一事实。

在国内，“安娜·凱特拉社会民主政府”的领导人法西斯冒险分子约瑟夫·杜达什和其他这样的人象雨后春筍一样突然地鑽了出来，企图夺取政权。10月31日，正被軟禁的紅衣主教明曾蒂从費尔舍佩特尼堡被得意洋洋地送回了布达佩斯。他一出来就公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

在这些日子里，大地主爱斯杰尔哈泽伯爵回到了布达佩斯。在霍爾蒂統治时期，几乎匈牙利所有土地的四分之一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在暴乱的日子里，这个地主就给各外国大使馆打电话，說：“在电话旁边的是爱斯杰尔哈泽。我回来参加政治活动了。我打算在最近参加政府。在必要的时候，您可以和我联系。”

在我们面前摆着一封从匈牙利西部地区一个城市——邵普隆来的信。写信的人对暴乱的失败甚感惋惜。他认为反革命分子的行动“过急了”，为时过早地暴露了自己。这封信刊登在西德的“前进”报上。在信中說：“奥托·哈布斯堡从自己的避难所里出来得过急了，他过急地要求加冕了，过于公开地表示出自己对战争的幻想了……

大剗創者和地主爱斯杰尔哈泽伯爵是首批被放出来的，

他在被釋放后馬上就開始組織了目的在於將小農的所有土地歸還給幾個大土地壟斷者的行動。

紅衣主教明曾蒂是過去所作所為最成問題的歐洲大主教之一，立即恢復了他的政治活動，公開地暴露了自己的保皇、反民主的觀點，這使基督徒大為震驚……

西方給我們把費倫茨·納吉派來了，派來法西斯分子。這就是他的政治資本”

是誰鼓吹和支持匈牙利反革命的呢？

被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由西方派來國內的，僑居國外的霍爾蒂法西斯分子在這次血腥事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中間有參加過反對越南和阿尔及利亞人民戰爭的雇佣凶手，有來自西德的前黨衛軍分子，有慕尼黑集中營里豢養的潘杰拉分子，還有劊子手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他們企圖利用國際紅十字會組織達到自己的發財目的。運送醫藥和糧食的飛機和汽車也運送武器和彈藥。在這些天，武裝人員公開地通過奧匈國境，乘著汽車和火車，源源而來。

影片攝影師把走在布達佩斯街上的武裝暴徒們拍入了鏡頭。匪徒戴著國徽，冒充革命者。有一個從屋內向外拍的鏡頭。在窗戶旁邊站著一個暴徒，他彎著腰，小心翼翼地望著大街，準備用自動步槍射擊。他身著短外衣，戴著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的海軍帽。他閃開了鏡頭，生怕暴露自己的面目……又是滿載武裝匪徒的汽車。總的看來，他們覺得自己已經成了社會的主人。有幾個走路的人，看見過來的汽車就害怕地貼到牆上。

在這些日子裡，很多匈牙利的工人們開始恍然大悟了。他們明白了，用外國手槍和自動步槍所武裝起來的偽裝的

“革命者”會給他們帶來什麼。

參加到依姆雷·納吉政府的優秀分子——匈牙利的愛國者終於同它割斷了關係，成立了以亞諾什·卡達爾為首的工農革命政府。這個政府決定要給法西斯以打擊並結束國內的白色恐怖。它請求蘇聯給予援助……。

當他們不惜犧牲所反對過的法西斯主義又要重新抬頭，在匈牙利製造起血腥暴行的時候，我們的國家能夠拒絕給匈牙利革命力量以援助嗎？蘇聯人民能夠無動於衷嗎？幫助匈牙利人民，這是我們的國際義務。蘇聯人民為什麼肯在這一鬥爭中蒙受犧牲，他們在布達佩斯保衛了什麼呢？他們保衛的是匈牙利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取得的成果，保衛的是社會主義。

襲擊黨的市委會是反革命公開行動的信號

10月30日布達佩斯市委會遭到了襲擊。這是武裝反革命力量摘掉假面具，公開行動的轉折點。

在此前夕，匪徒們就曾經襲擊過布達佩斯第7區和第8區的黨委會和黨校。在10月29日同一天，在市委會大樓門前的共和國廣場上出現了小股武裝人員。關於事件後來是怎麼發展的，黨的工作人員馬爾托·洛瓦什（在殘暴的事件中他幸免于死）給我們作了敘述。

我們坐在洛瓦什的家里，他家位於多瑙河岸上。這時和平城市的喧囂聲由窗外傳來：行人的談話聲和孩子們的笑聲、電車的鈴聲和汽車的喇叭聲、賣報的和小販的叫賣聲，而我們的耳朵里所聽到的和眼里所看到的卻似乎是槍聲和瘋狂的

法西斯分子的叫喊声以及可怕的杀人的场面……

“10月30日早晨10时左右，我們就听说要袭击市委会了，”馬尔托·洛瓦什开始道，“我从四楼窗戶上一望，看見有身着便衣的帶有武器的人占領了市委会对面的艾尔凱萊戏院，并在共和国广场和留杰尔街上的大楼頂上布置下来。

一会就有二十几个人手持武器离开了占領着广场的人群，对着市委会大楼的門口瞄准了。他們向站在市委会門口附近的警察打了招呼，要他們到跟前去。四个人服从了他們的話。他們又命令警察面朝大楼站着。匪徒之一把他們身上的自动步枪正了一正便大声說道：“誰敢反抗，我就枪斃誰！”随后便在警察脚下投了一颗手榴彈。頓時連警察帶襲击的人就都四散逃跑了。手榴彈爆炸了。这便是攻击大楼的开始。

兩点鐘的时候，大楼受到自动手枪和步枪的射击。这时，我就打电话給城市各区，請求彈压襲击者。

“我承認，”馬尔托·洛瓦什苦笑道，“我和市委会的其他工作人員想的一样，認為襲击是一小股匪徒的主意。我們希望，政府的軍隊来援助我們。可是沒有誰来援助。

在大楼里有近40名市委会的工作人員：市委書記依姆雷·麥澤、各部的部長、打字員、食堂工作人員以及其他等人。除他們以外，还有从各区里来这里办事的人們和几个軍官。这些人是来与市委会工作人員討論如何訓練工厂保卫队使用武器的。

“在市委会附近，”洛瓦什繼續說，“有四十名帶着步枪、手枪和自动步枪的保卫队。这些哨兵都是匈牙利农民的子弟，他們奉命在受到襲击的时候保卫大楼。他們象战士一

样地执行了命令……

下午兩点許，第一顆炮彈打穿了四樓的牆壁。我一到走廊上就和几个同志往地下室跑去了，因为那里比較安全些。第二顆炮彈落在离我們只有几米远的地方。大家从會議室把中学教員米哈依·考尔尼杰什沿着楼梯拖了下来；他的兩腿已經受伤。我們在地下室聚集了有二十几个人，其中有几个是妇女。當我們投降的时候，在洋灰地上已經躺着四个受伤的人了。一个受伤的是襲击我們的人，是哨兵把他拖进来的。哨兵还給他包扎了伤口。过了几个小时以后，这个哨兵就被吊在共和国廣場上了……炮彈越来越多了，震得大楼直动。就是这样，也沒有誰来援助……”

我們感到馬尔托·洛瓦什很难繼續說下去……他常常停下来，沉默几分鐘，然后再講下去。是呀，当这样駭人听闻的流血場面在你的記憶之中重新出現，当你回忆起你的同志們是怎样地被殘杀的时候，心里真是感到沉重……

依姆雷·麦泽命令武裝警卫人員停火。在大樓上升起白旗。兩名軍官同麦泽同志拿着白旗走到街上去。他們遭到一梭子冲鋒枪子彈的射击，三个人頓時倒地身死。暴乱分子冲进了大楼。他們对在那里的人們施行了酷刑和杀戮。有的人被吊在共和国廣場的树上，有的被砍掉头，有的被挖了心。

劊子手把工人运动的老战士亞諾什·阿斯托洛什的心挖了出来。炮兵上校派普被活活打死，市委会的其他人員也遭到了兽性的殘害。

这里，我們想引用匈牙利政府出版的关于法西斯暴乱的“白皮書”中的一段話：

“市委会女工作人員为了躲避謀杀者，从三樓窗戶跳了

出来。另一个女工作人员E·T对那駭人听闻的几个小时作了如下的描述：“我当时正在四楼，一群人冲了上来。有一个人把枪对准了我，但是他们的领导人之一说，不值得碰这个老婆子。他们强迫我扔掉我当时手上拿着的手提包和外衣。他们翻遍了 my 口袋，把所有东西都拿走了，然后有一个人命令我掩护他们，把我推在前面带着他们沿着走廊走去。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党校的同志走到楼梯上来。他们向他扑去，动手就打。这时，我乘机逃跑了。跑到三楼，在那里我又被拦住了，挨了打，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大厅里。在这里有几个受伤的人躺在地上。他们把我从这里带到共和国广场，让我可以看到在等待着我的同志们的命运。他们把一个保卫大楼的人员打到半死，然后把党证塞到他的嘴里。离他不远，躺着一个受伤的人，也是保卫市委会的。他们用脚踢他，向他吐唾沫，然后把他拖过去一点，靠近一位已经被倒吊起来的市委会工作人员身旁。我不知道这位同志是否还活着，但是他的血仍在淌着。绳子吃不住他的体重，断了，但是他们又把他重新吊了起来。”

还有很多布达佩斯人向我们描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场面。有关这些日子的文件也证明，布达佩斯的一切都使人回忆起狂暴的最可怕的希特勒匪徒的时代。反革命分子杀害忠实的爱国者、共产党员以及所有妨碍他们的人。刑事犯罪分子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据某些材料统计约有两万人）他们被武装起来，他们得到活动的完全自由。他们和由西方派到匈牙利的仆从们合起来，形成了反革命的主力。最卑鄙，最龌龊的事情都是他们干出来的。

关于牺牲在白色恐怖之下的人数，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

計。但是根据已經知道的那些事实就足以証明，在暴乱的日子里是什么政治力量抬起头来，是誰策动他們的。是的，就是法西斯分子，是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是的，就是世界反动势力要在匈牙利恢复資本主义的冒險企图。

16岁的犯罪分子亞諾什·錫拉吉伊說：

“我和一个穿便服的上尉在一起。他和我按着指定的地址去謀杀国家保安队員和共产党員。有一天我們去到离‘鋼琴’旅館不远的一座楼房，一直走上了五楼。上尉說我們是去找一个国家保安队員的。我們找到了他，他的妻子和一个6岁的女孩。上尉先毒打了他一頓，接着割掉了他的耳朵，用剪刀剪掉了他的鼻子，然后又开枪打了他一梭子。这时他的妻子想逃跑，但是我們队里的一个人当场就用枪把她打死了。干掉了夫妻俩以后，我們考虑怎样处置那个女孩。最后我們把她也枪杀了。我們不光是在那所住宅里干，我們每天都有新的任务。”

武装匪徒冲进一位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山道尔·西克莱的家里。他負了致命伤。他的岳父拉卓斯·奇斯，1919年的党員，被用斧子砍死了。

在第20区，匪徒把联合紡織厂的老电焊工人卡尔曼·杜尔涅尔杀死了，因为他参加了保卫党委会大楼的工作。在同一区，他們把約瑟夫·拉巴迪从家里叫到門口开枪打中腹部而死。

在第三区，“果德貝格”厂的党書記奥托·比哈里和区委書記埃納·莫尔納尔都被抓起来了。11月4日，在第二区他們搶劫了烈士大街的食品店，并把排队买东西的男人們抓走。其中有共产党員，他們想枪斃他們，但沒有成功，因为

苏联士兵出现了。

在外省发生的事情

10月25日到26日，骚动在外省开始了。在那里和在布达佩斯一样，在事件的混乱情况下，所有“过去的人”都鑽出来了，这些人是：隐藏到今日的霍尔蒂军官和官吏、宪兵和富农、地主和厂主。这里和首都一样，从西方来的匪徒和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刑事犯起了很大的作用。

被人民所赶跑的剥削者认为他们的时候到了，他们现在可以占有过去的地位了。吉厄尔毛纺厂昔日的大股东，资本家凯尔台斯经过维也纳来到了吉厄尔。他首先就要求把工厂归还给他。在威克尔村，曾拥有85霍尔特土地的富农别拉·霍尔瓦特带领一队武装人员闯进生产合作社的房子里去，他宣布说：“生在那里的社员都得搬走，把库存和设备清单交给我。”一群富农闯入别沙尔卡村人民会议办公室，赶走了委员，并指定自己的头子安得拉斯·安多尔卡·基什为村长。富农们大声宣称：“穷人当政的时代已经过去。旧的秩序要恢复起来。”盖里耶村过去的地主马尔托·别杰尔吉把一群坏蛋武装起来以后，想把他的雇农以他的土地为基础而成立的“拉科西”合作社解散……

匈牙利过去的主人們要夺取政权。他们利用依姆雷·纳吉政府的軟弱，成立了各种“革命的”和“民族的”委员会，企图在这种掩护下恢复霍尔蒂政权。老农民依姆雷·考瓦什成了莫尔区“民族委员会”的主席。除了他以外，委员会里只有一个农民，其他委员都是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刑事

犯。在塞克沙尔德鎮，反动份子撤換了鎮人民會議的每一个領導人，代替他們的是旧政权的官員：馬尔达、弗尔考什、希蒙、恩托尔、佩台、捷尔吉·托巴和拉斯洛·麥塞。所謂的基什孔迈薩工人委员会完全是由富农、小投机商人、宪兵和从獄中放出来的刑事犯組成的。前宪兵特务長約瑟夫·卡尔楚成了新的警察局長。在米哈里伊，也成立了一个“民族委员会”，由前霍尔蒂官員馬罗蒂担任主席：其中有兩個前宪兵拉約什·基什和伊斯特万·哈拉斯。在乔尔納村，以前的旅店老板伊姆雷·普列納尔組織了一次反动分子的游行。他們也成立了“民族委员会”。前尼拉什党头目吉厄吉·欽台尔担任了領導职务。他的父亲在1920年曾是反革命白色恐怖的領導人之一，当时他曾經殘酷地杀害过劳动人民。吉厄吉的弟弟亞諾什·欽台尔要求以前的宪兵立即穿起宪兵制服，夺取村政权。前霍尔蒂軍官山道尔·塞凱伊成了“民族委员会”的主席。前霍尔蒂軍隊的大尉薩芝自封为乔尔納的卫戍司令。由前霍尔蒂軍官組織了一个軍官別动队，并立即开始准备白色恐怖統治。吉厄吉·欽台尔、山道尔·塞凱伊和他們的同謀者制定了他們的未来牺牲者的黑名單。由于苏軍的到达才阻止了流血。吉厄吉·欽台尔和他的一些同伙都逃到西方去了。

在外省，反革命分子“工作”的方法也是：消灭一切忠实的愛國者，用殘酷的手段鎮压、恫吓人民。恐怖、土匪活动都是他們干的勾当。

一个名叫約瑟夫·柯瓦什的当了所謂士額特“革命委员会”的委員和武裝部队的司令官（他的父亲当过霍尔蒂警察上尉，在1944年柯瓦什逃往西德，1946年回国，1949年由于

犯了反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罪行而被囚禁起来。刑滿以后，柯瓦什在罗斯克村当會計員）柯瓦什是反革命活动最积极的組織者之一。他下令逮捕共产党员；釋放刑事犯。他为了“革命的目的”从銀行里盜窃了10万福林。在弗捷紹包尼村，由富农亞諾什·加尔和二流子亞諾什·基什·加尔和伊斯特万·科罗齐率領的一群人破坏了苏軍紀念碑，然后就闖进村人民會議办公处企图毆打村長。但他們在那里沒有找到人，就到采購特派員（派到該区的一个布达佩斯工人）的住宅去。他們把他从家里拖出来，毆打他，然后把他关到一間屋里。这一群由富农組織起来的人“宣布”前霍尔蒂官員克瓦克为村長。这伙富农毆打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拉約什·科瓦斯。亞諾什·加尔率領的一邦人襲击了警察派出所，搶夺了武器，然后就冲进区党委会，在那里他們搶走了保險櫃里的18,000福林。

10月31日，反革命匪徒逮捕了巴波城的一些共产党员：区人民會議主席山道尔·彭杜尔，和区警察長約瑟夫·巴浦以及其他入。約有40个共产党员被押出城去，企图处死他們，而由于苏軍的到达才阻止了这个暴行的实现。

在米什科尔茨，有一股反革命集团进行活动。該集团曾經編造了一份共产党员和忠誠的劳动者的名單，准备把他們消灭掉。11月3日，这个集团杀害了22个人。11月4日他們又要进行屠杀。由于苏軍的到来，才制止了进一步的恐怖行动。

在基什孔迈薩，反革命分子处死了当地會議办公处的工作人員，60岁的約瑟夫·內斐尼（他从1919年就参加了工人运动）。他們毆打了只有一条路臂的癱瘓了的牧区工作委員

会委員和該委员会的主席本尼亞明·巴洛格。

在外省，特別是在一些村鎮里，反动計劃很快就遭到了破产。农民們很快地識破了这些“爭取自由”的新战士，明白了这是要恢复地主制度。把土地归还給富农和地主，恢复教堂屬地，这正是反革命的企图。11月上旬，紅衣主教明曾蒂在布达佩斯电台广播时就“不慎”暴露了。

人民政权給了农民土地，所以，这个政权是他們自己亲近的政权。他們根本不願意再受地主和富农的奴役，再失去农村劳动人民世代所期望着的土地。农民們团结起来，給了一切想夺取他們土地的企图一个打击。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大多数合作社保存下来了，这是非常有力的事实！如果說，富农或者是地主主要夺取單干农民的土地还可能的話，而要夺取集体农民的土地則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了！盖里因村的“拉科西”合作社就是一个例子。合作社社員解除了地主馬尔托·別杰尔吉和他的仆从的武裝，并把他們赶跑了。

杀人犯走上街头

匪帮是由什么人組成的

对社会主义充滿仇恨情緒、受外国煽动分子唆使，并接受他們的武器、粮食和医药用品供应的法西斯匪徒，主要是由挑撥者、刑事犯和一些社会渣滓組成的。这些匪徒不是受

前霍尔蒂军官领导，就是受在外国集中营和学校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或经过政权机关并已取得武器的犯罪分子的领导。

为了对“起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匪徒有个概念，只要看一看他们在布达佩斯第7区横行一时的头目的嘴脸就够了。

拉斯洛·什杰涅尔坐狱四年，在1955年才被释放。在很久以前，他是个装卸工人，可是民警机关里有很多关于他以前所被判罪的记录。就是这个什杰涅尔，率领了一支队伍活动在琴盖里、道布、维塞列尼、阿里邵爱尔道索尔和拉科西等街上。起初，这支队伍只有40人。但从监狱里放出了刑事犯罪分子以后，很快就扩充到了400人，甚至还成立了司令部。该司令部就设在琴盖里大街7号。武装袭击市委大楼就是什杰涅尔这支队伍的“行动”之一。

在巴洛什广场13号大楼设有米海里斯布尔盖尔 的司令部，这支队伍约有500人。他们拥有自动炮、穿甲武器、机枪和自动步枪。他们分成若干股，有组织地活动在罗登比列尔和涅弗列特什街头一带，以及辽维里杰广场和高尔基林荫路一带。匪徒在巴洛什广场上挖战壕，不让警察穿过他们的地区。

在阿里马什广场，有一支150人的队伍，它是由一个因犯罪而被从军队里开除的少尉和某个飞行员领导的。这支队伍里大部分是刑事犯罪分子。它是用轻重机枪、迫击炮和穿甲武器很好武装起来的。匪徒们乘着汽车满城飞驰，制造残酷的暴行。他们也参加了对市委大楼的袭击。

在卡拉依大街的一个汽车库里还设有一个暴乱匪徒的队部。该队的核心是由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什包尔特卡尔

諾克”咖啡館里的常客以及屬於這類滋養的可疑分子組成的。該隊有二百人，他們在占領了維爾謝、多若和別特林大街地區以後，就宣布它為自己的管區，不准民警和其他武裝力量進入。

有一個綽號叫“果雅”的人，領導着集中在科拉烏札里廣場上的為數30人的一股武裝匪徒。該股匪徒主要是進行武裝搶劫、掠奪和強姦。

在原名“紐約”後又改稱“匈牙利”的咖啡館里有一股匪徒，領導人就是別柴。這股匪徒約有30人，有一尊自動炮，這尊炮由別柴親自掌握。該隊活動的範圍為多漢、哈爾什發、拉科西和列寧街。第7區黨委會就是被這股匪徒搗毀的。別柴的匪徒也參加了對市委會的襲擊。

在後來的幾天，在“鋼琴”旅館聚集了一股武裝匪徒，它的核心分子都是從監獄里放出來的罪犯。這股匪徒進行的活動特別殘酷，因為他們握有重火器。匪徒們放火燒了“維列什—奧拉格”電影院。

這僅僅只是几股活動在一個區里的匪徒和刑事犯的簡短的敘述。類似的股匪在其他區里也有過。他們殘殺共產黨員，進行搶劫和強姦。

這些股匪徒頭子在取得政權以後，就認為自己已是整個街道和城市里的全權主人了。

拼命想奪取政權的也有些是比較有名的“活動家”。例如，前黨衛軍軍官，拉約什·紹莫季瓦里上尉就是從西方某地來到吉厄爾城的。他率領着一股武裝匪徒闖進一個工廠的電台，就向匈牙利人民發表了一次匆匆忙忙的演說，其中有些是可笑的招供，現引証如下：

“請注意收听我們的綱領！約拉什·紹莫季瓦里，是青年的使者！他來到吉厄尔电台，想立即成立一個對抗的政府。我們已經決定從今天起成立一個軍事委員會，更确切地說也就是一個行動委員會，來執行國防部和內務部的職務。我們堅決要同外國政府建立聯系。我們將設法弄到电台，我們將設法沒收那些強有力的發報台或者儘快從國外弄到一架發報機。我們請求“歐洲电台”立即同在拉約什·紹莫季瓦里領導下成立的吉厄尔革命政府以及指揮軍事行動的政府性的委員會取得聯系。

你們丟下工作吧！把共產黨員監管起來！拿起武器來吧！把街道都控制起來！”

這顯然是企圖將同情社會主義的人們拉到自己方面去，這位自封的“元首”宣布說：“毫無疑問，我們由共產黨政府那里學到的一切英明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也確實有——我們都將加以運用，並補充上我們自己的東西然後才能徹底戰勝共產黨。”

宣言是以滑稽的匪首的歇斯底里的喊叫作為結束的，他喊道：“請再次地相信我吧，就讓我以我的名字担保，大家都可以槍斃我，把我當做一條瀕狗打死。只要我還在我的地位上，我就實行自己的路線。”

但是，吉厄尔的“元首”並沒有在“自己的地位上”呆多久。他的演說只是變成了一張褐色的薄薄的錄音片，而他自己又不得不急忙地逃往西方去了。

在暴亂的時期，在斯大林瓦洛什城，還出現了一個相傳的拿破侖分子，自稱為作家的山道爾·安德拉什。他企圖組織一個新政府，這個政府應當設于杜納別特爾，並以它做為

匈牙利的首都。山道尔·安德拉什強調他所建立的“國家”的資本主義性質，主張把匈牙利的財富從人民手中拿來轉交提督府主義之手，以此換取武器和金錢。

事件的發展把這位“元首”，（請允許這樣叫吧）也給扣到歷史的垃圾簍裏去了。

下邊我們來談一談兩個狠毒的人，他們大概比那些在政治舞台上有如曇花一現的人物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吧。

杜達什先生的冒險

透過匈牙利被反動勢力所製造的黑暗血霧所籠罩的時期，今天可以肯定地說，已經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比較算是“英雄的人物”了。片斷的情報材料、目擊者的敘述以及保存下來的文件就給這位人物勾畫出一付真象來。

這位究竟是誰呢？

這位就是約瑟夫·杜達什。現年45歲。所有看見過他的人都清楚地記住了他那付有着內安得塔爾人〔註〕的顎骨的臉龐、禿頂的前額、稍稍微混的灰白色的眼睛，這眼睛總是習慣地從他那一指多寬的濃濃的眼眉下望着人。他那多毛而粗笨的手上留着長長的白指口。

要想了解杜達什的歷史，可以追溯一下從前的事情。他生在特朗西里瓦尼，後來到了布達佩斯。據說，1945年他曾經坐過監獄，而後加入了小農黨，當時曾是該黨在議會里的代表，可是在事件發生時期他堅持宣布自己無黨派，不在組織。

〔註〕石器時代居于歐洲的一個人種

在反革命暴乱以前，这个人物并不出名。杜达什曾經修理过冷藏设备，解答过各种技术設施問題。可是他只是在时机未到的时候躲藏起来一动不动。“冷藏工程师”的冒險行徑在10月23日事件以后馬上就急剧地猖獗起来了。

在暴乱的初期，杜达什聚集了武装匪徒，这些人应当成为他在政治賭注中的支柱。

吉厄吉·亞諾什·克拉耶这个反革命暴乱的参加者，不止一次地与杜达什会晤过，他在形容杜达什时说：“杜达什曾經是法西斯集团的政治、軍事领导人。他狂热地組織过“匈牙利民族委员会”，作过领导武装匪徒的工作，并且指导过他們的活动。他企图充当独裁者的角色”。同时，杜达什也还幻想过文字方面的榮譽。在这些日子里，他写了詩，其中有如象这样的詩句：

离开自己的父亲，
因为他是个共产党人……

杜达什是在10月28日当他被选为上述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才公开出现在政治事件的混濁的上层来的。

这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

在賽納广场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聚集了不多的一伙人。忽然間，在一輛运貨的汽車上出現了一个結实的人，穿着淺褐色的上身，系着黃鞋帶的皮鞋。他揮动着沉重的双手，向人群叫喊着。这就是杜达什。人群中发出喊声，要联合起来，成立委员会。

这些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这时，在那群人涌去的廣場上，杜达什由他的武装小卒們包圍着，在用木桶和木板搭成的台上宣布自己为尚不存在的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他要

所有来到广场上的人们明天到布达佩斯市第2区人民议会那里去，企图使这次的“选举”变为合法。

我们是熟悉在西方国家里，在选举前所要用那些各种各样的手段的。而杜达什恐怕是选用了最为“高明的”办法。杜达什率领着一伙无所不为的武装喽罗们抢劫了银行，从那里抢到了一笔数字不小的现款，正如报纸上所公布的那样150万福林。第二天，在多瑙河上一座桥的附近，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受喽罗们包围的杜达什慷慨地把钱抛向人群并宣布说：

“请支持杜达什吧！”

人们在自封为候选人的周围乱成一团，都纷纷抢着在空中飞舞的纸币。但杜达什觉得这还不够。他的匪徒们又捣毁了市内一所最大的百货公司，抢劫了商品乱向人群中投掷，并不时地喊叫道：

“请支持杜达什吧！看，他为了人民不惜一切！”

第二天，10月20日，开始选举主席（现在已是“正式”的了）。在区人民议会大楼里，不仅有第2区的“代表”，还有其他许多区的“代表”。

杜达什从台上宣布了他在一夜间匆忙写成的、代表他的政治纲领的25条。

这是些什么样的条文呢？

请看其中的几条吧，它可以使人们对所谓杜达什的“纲领”有一个了解：

对不同意委员会决议的所有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使用武力。

立即释放红衣主教明曾蒂。

向全世界宣布我們的正当要求。

其他各条的精神也是如此的。

被这样一小撮不知名的代表所选举出来的杜达什，立即开始行动起来了。他需要一个讲坛——通过它可以把自己的“主張”提出来的傳話筒。于是，他就帶領着70名武裝小卒襲击了匈牙利劳动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編輯部，并夺取了它。

他們是怎样夺取的呢？

他們毆打編輯部工作人員，脫光他們的衣服，枪杀他們。在編輯部大樓大門附近，几輛翻倒的汽車起火了。被从編輯部大樓赶出来的人，在自动步枪的枪口下被赶进这火堆里去。在这里行凶的不只是自称为报社的編輯的杜达什，而且还有他的帮手：如象科瓦什这样的人，他对共产党员特别凶狠。

第一期报纸就暴露了独裁者候选人的真面目。杜达什不仅編輯报纸，而且还是許多文章的撰写人。他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广报纸！使用金錢和偷盜的商品，以及在报纸上渲染一些卑劣的活动。

这个法西斯分子进一步要夺取政权。

是什么东西鼓励他这样干的呢？是誰賦予了他这样大的信心呢？

正在那个时候，有一批西方新聞記者来訪問过报纸的編輯，这决不是偶然的事。赶来布达佩斯的有美国新聞記者馬柯尔瑪克和“每日电讯和晨邮报”的工作人員歇波德。

在他們和杜达什之間进行了什么样的談話呢？

他們商量好，在与美国的政策和利益完全一致的条件

下，美国貸款10亿美元給匈牙利。

后来，布达佩斯“奥里温”工厂的一位了解杜达什的无线电技术员罗别尔特·巴恩在談到杜达什時說：“这个人倚靠西方，依靠美援，并打算把匈牙利完全置于美国控制之下。”

杜达什出卖祖国，有人多給錢就行。他手持武器，預領了現金。来自維也納的紅十字会“代表”問及这位編輯是否有錢办他的報紙时，杜达什赶忙回答說，他只是用自己的錢，也就是一个冷藏設備工程师的錢在办报。由維也納来的这位客人馬上就把一万福林交给了他，而且不要任何收据，但是客人提出了他需要的条件，这就是要杜达什馬上与紅衣主教明曾蒂取得联系。

“您为什么不去訪問紅衣主教呢？他是一位明达事理的人，大家都已經訪問了他，”紅十字会的这位“代表”問杜达什說。

这时，联合国开会了。杜达什向外国新聞記者宣称，最近他將出任外交部長，內务部長和国防部長。他还說，匈牙利駐联合国的新代表可能就要去紐約了。

說到了也就办到了！不过不是誰委任的部長，而是自封的。

11月2日，杜达什派了一群武裝喽罗，企图用武力夺取外交部大樓。

关于这一行动，事件的目击者，匈牙利中央軍官大樓的一位首長比斯凱尔告訴了我們。杜达什糾集了200名的一队人后，就命令他們去包圍外交部，并向大樓进攻。

杜达什的战友們闖进了外交部。忽然間，从对过大樓的

房頂上有人向着這邊大樓用機槍掃射起來。杜達什的人們當時很驚慌，他們疑惑這些人是根據依姆雷·納吉政府的國防部長馬列特將軍的命令向“國民衛隊”射擊的。

但幾分鍾后就查明了，機槍手是杜達什派到房頂上去的。他所以要這樣做，是想挑起“國民衛隊”和軍隊之間的沖突，而他自己則可以偷偷地嫁禍于馬列特。

正象匈牙利一句諺語說的那樣：“兩雄不能并立”，兩者必居其一；要不就是杜達什，要不就是馬列特。談到馬列特，他本人就是個反動分子，但他却公開宣稱約瑟夫·杜達什是法西斯分子，他向人民大肆宣揚自己在1945年所干的冒險的勾當。

杜達什似乎覺得自己已是國防部長了。他特下令把自己一個最親近的助手，前霍爾蒂的下士任命為中校。有趣的是，這位新被提升的副官竟向軍官們稱呼“先生”……

不知道，究竟冒險分子要把瘋狂的活動引向何方。很可能，杜達什會當上國防部、外交部和內務部的部長。當匈牙利法西斯分子每時每刻都變得越來越卑鄙無恥的情況下，而依姆雷·納吉政府却對他們一再讓步，結果杜達什便成了最反動的黑暗勢力的適當的代表人物了。正在这時，蘇聯軍隊根據已經掌握了政權的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的請求進入了布達佩斯。當然，杜達什先生的冒陰行為到此也就結束了。

穿紫軍袍的卑污的紅衣主教

當我們走在布達佩斯自由廣場上的時候，無論是清早還是夜晚，那里总是十分熱鬧繁華的。在每逢晚上都從窗戶中

射出明亮的灯光的多层大楼附近，总是停着许多汽车。一些汽车刚走，空下的地方马上就被新来的车占满了。有一些记不清的，颜色鲜艳，牌子新颖的汽车，经常在豪华的大门口前值班。

在镶着玻璃的大门的铁框上，几乎从门楣直到门坎，都蒙着长长的，使用已久的，好象没有熨过的布满皱纹的幕布似的旗子。红色的底子加着白条条，在角上的蓝色方块上纵横都是不大的白星星。

这是美国大使馆。这里总是很热闹，甚至在布达佩斯的灾难已经消失了，生活已开始走向正轨的时候也是这样。

过路的人饶有兴味地瞅着它那宽大的窗户，眼睛扫过幕布似的旗子。从人们的眼光中可以感觉得到，这所房子在匈牙利事件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这里，在围墙以内，在外面遮着星条旗，里面挂着厚厚的窗帘的窗子里面，现在正蜷伏着一个人。这个人似乎还应当发挥他的作用，其实，在匈牙利人民悲惨的日子里他已经起了相当的作用了。这就是红衣主教约瑟夫·明曾蒂——身穿紫袈裟，长着一副威严的脸庞及一双习惯于伸给教徒亲吻的润泽的手的老头子。

这个人物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匈牙利的政治舞台上。由于他进行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活动，于1948年年底曾被逮捕判刑，并长期蹲在监狱里。后来由于主教团方面的请求，匈牙利政府在去年因其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理由把他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从此他就被管制在费尔舍佩特尼堡。

匈牙利事件中的歹徒们把红衣主教拖了出来。当反动势力企图夺取政权的时候，他又得意洋洋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解放”紅衣主教并把他护送至布达佩斯古老官邸去的“偉大的功勛”。是屬於雷特夏格的坦克團副團長安达尔·巴林卡什少校的。

这位“解放者”的身世是很出众的。巴林卡什——是1919年反革命活动家之一巴拉維奇尼，边疆独立州領主的儿子和毕业于留道維克学院的前霍尔蒂軍官。巴林卡什自己冒充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好象是与贵族家族已經断絕关系，甚至更改了自己的名字。关于少校的亲屬关系，軍隊里是了解的，但对他很信任。曾参加过巴林卡什的行动的中士馬尔托·亞諾什說：“还在夜里的时候，就从威別什特向我們的兵营里开来兩輛裝甲汽車，兩輛“胜利牌”汽車和一輛載重汽車，在載重汽車上坐着許多軍官和士兵。軍官們走进兵营就与巴林卡什少校取得了联系。从他們的談話中，我了解到他們冒充自己是威別什特革命委員會的委員，他們想釋放明曾蒂。他們全都武裝起来了。这些人在兵营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就护送着明曾蒂回布达佩斯了。

10月31日，紅衣主教明曾蒂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布达佩斯。护送明曾蒂的工作是由巴林卡什——巴拉維奇尼布置的。前边是重炮，后面是一輛裝甲汽車，再后边是一輛軍用載重汽車，威別什特牌的載重汽車，而最后边則又是兩輛裝甲汽車。

和明曾蒂坐在“胜利牌”汽車里的还有一个神甫。在这輛汽車里还坐着巴林卡什——巴拉維奇尼。紅衣主教先被送到布达佩斯烏里大街的城堡。

在城堡中出現了紅衣主教的藍白兩色的旗帜。六十四岁的老人說道：

“謝天謝地，我的身體很健康。”

他心安理得地和自己的“解放者”一起在記者們的照像機前擺出姿勢來。他對不久以前被從監獄里釋放出來的采訪記者說：

“凡是好人在當時都坐過監獄。”

11月2日，在紅衣主教官邸的不大的一間小屋裏，在照像機燈光閃閃的情況下，紅衣主教舉行了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四十個新聞記者站着和紅衣主教用德語談話。關於這次歷時不長然而極其重要的談話美聯社記者約翰·羅索說：

“紅衣大主教說話很少，他說：‘再過兩天我將要廣播，指出國家應當走什麼樣的道路，’他想把自己的話解釋清楚，就繼續道：‘我們要求西方，特別是幾個大國，在政治方面給我們以支持，並給我們以物質上的幫助。’”

有一個人問紅衣主教說：“您與庇護十二世取得了聯繫了嗎？”明曾蒂回答道：“教皇已來電祝賀和祝福。我自己很想去羅馬一次。我有許多事情要向寶座談。但目前這還不可能辦到。”

是的，在那些日子裏，紅衣主教是不能離開布達佩斯的，因為在他周圍，象萬花筒那樣變化着的政治生活正在沸騰着。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動家”都涌進他的官邸來。上這裏來的還有頗為有名的將軍馬列特，他想與紅衣主教商談政治局勢。

一個新聞記者把在這些日子裏圍繞着紅衣主教宮庭的情景這樣描寫道：

“烏里大街20號的一所兩層樓房並不難找。護送紅衣主教來的坦克和等候謁見紅衣主教的教徒們長長的隊形便是最

正确的指路标。但，站在大門口的士兵不放他們进去。等着祝福的那些人們只好白忙了一陣。而明曾蒂在这一天忙的不是医治精神上的创伤，也不是給教徒們祝福……我們被讓进了走廊，那里有一位文質彬彬的白发先生——匆忙組織宮庭的委員之一——讓我們自由地走到紅衣主教的前厅。在狹窄的接待室里有三十几个人在等着。他們都小声地談論着，但当新来訪問的人走进来的时候，他們就都压抑不住了。每次都可以听到愉快的，充滿惊异的欢呼：“国务卿先生！”，“您好，部長先生！”一听到这些話，你就可以明白，是誰来到了这里了。在約瑟夫·明曾蒂的接待室里，聚集了1945年前統治制度的拥护者。

我們旁边坐着一个上了年紀的妇女，她自称是紅衣主教的远亲，她說：

“现在是季波尔·卡拉依，米克洛什的兄弟，財政部長在紅衣主教那儿。”

一位秘書补充道：

“他們正在討論未來的政治主張。”

听到这句话以后，等待謁見的先生們都跳了起来。他們朝秘書涌来，要求他尽快放他們进去，因为他們正是为了这件事的。”

在这些日子里，有很多“国外客人”訪問了紅衣主教。奥地利“人民之声报”11月1日报导說，匈牙利宗教組織“卡里达新”，即从事向匈牙利派遣霍尔蒂匪徒的那个組織的負責人飞到了布达佩斯。該負責人打算以这个組織的名义把100万福林交給紅衣主教明曾蒂。

身穿紫外衣的这位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10月29—30

日，还在紅衣主教未到首都以前，在大街上和市内廣場上就已經公开宣傳鼓動擁護“明曾蒂政府”了。在拉科西廣場，在這種口號下組織了群眾大會。反革命分子企圖推羽曾蒂為“黨外的政治領導人”，因為他能夠發揮天主教徒的力量。

別列特·烏克考爾11月19日在“紐約先驅論壇報”載文描述當時的情景說：“許多西方專家認為，匈牙利人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會滿意于由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既是共產主義者而同時又是民族主義者的伊姆雷·納吉總理為首所組成的聯合政府的……人們不久就清楚地看出來，在日程上擺着的是成立一個阿登納型的政府的問題。已有某些人士開始要求由明曾蒂成立一個新的政府了……在西方，有人反對明曾蒂，因為他的政治思想是屬於16世紀的。相反地，也有人堅持讓明曾蒂參加最高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應由可靠的民族領袖組成，起攝政的作用，任命總理和內閣等。同時，紅衣主教的某些最親近的擁護者公開宣布了他們對聯合國的請求：要聯合國派觀察員馬上到匈牙利來，並空投武器、糧食和藥品……”

11月3日，星期六，明曾蒂發表了廣播演說：“我，紅衣主教明曾蒂在講話，通過麥克風親自講話。你們听我說，我的話不是裝言”，紅衣主教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演說。

他的演說并不長。情況迫使紅衣主教很謹慎，所以他避免公開地講出他的立場，“在我的演說中，我有意識地不談細節問題，因為我所說的已够清楚了。”他把人民民主制度說成是“破產的制度”。紅衣主教宣布反革命勝利為既成事實。他說：“新制度將要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紅衣主教強調說，一切“有過失的人”都應當由“各方面”來追

究他們的法律責任。

但从紅衣主教所說的关于資本主义的复辟和关于对西方的态度等問題里可以完全看得清楚，他是反革命思想的代言人。过去的銀行家、厂主、地主和貴族們都很欽佩他。而比較有覺悟的人民則看穿了他。

事情很清楚，明曾蒂不是以个人名义出現的，因为在这时候出現了許許多多各式各样的党派和組織。把它們列举一下就够了：“耶穌之心同盟”，“天主教人民党”，“基督教青年党”和其他等等。

反革命分子轉入了进攻。“新德意志报”記者什梯勃和克馬尔11月28日就这些天的事件写道：“从10月30日至11月3日，在国会大厦里充滿了歇斯底里的气氛。霍爾蒂分子开始在伊姆雷·納吉政府中占了統治地位。一些前法西斯分子逐漸夺取了領導者的地位。

新党派头目們已經坐上了美国的新式汽車在布达佩斯到处乱窜。几十种新的日报出現了。这些報紙大肆进行反苏和反人民民主的宣傳。沙文主义酿成了屠杀，在城市和农村殘酷地杀害了許多共产党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資本主义准备复辟，紅衣主教明曾蒂答应把工厂归还资本家。伊姆雷·納吉应当讓位于紅衣主教。

他要为自己的走上政权扫清道路。需要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总理在內——“除掉”。

卡达尔政府的現任部長山道尔·罗奈伊在对德国記者談到关于伊姆雷·納吉政府的最后几小时的情形时說道：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伊什特万·道比和山道尔·罗奈伊兩人都留在国会大厦直到最后一刻。11月4日，

到他們曾經呆過的屋里來了三個穿着霍爾蒂軍服的軍官，命令跟他們走。道比和羅奈伊被帶到第一層樓，這里已經帶來許多共產黨員了。軍官通知說，他們大家都將被帶到地下室。

“我們已經知道，”羅奈伊說，“這就意味着槍斃。正在這時，俄國的坦克車來了，於是我們才得救了。

這時納吉已經到南斯拉夫大使館去了，而紅衣主教明曾蒂則由後門逃到美國公使館里去了。”

但是在这里，在星条旗的庇護下，紅衣主教明曾蒂仍然繼續他那“緊張的活動”。他通過電報和無線電來和自己的羅馬們進行聯繫。在美國公使館避難的這個人的處境，不允許他公開地進行活動，如舉行記者招待會。但，西方的新聞記者們却照常去訪問他，

根據路透社記者喬納德·法爾摩哈，合眾社記者約翰·拉色爾和美聯社記者安德烈·馬爾頓的報導得知，紅衣主教就住在美國公使韋耳茲的辦公室里。

紅衣主教已經把他在坐獄期間寫成的一本書以二十五萬美元的價錢賣給了一家美國雜誌社。11月4日，合眾社報導：“明曾蒂由布達佩斯用無線電話從美國大使館呈托他過去的一位助手——現舊金山的一位神父向西方強國轉達請求開放奧匈國境，以便於暴亂分子獲得幫助”。“我為艾森豪威爾總統祝福，”紅衣主教在結尾時說。

正如許多報紙所報導的那樣，一位基督教組織的領導人把一部影片運到梵蒂岡要放映給庇護十二世看。在銀幕上出現了一個瘦瘦的身穿紫外衣的老年人正激動人心地讀着自己給羅馬教皇的信。但是在銀幕上所出現的並不是一個沒有血

肉的阴魂。紅衣主教明曾諾还活着呢。他住在社会主义的匈牙利的首都“自由”广场上，处在美国国旗的保护之下。这是怎样一种命运的嘲弄，要知道，紅衣主教与自由并没有任何的关联！

是誰鼓吹、准备和进行的 法西斯暴乱

在接触到事实的时候

我們会见了許多匈牙利事件的目击者，青年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妇女們，并进行了談話。我們閱讀了許多各种各样的文件，这些文件都准确地反映了反革命分子的各種罪惡活动。从証明人的叙述，暴乱分子的供詞，资产阶级报纸和杂志的公开报导中，可以勾画出一副由西方反动势力参与准备、并組織进行反革命暴乱活动的完整的图画。究竟誰是反革命暴乱的主要鼓吹者和組織者呢？无可辯駁的事实說明：美国所領導的帝国主义势力扮演了这个角色。

世上很少有人願意看着和平城市和农村变成瓦礫，或是把千百万的青年投入战争的火焰，并因他們的牺牲而高兴，或是听到人类文化遗产——建筑，雕塑等——被爆破的隆隆声使双手，心滿意足地笑了起来。然而这种人也毕竟是有的。最近几年，和平运动的巨大浪潮迫使他們后退了。但是并沒使他們屈服，他們一分鐘也沒有放弃反对人类和平的

活动。现在，他们把匈牙利当做了进攻的目标。匈牙利事件在帝国主义的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详尽地准备了这个计划，并坚决把它付诸实现。法西斯暴乱的准备工作进行了不止一年了。

有这样的情形，即当一个人没有了与对方争论的其他论据时，他就野蛮地动起拳头和木棒来。美国反动势力便使用了这一套。它因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用和平劳动所取得的成就而气得不得了。因此，反动分子便进行起暗害、间谍、破坏和一切阴谋活动，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燃起敌视和仇恨的火焰来。

大家都知道，还在1951年的时候，美国便通过了在国际上前所未有的法案：从国家预算中拨款一亿美元用来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破坏活动。从那时起，美国国务院每年就公开用美元供给间谍破坏活动之用。在人民匈牙利发生的暴乱也是用美元准备的。

美国政治家曾多次公开宣称，他们抱有“解放”东欧各国使之摆脱人民政府的强烈愿望。我们下边举一些这类的谈话。

合众社在报导1956年1月9日杜勒斯在与从人民民主国家逃亡的反动领袖见面时所说的一段话，他写道：“今天国务卿约翰·弗斯特·杜勒斯强调了美国为解放共产主义卫星国的人民而采取行动的诺言，一直到这个运动获得成功为止。这是他在与九个欧洲国家的逃亡领袖历时四十万分钟的会见时所作的诺言。”

杜勒斯在1956年年底在作电视广播时宣布，美国将“支持解放东欧国家的精神”，利用“美国之音”、宣传气球来

进行直接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的活动，企图促使人民民主国家“独裁机构的破裂”。

美国国务卿的这些双关語的宣言与匈牙利是否有关呢？当然有关。不难理解，这些話就是针对地下的反革命而說的，鼓励了間諜破坏分子，唆使他們进行破坏活动。对这一点，現在各国亿万人民都已深信无疑了。

美国統治集团現在企图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他們并没有教唆暴乱，与匈牙利事件毫无关系。但是他們没有办法来証明这点。只要观察一些事实，不可靠的遮盖布馬上就能从美国政治家身上給揭掉了，他們馬上就会把間諜破坏活动的主要組織者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鼓吹者的面貌赤裸裸地暴露在世界面前了。十分明显，美国广播电台，首先是所謂“自由欧洲”无綫电广播中心对挑起匈牙利的暴乱是起了鼓吹作用的。

不是“自由”欧洲之音，而是美国之音

这次談話发生在匈牙利經歷的这些慘痛的日子很久以前。1950年4月在慕尼黑，美国无綫电和电话工作人員协会的負責人哈罗德E·費婁茲从美国来拜訪自己的朋友“自由欧洲”电台欧洲部主任理查·康頓和广播节目部主任西奧多·巴尔。

“怎么样，亲爱的朋友們，”費婁茲向自己的广播事業的同行战友們問道，“請講一講，你們的工作如何……”

被这种崇高的拜訪所激动的“自由欧洲”电台的領導人物都爭先恐后地向大洋彼岸的活動家報告了自己的成績。的

确，有关“自由欧洲”电台活动的谈话内容真是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

“自由欧洲”电台设于慕尼黑附近的一座巨厦里。在一条长达200米的走廊两侧有350间办公室。这里有21个大播音室、影片收藏室等。该组织有正式服务人员1400人。这些人代表着38个民族，还有500名左右的所谓移民。“自由欧洲”电台所属有五个无线电台，每台备有5、6套或者是7套无线电发射机。正式被登记在案的，共有20套无线电发射机以它的名义进行广播。在距离慕尼黑1300英里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设有“自由欧洲”电台的分支机构。在维也纳、伊斯坦布尔和柏林设有专门的检查收听站，以便检查各种广播收听的情况。

所有5个广播电台都同时播送。广播网围绕着重5个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就好像在朝着一个目标射击似的。在一晝夜間，18个小时之内还不断地向其他一些国家广播。当“自由欧洲”电台无论如何也要使自己的广播达到目的的时候，便成立了所谓“联合同盟”：22个无线电发射台就同时向一个国家广播。

有一个庞大的情报机关在为宣传中心服务。35个无线电台是经常地，15个是定期地从事无线电窃听，把窃听来的材料都送到设在什利雅伊斯亥姆的特别局。各个无线电台每天都从什利雅伊斯亥姆收到22万言的加过工的资料。卡片箱之大甚至连费曼兹看了都大吃一惊，其中包括有人民民主国家所有政治家的情况材料。

情报机关訂購了一切出版物，并与能够经常从逃亡者和旅行家那里收到情报的情报中心保持着联系，它拥有自己專

用的情報網——由斯德哥爾摩到伊斯坦布尔形成了一个环形的，有15个据点的情报收集站網。

不，費婁茲先生在了解到“自由欧洲”工作的規模后之所以深受感动不是沒有原因的。他說：

“是呀，你們的活動真足以与美国广播公司的活动相媲美。想要向你們的同事——美国无线电工作人员轉达什么呢？”

康頓对此愉快地回答說：

“我們覺得，沒有美国，特别是美国广播人員的支持，我們簡直沒法工作！”

参加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談話的还有：“自由欧洲”波蘭編輯部工作人員达杰烏什·札瓦特斯基，羅馬尼亞編輯部工作人員諾愛里·別尔那尔特，捷克編輯部主任弗利烏斯·弗尔特和匈牙利編輯部主任安道尔·蓋列尔特。当費婁茲把“自由的声音”——对“自由欧洲”电台允予加强經濟援助的信函——轉交給“自由欧洲”活动家之手的时候。所有这些人都得意洋洋地被拍照下来了。這張照片登載在4月份的美国杂志“电视广播”第50期上。

“自由欧洲”究竟是怎样一个組織呢？它是誰成立的？它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

根据官方材料，“自由欧洲”电台是于1949年組成大名鼎鼎的“爭取自由十字軍”的美国名流們所建立起来的。这个事业中的最有名望的組織人之一，就是前德国美占領区軍事長官克萊將軍。1950年，“自由欧洲”电台开始工作。它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允許設于慕尼黑，作为从事似乎是个人的宣傳的私人企业。大家都知道，它反映了美国官方的意

志，并經常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指示。要想使人相信国务院是私人企业是不可能的。电台的任务就是破坏人民民主國家的生活和发展。“自由欧洲問題委员会”主席，美国人列維斯·高蘭杰对这些任务形容得是足够清楚的了。他說：

“在战争期間，这些国家（人民民主国家——編者注）可以提供軍事术语所說的交通联络地区。我們现在就应当尽一切努力，使它成为居住有破坏分子并在地方上和国家管理机关里潜藏有意工者的地区。”

对在匈牙利組織挑撥、破坏、凶杀和强奸事件方面“自由欧洲”是最积极的参加者。它的所有无线电发射台都完全对准了匈牙利开放。音乐、戏剧节目都停止了。

現在，当匈牙利生活正常化起来，人民在恢复受到反革命破坏的經濟，国家在医治駭人所聞的挑釁行动所給她帶來的創伤时，越來越多的人們都要求惩办流血事件的唆使者。世界各区的輿論对“自由欧洲”电台所干的罪恶活动都在痛斥。甚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領土上也响起了这样的呼声。最近，西德的自由民主党就“自由欧洲”电台的罪恶行徑发出了宣言。在宣言中說：

“在慕尼黑，‘自由欧洲’电台許多年以来一直就在用所有东欧各民族的语言广播着，这些节目都是号召人們反对人民民主国家政权的，与此同时，还允諾說西方將給予大力的支持和援助。这种宣傳不可能不对人們发生影响，匈牙利最近发生的事件便是惊人的例証。我們認為，匈牙利发生的流血事件首先应当大大地归罪于‘自由欧洲’电台的侵略性的宣傳。”

許多西德和法国的報紙都証明，是“自由欧洲”电台唆

使匈牙利人进行暴乱，并允诺从外部帮助来支持反革命分子的。

还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前，在9月上旬，美国前任总统杜鲁门在派克斯堡发表演说时就预告说，华盛顿使进行的反对人民民主国家政府的暴乱可能引起可怕的后果。杜鲁门对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心怀好意的，但他承认了：“所有欧洲人都很了解，在苏联势力范围发生的暴乱，只有在外部世界的武装支持下才可能成功。”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的报导，杜鲁门也指责过那些从事这种挑拨活动的重要活动家，指责“他们奉行残酷的卑劣的政策，玩忽铁幕后面无数的善良男女的生命。”

“纽约时报”11月30日刊载了一篇报导：社会民主党人安娜·凯特拉企图在暴乱的日子里，在匈牙利组织“自己的政府”，在布鲁塞尔做的一次声明中，她情不自禁地说：“自由欧洲”电台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告诉匈牙利人民说，可以从西方得到军事援助。

11月22日巴黎的“世界报”有一篇简短的报导说：“这个无线电台整天对匈牙利广播，目的在于鼓动听众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情绪。这些广播的主题是吹嘘美国的威力和它援助受奴役人民的使命……在暴乱过程中，大概有很多人是响应了‘自由欧洲’电台的号召的……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进行了毫无益处的斗争，难道不是因为他們听信了‘自由欧洲’电台在美国大选前夕的建策吗？那家电台向听众保证说，‘如果武装起义能继续到大选揭晓以后，华盛顿府政就可能站出来关怀匈牙利的問題。’”

公众舆论要求追究“自由欧洲”电台的挑衅行为，使得

該組織的工作人員及其真實的主子們大感不安起來，這並非是偶然的事。情報處的負責人弗蘭克·愛勃特馬上聲明說，這種控訴是謊言。“自由歐洲”電台則聲明說，挑撥性的節目似乎是東德用“自由歐洲”電台的名義廣播的，而軍事援助的諾言則是馬德里的電台和西德的“民族勞動聯盟”電台廣播的。

根據外國報紙的報導，追查“自由歐洲”對匈牙利的廣播的事也還是開始了。

甚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的官方代表們也被迫宣布，對於電台的活动將要“詳加”檢查，這就不是偶然的了。但是，“自由歐洲”電台匈牙利編輯部的領導人蓋列爾特在慕尼黑宣佈說：在目前來檢查廣播的記錄是有“困難的”。在多特蒙德出刊的“西德日報”，11月27日報導說：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外交部委託了一個人來檢查在最近500小時內電台對匈牙利所播送的所有材料。然而並沒有讓把這些材料全部譯成德文。這既使不是對廣播材料檢查的一種諷刺，而是在足夠的內行工作人員幫助下認真加以檢查的話，那麼過去的錯誤也是無法糾正的。只有立即採取行動，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未來再產生新的惡果。”最近，世界各國報紙對“自由歐洲”電台的活动作了非常廣泛而又可強的報導。所談的不只是關於挑撥性的無線電廣播，不只是對匈牙利人民的欺騙，而且這個組織被控犯有極大的罪行。想隱瞞這些罪行是無濟於事的。千百個証人，各國各方面的几十个新聞記者都希望，而也可能在某些情況下又不希望，揭露地球上存在着的這個最惡毒最可憎的集團。

哥本哈根“西海岸報”的一位工作人員鮑列斯拉夫·約

尔凱遜在11月12日的一期上写过，在离开匈牙利后，他随便訪問了“自由欧洲”电台在奥地利成立的一个秘密組織。該組織伪装成私人住宅，有强大的无线电发射器和收音机。整个組織从事情报的分发和加工整理的活动，这些情报都来自匈牙利的特务。他們讓記者看了特务寄来情报的那个国家的据点图。

“自由欧洲”曾大力准备过发往匈牙利的宣傳資料。为了編写小册子和宣言，在霍尔蒂軍官山道尔·卡洛里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司令部，撥出了两个印刷厂。司令部拟就了每个“爱国者”踏上匈牙利的国土后所应当遵循的“备忘录”。这便是要消灭共产党员、先进工人的号召。“备忘录”告訴应当如何組織和进行暴行，如何把和平的游行示威变成一場屠杀。

世界反动势力委托“自由欧洲”把武装队伍、武器、破坏分子和挑撥分子派遣到匈牙利去。德国通訊社自埃森这样报导說：根据来自匈牙利逃亡者的很多材料看，駐在西德的前“普林茨·叶夫根尼”师的前軍人接到通知，要在10月28日在科隆的一家飯店里集合。在这次見面会上，前霍尔蒂軍官向集合起来的人号召要立即給反革命分子以軍事援助。他們声称，在他們手里握有迅速把武装部队派到匈牙利去的工具。第二天，参加集会的人接到由前霍尔蒂軍队中的大將邵尼签名的信件，在信中说，現正与联邦政府进行有关成立匈牙利逃亡者前往匈牙利去的志願軍团的談判。逃亡者被約請到慕尼黑的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匈牙利部去，以便派往匈牙利。企业的领导人接到專門的指示，对所有願意去的人都給予公休假。

当反革命在匈牙利复辟已經毫无希望，匪徒暴乱已被粉碎，而一些可憐的残余已轉入地下时，“自由欧洲”仍然坚持繼續其骯髒的勾当。他与逃自匈牙利的人士和“活动家”們取得联系，并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給他們以支持。

德意志通訊社12月4日自慕尼黑报导，前匈牙利大地主爱斯杰尔哈泽伯爵在暴乱被粉碎以后已逃往慕尼黑，成立了反革命司令部。他在“耶德哈麦里”旅館定居后，便开始大肆活动起来。爱斯杰尔哈泽每天都接見許多匈牙利侨民、美国“自由欧洲”电台的工作人員和匈牙利逃亡分子，并与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保持联系。在爱斯杰尔哈泽的办公室里，經常有反革命分子与美国人的会見，其目的是互相交換情报。

爱斯杰尔哈泽握有大批金錢。“自由欧洲”挑撥之声并没有在空中寂靜下来。請看，意大利“国家报”11月29日报导說：“一位与匈牙利地下組織保持着联系的美国聯絡官在和記者談話时說，为使与匈牙利事件有关的运动得以尽量发展，正在采取一切措施。”該聯絡官使人了解到，一切措施的采取都是为了使空中“尽量充滿关于援助暴乱者的号召。”为此目的，才撥出一些專門的无綫电发射台。

一个意大利的記者反对說：

“这些行动是愚蠢的，它只能造成人們更大的牺牲！”

可是对这个問題，一个美国人都回答說：

“为了使这一問題在联合国大会的議事日程上多占些時間，即使再牺牲几千人，代价也不算过分。”

还有一个問題沒有回答。“自由欧洲”电台是靠誰的錢而存在的呢？

对这个问题，我們还是讓美国报刊来回答吧。“华尔街日报”說，“自由欧洲”电台大部經費来自像这样一些公司，如：“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福特公司”。

而“紐約世界电訊报”則更加坦白地供認說：“在匈牙利，人們能够相信‘自由欧洲’电台是美国‘官方之音’，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政府各情报处之間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这是事实。”

西德“新萊茵报”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証明。它使人想起，“自由欧洲”电台乃是在克莱领导下的一个美国委员会建立的，它的设备用了五千万馬克。此外，美国国务院还撥款1300万馬克用于“購買20万架无綫电，这些无綫电应当秘密設于人民民主国家各处。”

如同人們常說的那樣，注解是多余的！

在紅十字掩蓋之下的是什么

一个匈牙利妇女、法西斯暴乱的目击者叙述了如下的一段事情。有一次是星期六，西方国家为首都的居民运来了第一批粮食，有个說着流利的匈牙利話的外国人很殷切地給我們送来了4車皮白鉄桶，“看来——那些卸貨的人心里想道——这是送来的罐头”。可是这位外国人为什么要警告說，开盒时要小心呢？当时誰也沒有能馬上明白他这話的意思。但是沒有多久一切就都弄清楚了：原来其中有200桶是裝着手榴彈的。

这位匈牙利妇女的談話被登載在11月4日汉堡的“星期

日世界报”上。就在当天，西德当局便把这期报纸给没收了。但，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有关手榴弹的这件事并没有消失。在法西斯暴乱的日子里，反革命鼓吹者越过奥匈边境开始运送粮食和弹药。日以继夜，在匈牙利的道路上都急驰着援助暴乱分子的小轿车和载重汽车，车梯上画着红十字。

“看，在运医药用品。”过路的人心里想，一面闪到道旁让汽车过去。在载重汽车篷里不仅有药品，还有送给匪徒们的武器。“我们在用面包和医药用品援助受难的匈牙利人！”西方报纸兴奋地大声喊着。而自动步枪和子弹也就在这种宣传的烟幕下运到了布达佩斯。这种对反革命分子的援助是经过仔细的考虑和周密的组织的。

二十岁的暴乱参加者伊什特万·考瓦契看见过很多大仓库，这种“援助”就是从那里来的。这些仓库设在匈牙利索木巴特海城对过的奥地利边防据点尼凯里斯道尔夫村和维也纳。“货”考瓦契说，“都装上了奥地利和德国的汽车。在尼凯里斯道尔夫，10月28日那天晝夜不停地运送着货物。”

现在我们再引证几个直接参加事件的匈牙利人的谈话。

罗别尔特·巴恩（布达佩斯“奥里温”工厂无线电技术员）说：“弗斯特子弹是经由奥地利以医药品作为掩护而运来的。其中五十箱被运到布达佩斯基里扬兵营。”

卡洛里·考基什说：“10月4日以前，经过谢高特哈尔特收到了12—15车厢武器、医药品、粮食和礼物：从凯谢格接到5—6车厢。从10月29日起至11月4日止，我们每天都从布达佩斯装运一军用列车。”

犯罪分子德尤拉·考基什被暴乱分子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而后得到了武器，他说：“10月31日和11月1日，我从

早晨九时至晚上五时在通往維也納的一條路上站崗，看到从奧地利来的滿載貨物的大小載重汽車川流不息。每天都有約八百輛的汽車。其中有奧地利的和美國的。”

暴亂分子維里莫什·奧拉赫对在當時說來是非常典型的人物亞諾什·沙鮑做過這樣的描述：“最初我是在10月25日的晚上看到亞諾什·沙鮑的。他參加了和平的遊行示威。當時，在他的周圍開始有一群人聚集起來。亞諾什·沙鮑的行動很自信，很堅決。他一面不停地說着話，一面把三百個人聚集起來，這些人很快便得到了武器。亞諾什·沙鮑的隊伍盤據了賽納廣場。後來，”維里莫什·奧拉赫繼續說道，“這伙人便很好地得到了來自國外的糧食的供應（這包括巧克力糖、罐頭等），衣服和包扎用品的供給。奧拉赫自己則用“瓦里特”式手槍武裝起來了。

在那些日子裡，奧地利駐布達佩斯大使館的附近熱鬧非常。時常有漆着紅十字的載重汽車駛來。這裡有一個倉庫，從倉庫裡分配“援助物資”。按約瑟夫·杜達什先生的說法就是：“10月25日，在大使館附近卸貨的有40輛大小載重汽車。一部分物資是用火車運到布達佩斯的。10月26日有14節載有‘援助物資’的車廂卸貨。領導分配物資的是安德拉什·謝納西。為此，他得到了奧地利大使館的專門許可証。”

這就是為什麼在布達佩斯街道上竟出現了這麼多美國的和奧地利的汽車的緣故。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匪徒用美國和西德製造的子彈朝着匈牙利愛國人士射擊的原因。

为反动派服务的佣仆們

亞諾什·德里安，年20岁。从前他住在布达佩斯維塞格勒街92/3号，当过电工。他在10月初由匈牙利逃到奥地利，企图逃避服兵役。他自己談到他后来发生的事情說：“我們一共是7个人。我們剛剛越过国境，就把我們送到了居辛格，后来又送到格拉茨。在那里，我們被收容到匈牙利宗教团体‘匈牙利卡里塔斯协会’办事处和‘自由欧洲’电台匈牙利部。在那里，謝特·捷尔吉和我們談了話，他詢問了我們并把我們的材料記錄了下来。我們領了錢以后，就被送到薩尔茨堡去了。

“1956年10月25日，有一位C·I·C·（即反間諜队，美国軍事情报机关——編者注）的美国軍官和我談了話。他建議我們过几天以后回到匈牙利去，并答应給予帮助。在此以后，前霍尔蒂將軍巴拉又接見了我們。他說，美国人很快就要从西德給我們送武器来。收到武器后，我們应当回到匈牙利去。

“还在薩尔茨堡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大批武裝的霍尔蒂分子被派遣到匈牙利去了。

“在我們到格拉茨城去的前夕，召开了一次大会。宪兵上校拉奥什·豪尔瓦特對我們講了話。他号召所有匈牙利人都要拿着武器回到祖国去。

“10月29日，我隨着由10个人組成的一伙越过匈牙利国境来到了塞特高特哈尔德（邵木巴特赫西南42公里），我們是得到了奥地利边防軍的許可，完全公开越过国境的。

“我們來到匈牙利是為了支持暴亂分子的。在布達佩斯發給我一張國民警衛隊的證明。在證件上有杜達什的簽名。”

和亞諾什·德里安一起跑到奧地利的還有別拉·考胡特，他也是來自布達佩斯的一位20歲的電工。“10月27日，”他說道，“我們由美國人那里領到了1500奧地利先令。我也知道，有300名武裝的霍爾蒂分子已由維也納被派到匈牙利去了。在格拉茨開完了大會以後，我在拉奧什·豪爾瓦特名下領了錢。在越過國境的時候，有帶着紅十字標記的帶篷的載重汽車正和我們沿着同一個方向川流不息地行駛着……”

只這兩個青年人的敘述就足以揭露法西斯暴亂的領導者的秘密行徑了。如果亞諾什·德里安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剛一越過奧地利國境就被物色了去，可見準備人選以便派遣到匈牙利去的工作在暴亂以前早就開始了。

許多无可辯駁的事實證明，為了支持反革命，在10月底和11月初，便把幾千個人由奧地利派到匈牙利來了。成批的武裝反革命分子乘飛機、大小汽車、火車都涌到布達佩斯來。

10月25日，一伙100人的武裝匪徒出現在赫德什哈洛本車站（耶普隆城東北）這股匪徒是由奧地利和西德來的。10月27日，又有一股100人的匪徒手持武器在謝特高特哈爾德地區越過匈牙利國境。就在同一天，又有一股由“自由歐洲”電台領導人所組織起來的300人的武裝匪徒被派遣進來。在薩爾茨堡（奧地利）的“格拉澤巴赫”集中營和在維也納蓋德爾什公路的集中營里的匈牙利逃亡分子也急于前來支持暴亂分子。

在奥匈边境上有一个叫乔契——克留茨的小村。在暴乱的日子里，这里盘据了一股外国情报人员。他们与匈牙利的暴乱分子和“自由欧洲”电台保持着联系。其中有一个头目，高高的个子，黄头发，二十三、四岁，匈牙利语说得很好，不过稍带有德国口音。他有3个助手，看样子是匈牙利人：一个是个子高高的，40岁的男人，大大的鼻子，一头白发；一个是中等身材的中年人，瘦瘦的，黄头发；一个是个子不高，瘦瘦的男人。他们彼此都用德语谈话。

这4个人的那辆小汽车始终停在国境附近。猎人等待着猎物。11月上旬，纳道尔·豪尔瓦特白郎普隆往奥地利逃跑。他在越境时到了离这辆汽车不远的地方。这4个人把他叫到跟前，答应给他帮助，把他带到乔契——克留茨村，在那里给他开了一个房间，请他吃了早饭、午饭和晚饭。第二天，他们就给了纳道尔·豪尔瓦特任务，让他回到匈牙利去，并在那里收集他们所需要的情报。

与这4个人有联系的还有一个绰号叫“拉茨大叔”的间谍。有一次，这个家伙企图亲自在白郎普隆附近越过匈牙利国境。当匈牙利边防人员诺麦特上尉要拘留他的时候，他的两支手也不从口袋里抽出来就开枪射击了。

是谁竭力企图想从秘密巢穴里钻进匈牙利的城市和农村呢？西方反动势力把谁派到了匈牙利呢？为了进行阴险的勾当，有许多是天字第一号的土匪和凶手、干过前朝事的人和那些为了金钱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被征募了。法国“解放了的巴黎人报”记者安德烈·加农在维也纳会见了那些在暴乱的日子里曾经被通过奥匈边境派遣到匈牙利来的人。这些是些外国军队的参加者，他们曾经镇压过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

人民取得胜利以后，这些佣仆們便居住在法国。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刚开始，他們馬上就离开了那里。安德烈·加农报导說，有300多过去参加过外国軍团的人为了支持暴乱分子而越过了匈牙利国境。

10月30日的晚上，几股匈牙利逃亡者由西德經過奥地利来到匈牙利。他們曾經一度加入过“謝特—拉斯洛”师。这是些專門杀害进步人士的老牌的霍尔蒂分子。他們穿上了匈牙利的軍服，可是武器則是由美国人那里領来的。

請看，下边就是一个經過奥匈边境被派来的匪徒的簡历。伊什特万·考瓦契，生于匈牙利赫温什省乔杰什村。在1948年的时候，他就逃到了奥地利，被法国外国軍团所征募。在那里，他受到了杀害越南和阿尔及利亞和平居民的專門訓練。1955年，伊什特万回到了匈牙利，不久又逃到了奥地利。考瓦契失去了祖国，在他的心灵上已經沒有一点点神圣的东西了。他随时都准备着拿起武器来杀人。在奥地利，他領到了錢后就被派到薩尔茨堡的“格拉泽巴赫”匈牙利逃亡者集中营。他在那里舒舒服服地住了一个時間。可是他的主子馬上就要他报答。1956年11月4、5、6日，他和住在維也納西車站对过旅館里的“拉茨大叔”一起乘坐小汽車来到奥匈边境上的乔契——克留茨村。在那里，“自由欧洲”电台的新聞記者們訪問了他。后来他便被派到匈牙利去了。

另一个犯罪分子杰尔吉，与考瓦契也沒有多大的区别。他也一度住过匈牙利，但犯罪后怕受审判就逃到奥地利去了。在那里，他也落到了一些对各种犯罪分子都“很关心”的人們手里。他被派到慕尼黑，后来就到了紐倫堡，在那里設有一个甄别营。在匈牙利事件爆发之初，杰尔吉很快就被

派到慕尼黑。他在那里受了專門的訓練。教他的是一个“自由欧洲”电台匈牙利广播部的工作人員和一个美軍上尉。这位上尉的姓名，杰尔吉已經記不起来了。这位上尉的翻譯是美軍中士亞諾什·巴尔凱尔。和杰尔吉一起受訓准备派往匈牙利的还有兩個人——弗朗尼奇和烏魯什。

不久以后，杰尔吉領到了一架“爱克札克塔”牌的照象机，并接受了任务：回到匈牙利，查清暴乱的人数，以及他們需要什么帮助等等。一天晚上，他和50个人一伙乘坐汽車由慕尼黑去到薩尔茨堡，然后就到了弗尔斯杰瓦里特。破坏分子在耐特高特赫尔德附近越过了国境。

西德的反动分子也向匈牙利事件伸出了手。过去的党卫軍分子积极地支持反革命暴乱。11月初，前希特勒軍隊里的軍官奥托·弗朗凱少校出現在布达佩斯。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党卫軍軍官。“10月27日，”奥托·弗朗凱說，“我接到書面指示要随战地医疗队到匈牙利。28日我們就到了慕尼黑，而后到了維也納。后来，就順利地越过了奥匈国境。”奥托·弗朗凱，这位建筑器材企业的主人，被派到布达佩斯不仅是为了治疗暴乱分子，而且还有着“更重要”的任务。在医院里設有一架电台。6个无綫电报員用密碼电报經常与波恩保持联系。

对广泛組織武装力量支持暴乱以及如何在奥地利組織“匈牙利政府”，司机阿尔諾里特·比哈里（納吉瓦拉特城生人）作了如下的叙述：

“11月1日，我和3輛載重汽車一起由基里安兵營去到奥地利裝运粮食和医药用品。这些东西我們应当在尼凱里斯道尔夫或者維也納从在奥地利的匈牙利宗教团体“匈牙利

“卡里塔斯协会”和在那里的紅十字会領取。

当一排軍用載重汽車越过奥匈边境的时候，我偶然地离开了他們而一个人留在尼凱里斯道尔夫。为了不落入逃亡者集中营，我就受雇用到“卡里塔斯协会”工作。这个組織完全被掌握在前霍爾蒂軍官和羅馬教皇的手里。在尼凱里斯道尔夫領導該組織的是天主教神甫伊什特万·馬喬吉，而給他指示的則是紅衣主教明舍蒂的秘書維切茨博士。

作为通訊員，我每天要到維也納去兩趟，在那里的“列吉納”旅館里設有逃亡者中心機構，領導它的是費倫茨·別杰。就在这个旅館里還住着扎坦·考瓦契——“自由歐洲”电台匈牙利廣播部總編輯。甚至連从匈牙利國境綫上得到的最无关緊要的消息，伊什特万·馬喬吉都馬上向維也納和林茨，向“卡里塔斯协会”的中央機構匯報。瓦尼捷爾博士很快就在尼凱里斯道尔夫出現了，他在那里採取了相應的措施。在“卡里塔斯协会”里還有一個逃亡分子——伊什特万·英茨，他從前在布達佩斯阿里耶爾道索爾大街住過。他把霍爾蒂的將軍、軍官以及來自各國的，特別是來自西方的有法西斯情緒的人們都組織了起來，企圖越过匈牙利國境去幫助暴亂分子。在這裡隨便提一句，奧地利和德國當局隨便便地就把這些人放了過去。

有一次，當我在“列吉納”旅館門前站着的時候，明舍蒂的秘書維切茨博士建議我參加安娜·凱特拉組成的政府。這個政府是在邵普隆城成立的。他們對我說，這個政府由逃亡分子組成是不方便的，而我參加工人運動已經三十年，可以當交通部部長。維切茨、扎坦·考瓦契和伊什特万·英茨率領一幫美國和奧地利的新聞記者，分乘三輛汽車來到邵普

隆，安娜·凱特拉就住在这里。在由維也納出來的路上，我們忽然被奧地利的警察逮捕了，可是維切茨馬上又被釋放了。他坐上出租小汽車就到奧地利某個部去了，過了30分鐘以後我們大家也被釋放了。後來我們所說，安娜·凱特拉離開邵普薩準備去美國。”

請看，匈牙利反革命暴亂的鼓吹者的計劃已經到了什麼程度！他們不僅是用武器來幫助暴亂分子，而且还組成了有利於他們的“政府”，這個政府企圖在匈牙利執政。

形形色色的反動分子象蜘蛛一樣地都從暗窩里，從歐洲的各個角落裏爬到匈牙利來。這裡聚集了最殘暴的法西斯分子、霍爾蒂分子、尼拉什分子——他們憎恨社會主義，他們始終不肯放棄過去的、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的想法。背叛祖國的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也從秘密的巢穴里鑽了出來。在這裡，我們引一段住在西德的一個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比薩加所說的話。

在匈牙利事件爆發的幾個星期以前，比薩加從民族主義分子的領導人之一弗拉第米爾·列尼克那里知道，班迪拉、卡恕巴和連卡夫斯基，根據他們頭子們的指示，已經在奧地利境內成立了約10個縱隊。這些縱隊的隊員都是從事顛覆破壞活動的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中招募來的。

“今年8月里，”比薩加說，“班迪拉和連卡夫斯基曾親自去奧地利考察那些縱隊的戰鬥準備情況。他們在回到慕尼黑之後參加了一次秘密會議，對准备工作表示滿意。

“在匈牙利事件之前不久，我偶然從列尼克那里所說，8月里在奧地利境內成立的隊伍將被派到匈牙利去進行顛覆活動。列尼克告訴我說，我們正處於重要事變的前夕，他建議

我去匈牙利。他向我保證說，我这样干决不会后悔，并且保証我將获得优厚的报酬……”

“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弗拉第米尔·列尼克自己冒充是烏克蘭逃亡民族主义报刊的工作人员来到奥匈边境，并把他的組織中的匪徒由边境派进匈牙利。班迪拉組織的領袖依万·卡恕巴又从慕尼黑及其附近地区增派了几队人去到边境。他們的任务是进行恐怖活动。

“这些队伍，”比薩加又說，“携帶着用俄文、烏克蘭文和匈牙利文印成的傳單，而且他們还装备着美国武器。”

酷似霍尔蒂叛乱

大家都知道，各种各样的匈牙利法西斯組織都在美国、西德和其他国家找到了庇护所。这些馬蜂窝在匈牙利事件的前夕都活跃起来了。

費倫茨·納吉乘專机从美国飞到了奥地利。此人过去曾任匈牙利的总理，在1947年組織过反共和国的阴谋。同他一起飞来的还有“美国匈牙利人解放委员会”陆军部的领导人、霍尔蒂军队的上尉季波尔·埃克哈特。这些瘋狂的反动分子都轉移到了匈牙利的附近，以便领导暴乱。

費倫茨·納吉在奥地利各地周游，为的是檢查一下在薩尔茨堡、格拉茨和林茨組成的匈牙利侨民队伍是否已經訓練和装备好了。这批事先就被訓練好的祖国叛徒的部队約有11,000人左右。

在匈牙利事件开始的前夕，真是奇怪的偶合，所有从前被赶出匈牙利而現在住在華盛頓的反动头子都在巴黎出現

了。美国評論員皮尔遜对于这件事曾諷刺地指出：“他們也許得到了关于即將来临的事件的預告”。各叛乱組織領導人的聚會是有一定目的的：他們在向匈牙利投送人員、武器和宣傳品的問題上最后達成了協議。聚集在這里的有法西斯新叛乱的所有主要組織者，其中包括“匈牙利五將軍委員會”——匈牙利各僑民組織的最高軍事機關。據德國報紙報道，美國駐西德武裝部隊的代表，埃·杰克遜少校曾參加了會議。杰克遜向這伙流亡分子承諾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質援助，包括往匈牙利運送人員和武器用的卡車、飛機在內。這位美國少校充分實現了他的這個諾言。

杰克遜的其他同胞則表現得更不謹慎了。十月事件時期在布達佩斯的山多爾·裴多斐飯店工作的伊勃雅·埃爾捷告訴了我們在布達佩斯人所共知的一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在這次事件開始前的幾天，美國駐布達佩斯公使館的汽車曾經周遊市內的街道。他們從汽車里拋出了糖果、巧克力、橘子……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呢，是不是打算在暴動的前幾天使居民與“大洋彼岸的和善的叔叔”建立良好的關係呢？

一架四引擎的美國飛機于10月17日在布達佩斯的費列赫達機場降落一事也是很耐人尋味的。在它停留在機場上的3天中，曾組織過布達佩斯人到飛機上去“參觀”，不過不是所有願意去的人都能去，而是美國人所挑選的人才去的了。

“自由歐洲”電台和“美國之音”電台在暴亂期間每天都在對暴亂分子們許着願，說美國軍隊馬上就會來援助他們了。在當時充斥于全城的傳單上的也都是這種說法。布達佩斯的居民雅諾什·雷談稱：

“在暴亂分子中間盛行着一種謠言，說還應該再堅持几

天，那时候美国军队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军队就要开到了。”

某一个美国驻布达佩斯的外交人员，满想反革命会迅速取得胜利，因此竟揭开了假面具，公开行动起来了。美国武官杰姆士·陶得上校于10月23日“游历”了布达佩斯全市。他利用自己的外交官身份，肆无忌惮地参预了十月事件，尽力使反动派能占上风。他的汽车在一伙武装人员身旁停了下来。这位上校爬出了汽车，然后发表了受到这些法西斯亡命徒热烈欢迎的煽动性的演说，亲眼看到匈牙利青年大街的乔凯里路上的这一幕好戏的人们向我们叙述了这件事。

陶得上校并未以完成上述使命为限。当盘踞在基利安兵营里的暴乱分子已经打算放下武器的时候，这位美国武官的汽车在附近出现了。陶德与暴乱分子举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来他们就又继续进行抵抗了。

毫无疑问，美国武官以迅速支援的诺言给他们“打了气”！

不惜一切代价以煽起暴乱——这就是匈牙利反革命势力的外国领导者们所奉行的极其明确的路线。国际反动派把法西斯分子派到那里去，企图借助他们来扼杀匈牙利人民的自由。甚至西方的资产阶级报刊都不能掩饰法西斯主义在匈牙利已经抬头的事实。

我们打算在这里摘录几条西方报纸上的消息，这些消息像镜子一样地反映了匈牙利各法西斯团体的国际联系以及他们想在國內建立最反动制度的坚决愿望。

11月20日的“柏林日报”写道：“在匈牙利的流血事件中，有受过训练的匈牙利流亡分子参加，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确定无疑的事实。有人在慕尼黑获悉，在上巴伐利亚，在

特朗斯頓附近，有一个美国领导下的軍营，軍营中有佛朗哥西班牙的軍官和匈牙利法西斯組織的人員負責进行游击战术的訓練。在10月20日以后，有一大批亲德的匈牙利人来到这个軍营，这些人就是由于参加过德国党卫軍部队而在1945年逃到西德去的那些人……他們在慕尼黑的希美尔大街十号有着自己的組織。

“特朗斯頓軍营的“游击队员”們于10月24、25和26日分批被送往奥地利，再由那里乘救护机和救护車开往匈牙利。他們的任务之一是煽动匈牙利的少数德国人起来进行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斗争。”

該报补充說，这些法西斯分子有一部分目前已經回到特朗斯頓軍营。当慕尼黑的新聞記者們企图与他們談一談的时候，美国当局的代表不准他們进入軍营。該报証实說，在10月20日以后，在慕尼黑以及慕尼黑附近的机場上出現了一批一批的来自列根斯堡、斯图加特和其他西德城市的匈牙利人的武装集团。这些法西斯分子在与慕尼黑居民談話时公然无耻地声称，他們要“象主人那样地”回到匈牙利去。

美国“紐約世界电訊太阳报”于11月17日报导，消息灵通人士証实：“盖倫將軍的訓練有素的情报网”在組織暴乱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里順便指出，盖倫將軍是直接隶属阿登納总理的，他那一群人的活动經費是由受阿登納支配的專門款項中撥給的。这篇文章在报上的标题是这样的：“不露面的人促进了匈牙利的暴动。”盖倫在西德被称为“不露面的人”，因为他的活动是严守秘密的。他的組織有5,000名以上的固定的特工人員，活动范围包括了欧洲的大部分。

外国报纸对于反革命暴乱的性質給了确切的評價。

法新社于10月31日称：“已经证实，一些严密的军事组织以疯狂的速度在匈牙利西部建立起来了……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都令人想起霍尔蒂在1919年的叛乱。”

英国“雷诺新闻”称：“目前存在着建立一个在霍尔蒂和萨拉什的追随者们领导下的极端法西斯制度的可能性。”

英国路透社称：“根据若干消息报导，一些前法西斯运动的参加者正企图重新组织自己的政党……全国各地都在演出这样的一些场面，令人想起‘白党’在1919年重登政治舞台的局面来。”

西方国家统治集团在匈牙利恢复资本主义的绝望的尝试破产了。不论是秘密的阴谋，不论是武装的雇佣兵，还是对暴乱分子的慷慨援助，都帮助不了他们！

现在，反革命暴乱的领导者们一面哀悼他们的计划的失败，一面企图使死去的东西复活。某些美国国会议员尽力鼓动转入地下的职业反革命分子，发表了許多煽动性的声明。前国会议员卡尔斯坦由于曾对规定拨出一亿美元资助对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破坏活动的“共同安全法”提出修正案而“名噪一时”。卡尔斯坦在密尔霍基发表演说时，公然号召美国发动“政治攻势”来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势力。美国参议员薛明敦在华盛顿声称，美国应该积极干涉东欧各国的事务。艾森豪威尔的私人代表约翰斯顿向美国的电视观众说，他的国家“应该鼓励”类似匈牙利这样的事件。

美国参议员道格拉斯、肯奈第、汉弗莱、蒙特和伊诺斯最近也发表了同样的一些声明。

美国代表团为了同样的目的——加强破坏活动并加强美国对各人民民主国家内政的干涉，在联合国提出了派遣“联

联合国观察員”赴匈牙利就苏联援助匈牙利人民镇压反革命叛乱問題进行談判的可耻的議案。

民主党在众議院的領袖馬考克供認，派遣“联合国观察員”赴匈牙利的挑衅性決議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匈牙利的反革命地下活动。

当然，叛乱的組織者打算使匈牙利的国内生活重被瓦解，并使匈牙利的城乡各地发生新的流血事件，但是这个願望已是无法实现的了。

与卡达尔同志的談話

匈牙利的国会大厦位于多瑙河岸上，紧靠着河水。这是一座高大的，白石头砌成的，有着一些奇异的圓屋頂和由于時間关系变成綠色的尖頂的大楼。

它那兩座寬大的側厅伸向廣場，好象是从兩面把廣場包圍起来似的，并且几乎与对面的几座楼房联成一片，構成了象合唱队的队形那样一个長方形的东西。

这座宮殿的内部还要更加美观，在我們沿着非常寬闊的楼梯上楼的时候，立刻就感到了这一点，有四名民警人員和兩名軍官营的指揮人員檢查过我們的証件。

楼梯上鋪着淺紅色的地毯，所以我們的脚步声很輕。大厅、走廊、过道，一处比一处更豪华、庄严，使我們的眼睛簡直应接不暇。

我們走进了雅諾什·卡达尔同志的办公室。

今天，11月26日的晚間，他答应接見我們这些苏联記者，并且进行談話。

关于这个人的事迹，我們在最近时期听到的真不少！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总理，是个老共产党员，也是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在拉科西时期曾坐了几年监狱。在匈牙利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当法西斯匪帮几乎将要在街头上取得血腥的胜利的时候，他有着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将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责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接待室里被枝形挂灯照得通明，屋里面有几个人。

人們从鄰室里出出进进，里面坐着秘書、打字員、翻譯等人。

雅諾什·卡达尔同志完全出乎我們意料地亲自来到了接待室。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服裝，長得虽瘦但却结实的人。他与所有的人都打了招呼。初看起来他大概有45岁的样子，橢圓形的臉，尖下颚，頰窩很深。头发平直，向后梳着，露出了高高的額头。他那一双奕奕有神的黑眼睛里射出含有笑意的小火花，在眼睛深处时而燃起，时而熄灭，使他整个臉上都現出真誠和友愛的神情。

我們被介紹过以后就穿过秘書室到办公室里去了。

談話是圍着一張大圓桌进行的，可是与高大的办公室比較起来就显得不很大了，这使大家互相接近起来，最后甚至使处身办公桌的咸觉都消除了。

雅諾什·卡达尔同志操匈牙利語，話說得并不快，以便給我們的譯員以从容翻譯的机会。

当談話涉及苏联軍隊駐扎在匈牙利領土上的問題时，雅諾什·卡达尔同志說道：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苏联軍隊是根据匈牙利政府所簽訂，并經匈牙利国会所批准的条約和协定而留駐在匈牙利

的。苏联军队对粉碎匈牙利反革命势力所給予的援助也是根据匈牙利政府的請求。我必須說明，关于苏联军队对匈牙利人民进行援助的决定，不論是对匈牙利政府，还是对苏联政府說来，都不是一种轻举妄动的事。你們会問：‘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們清楚地知道，敌对的宣傳会利用这一点指挖苏联干涉我国的內政。对于苏联政府說来，这不仅是人員的牺牲和物質損失的問題，而且是道义上的責任的問題。匈牙利政府在权衡利害以后才决定了請求这一援助，而苏联政府同样在权衡利害以后才决定了給予这一援助，这种情况也說明了这样做的严格必要性。”

雅諾什·卡达尔同志停頓了一会儿以后又接着說道：

“苏联政府对匈牙利人民进行援助，不仅是履行条約所規定的义务，而且也是深刻理解了当时的复杂局势的結果。苏联政府不仅做到使匈牙利停止流血，阻止資本主义在我国复辟，而且还防止了可能产生的战争温床的出現。是否有过产生新战争的实际危險呢？毫无疑问是有过的。

“应该指出，在匈牙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有一些領土并入了鄰国的版图。众所周知，每一个与匈牙利接壤的国家里都有一些匈牙利人。仅仅25年以前，在霍尔蒂政权时期，匈牙利曾經經常提出領土要求，这就成了匈牙利与許多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非常明显，如果反革命势力在我国取得政权，那么他們在第二天就会手执武器来反对各鄰近国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此，苏联对匈牙利的帮助也使其他一些国家得到了好处，替他們解除了战争的威胁。”

“还不能不指出这个問題的另一个方面，”卡达尔接着說道，“大家都知道，由各种各样的霍尔蒂殘余分子和宪兵

組成的部隊已經在西德存在8年了。他們被武裝起來。試問，這是為了什麼目的呢？這些部隊的真正使命在最近事件的日子裡表現出來了。這些隊伍被利用來對匈牙利反動派進行援助。如果這些人竟然把政權奪到自己手中，那麼他們就會遵照他們外國主子的指示行事，對於這一點是永遠也不應該忘記的。”

在停頓了不算長的一段時間以後，卡達爾說道：

“我還要談到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國外報刊上對於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和聯合國觀察員要到匈牙利來的事談論得很多。為什麼我們拒絕了這些建議呢？

這是根據法律程序上的考慮。匈牙利事件——這是屬於我國內政範圍的事。我們堅持我們自己的主權。然而，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些方面。10月30日的停火是單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不只沒有停火，而且還加劇了屠殺和暴行。而當他們受到反擊以後，他們就象人們常說的那樣……”

說到這裡，卡達爾同志笑了起來，使用了一句很難譯成俄語的匈牙利成語。他滿臉帶着動人的微笑，長時間地幫助翻譯選擇適當的語匯，直到最後，翻譯終於譯出來了——“陷入窘境”。

“是的，是的，”卡達爾點頭說道，“當時反革命分子的一切號召都歸結到下面的一點：‘再堅持一些時候吧，美國軍隊就要來到了，再堅持一些時候吧，聯合國軍隊就要來到了。’在許多人的概念裡美國軍隊和聯合國軍隊之間是沒有區別的。因此，任何一個聯合國的代辦到匈牙利來的事實本身就會使人們的頭腦產生混亂。某些暴亂分子一定會不願放下武器。當我們正在盡力團結人民的一切力量的時候，這種混

乱乃是一种倒退。

順便說一句，在这一时期，外国报刊派来匈牙利的代表已有六百名以上，他們一切都已經看到了，沒有任何秘密瞞过了他們，为什么还需要派观察員来呢？上述的新聞記者們在武裝抵抗已被粉碎，一切都已分曉以后就到各地去游历了。至于联合国秘書長，已經寄給了他足够数量的材料、文件、証据性的供詞。我們建議我国代表与联合国秘書長在羅馬会見，这次会見沒有实现，而这都不是由于我們的过錯。”

接着，卡达尔同志又談到匈牙利国内情况的一些問題。

“我們的基本路綫，”他說道，“就是团结人民的一切力量，以便前进。当然，我們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一些障碍，但我們充滿着能够消除所有妨碍我們团结的一切的信心。我們知道，一方面有反革命分子，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暂时誤入歧途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各种势力的影响之下提出各式各样的政治性要求和經濟性要求的知識分子。在这些要求中有些是毫无根据的，是妨碍我們团结的。我們指出，这些要求是不适当的。我們从納吉政府的經驗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們知道满足反革命的要求会产生什么結果。要求从政府中撤掉某个部長，这个部長被撤掉了；再要求撤掉另一部長，又取得協議了，这样就沒个完了。納吉政府变更了这么多次，最后連人民都可能不認識它了。不过，劳动者有一些要求是完全合法的，只是目前还无法实现。在生活沒有正常化以前，在国内秩序沒有完全恢复以前，这些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

举手贊成这一个或那一个經濟上的要求并不困难，但是必須具有实现它的一定基础。然而我們目前还生产得很少。举例來說，究竟怎样才能滿足关于提高工資的要求呢？当

然，可以把印刷机大大开动起来，印制鈔票。不过这些鈔票是必須用商品来加以保証的，这就是說，必須工作。我們將进行工作，建立秩序，那时候才可能考虑扩大政府組織成份的問題和各种經濟問題。”

我們的談話至此已經延續了整整一个小时。當我們站起来告別的时候，雅諾什·卡达尔出乎意外地把我們止住了。

“在結束时我願意指出，”他說，“关于我所主持的政府，国际反动派散布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謊言。然而沒有任何一个人說，而且也不可能說我們是銀行家和地主的政府。我們是劳动者，我們是工农政府，而反革命势力感到遺憾的，正是在于我們不是銀行家和地主的政府，而是工农政府。”

我們在告別时便勁握着这个人——他有一付彪額、安靜的臉孔和一对明亮的眼睛——底有力的手。

我們后来在还很恐怖和不安定的布达佩斯曾經多少次想起了这次談話結尾的几句话啊！

不錯，反革命势力对于匈牙利政府是个工农政府这一点感到非常遺憾！他們又怎么会不感到遺憾呢！要知道，甚至供未来的匈牙利王朝使用的皇冠都已經准备好了！这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夸大其詞的說法，而是实际的事实。12月21日的英国“每日快报”报导說，在匈牙利反革命开始以后，立刻就將匈牙利君主的皇冠从美国运到西德的維斯巴登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將它运到美国并保存起来，等待——正象現在所表明的那樣——“大好良机”）。

这可怎么好呢？我們只能夠說这样一句话：“太着急了，先生們，你們太着急了！……”

与各种人的会见

初 雪

11月23日早晨，我們走出了旅館，打算在街上漫步一番，在人群中挤一挤，象人們所說的那樣，收集一下对于这个新的、不熟悉的城市的印象，不論在馬路上和便道上，还是在树枝上和屋頂上，都鋪着白白的一层雪。布达佩斯的这一次初雪下得比平常要早得多。他立刻使城市变得安宁和平靜了。

街上到处都是小孩——学校还没有开课。頑童們激烈地战斗着。雪球在人行道上飞来飞去，不但打在“敌人”身上，而且打在不慎进入“战场”的过路人身上。兒童們在滑雪橇，甚至溜起冰来。看起来是很可笑的，两个頑童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汗流满面地打算在鋪着松软的一层雪的石头馬路上溜冰。但是，象俗語所說的那樣：有志者事竟成，他們居然溜起来了。

在多若廣場的中央，在人行道的旁边，有一个中年男子正蹲在那里堆雪人。有一个小姑娘站在旁边，兩眼发出光彩。这位父亲的臉上显出沉思的神气。他在早晨的大好时光里在这廣場上与一群小孩在一起，因为他遵照全市工人委员会宣布自11月23日起罢工兩天的号召而没有上班去。

不只他一个人响应了这个号召——街上人这样多絕不是偶然的。可以看得出来，他們显然不是到班上去的。不慌不忙的，时常停下来与遇到的熟人說上几句话。

但是，并非所有的布达佩斯人都追随全市工人委员会。也还有另外一个号召：“大家都去上班！”这个号召是切佩尔工人发出来的，它很快就傳遍了整个首都。我們自己也確信是如此情形：馬路上时常有工人騎着自行車走过去，在車架上或車把底下帶有装着夾肉面包的小包，有时則帶着热水瓶（里面装着的一定是咖啡，咖啡是布达佩斯人最喜欢喝的），騎車人的兩脚迅速地蹬着踏板。經常还有卡車开过去，車箱里的人手里或腋下也都有同样的一些小包，不仅切佩尔，許多紡織工厂也都开工了。

市里的人們在晚間获悉，切佩尔的工人在一天之內生产了80吨鋼。你想一想吧，也許你說80吨鋼又算得了什么呢！不然，这絕不是一件小事！要知道，就在几天以前，切佩尔的馬丁爐还冷冷清清地，忧郁地站在那里，好象是正常生活的洪流停頓下来的象征。这第一批鋼表明了初步的胜利，表明它是对复兴国家的最初的貢獻。

这场雪使得許多布达佩斯人措手不及。我們头一次看到一个妇女用冻僵了的兩手撑着雨傘——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防雨，而是为了擋住鹅毛般的雪片。一輛載有油漆一新，裝好玻璃的窗框的馬車赶到高尔基街的一座三层楼房前面，在便道上留下4条黑色的輪迹。两个男人小心翼翼地把它們从馬車上搬下来，一个一个地搬到門道里去。这些窗框很快就出现在这座楼房的窗戶上了，这些窗戶原已糊上了紙或釘上了三合板。由于反革命叛乱使布达佩斯遭到破坏的阴曆痕迹

正在消失。我們看了看樓房的主人怎样專心一志地在窗戶旁邊奔忙不休，拍了幾張照片，就又往前走。

幾個提着裝水果的手提包的婦女，從我們身邊走了過去。她們與男人們不同，顯然是很匆忙的：在商店里還得站隊，买东西必須趁亮，以便在天黑以前回到家里去。要知道，城裏仍然還有搶劫案件發生，這是在叛亂期間從監獄中放出來的那些刑事犯們干的。

在地下鐵路入口處我們與布達佩斯人作了今日第一次的談話。我們正站在那裏觀看從地下車站上來的人群，有一個蓄着兩撇灰胡子，穿着冬天裝束的矮胖的人走過來問我們一些事情。我們攤開了兩手，困窘地說了一句俄語：“不懂”。他突然笑了起來，開始與我們握手。

“你們是俄國人嗎？我會說兩句俄語……”

我們彼此認識了一下。這老人名叫約瑟夫·克利斯堪。他的職業也弄清楚了，他是個玻璃匠。於是，很自然的，我們很難抑制自己不問他一句：

“你今天沒有工作嗎？”

老人使勁地搖了搖頭，否定了我們這個假設的問法。他費力地挑選着俄文的語匯，解釋說，他現在就是到作坊去，那里每天有十六名工匠湊在一起。

“我們怎么能不工作呢！”他一再重復道，“應該安裝玻璃，你們看，已經下起雪來了……”

他在告別時又使勁握了握我們的手，然後便以堅定的，老人的步伐急忙往前走。過了幾分鐘以後，我們通過街上的喧囂還能聽到他的拐仗敲擊道路的聲音。……

我們想起在11月25日，一個星期日，我們在拉科西路上

曾看到在第44号楼房附近的树林中有几个泥水匠。出来散步的布达佩斯人成群结队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去，而他们——一共五个人——有条不紊地用红砖建造一个很大的窑洞。我们走到他们跟前并做了自我介绍以后，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健壮、结实的石匠（后来才弄清楚，他是队长）谨慎地問我們道：

“你们是从莫斯科来的吧？”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马上就变了样，欣然叙述了他自己和他这小队的情况。他名叫季勃尔，姓沙吉。石匠们在昨天休息过了，今天是工作日。他这小队在上星期修理了居民的住宅，今天则重新修缮化妆品商店所在楼房的门面。

工人永远不失工人的本色。我们要季勃尔站在楼房旁边照个象片，可是他并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同时走到砖堆跟前，把铁钎拿在手中，并继续工作起来。

“现在可以照象啦，”季勃尔笑容满面地说道。“应该工作啊！”

……我们在黄昏时分回到旅館去。雪差不多已经完全融化了，只有房顶上的一些白点以及地面上的几堆灰色的东西使人想到：冬之神已经在今天降临到这个城市来了。稀稀落落的行人在匈牙利青年大街上匆匆忙忙地走着，不时有汽车驶过，把泥水溅到两旁去。大片的焦黄的树叶随风飘落下来，密密层层地铺满了便道和马路。可是我们发现，前面的街道扫得很干净，两侧整整齐齐地摆着几堆雪和树叶。我们看到有几个男人和妇女正在前面使劲地挥动着铁钎和扫帚，于是我们开始给他们拍照，尽管已经暮色苍茫，我们想也许还能照得上。

人們注意到了我們，并且喊叫起來，意思好像是讓我們到他們眼前去。當照像機的皮套已經扣上以後，我們打算弄清楚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人。一個戴着無緣帽的、高個子的老头（我們發現所有打掃街道的人都是一些身體健壯的，中年以上的人）首先猜到了我們的心意。他拿起了我們的筆記本，用匈牙利文写下了他的姓名——約熱夫·參格。後來，其他人也都這樣做了；筆記本上依次出現了如下的簽名：杰爾得奈·諾爾、賴什·彼得、雅諾什奈·托特、雅諾什·基什。我們友好地告了別，這幾個老人又舉起了鐵鏟和掃帚。我們在轉角處回過頭來。約熱夫·參格高舉起一只手來，殷勤地向我們揮動着。從那天傍晚起，我們又有好幾次看到他們打掃街道，我們總是象老朋友那樣地彼此打招呼。

雅諾什將很快回到學校去

制葯工廠位於首都的第四區。從我們所住的多若廣場附近到工廠是很遠的，幾乎需要走到城市的另一端。我們沿着從頭到尾都植了樹木的匈牙利青年大街走着。我們走過了在這一時期總很熱鬧的布達佩斯中心區，並且在名叫“柯爾文”的市內一家最大的商店門前停留了片刻。在這家百貨商店前面的小廣場上經常聚集着很多人。在這兒的街道上，提籃賣貨的交易很興盛。人們賣着戒指、耳環、打獵穿的短上衣、此地大部分年輕的和上了年紀的婦女所喜歡穿的黑、褐、灰等顏色的褲子以及各種顏色的無緣軟帽。在布達佩斯，戴這種軟帽的要比戴有緣帽的人多，男人也喜歡戴這種無緣軟帽。

我們轉到華奇路上來。這條路非常長，即使它直得象根

箭一样，也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这条路无尽无休地一直从中心区伸展到市郊，仿佛有人为了研究这座大城市的复杂结构而故意将它一刀劈成两半似的。在离中心区较近的一段，街道两旁国营和私营的商店拥挤比鳞次。愈往前走则商店愈少，住宅代替了它们。最后，这条街道就进入了工厂区。整个这条路的中央都铺设了电车道，有一些不大的，象公共汽车那样的小型电车在上面行驶。这些满载乘客的电车一輛接着一輛地开过去，好象莫斯科的地下火车似的。

在布达佩斯第4区有許多工厂。然而制藥工厂在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大部分产品是輸出国外去的。在叛乱期間，匪徒們沒有能够使这个工厂遭到什么損失。在混乱时期有30名共产党员建立了一支队伍，將优秀的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圍，警惕地守卫着自己的工厂。厂长多尔沃什成了他們的中心人物。厂內的所有工人（一共2,000人以上）都清楚地了解他。人們都爱戴这位厂长。他已經在厂內劳动了25年，一直与全厂人員同甘共苦。

在法西斯猖獗的恐怖时期，許多人的坚持力不够了，有人动摇起来，准备背弃他自己在前一天还认为是神圣的东西。然而多尔沃什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仍然矢志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与工厂沒有断絕联系的工人，每一天都带来一些新的可怕消息：又打死了两个共产党员；一个积极分子受到折磨；有一个人由于象軍人就被吊死了。大家都知道多尔沃什是个共产党员。工人們在內心中对他更加敬佩了，因为他与其他30名共产党员毫不惧怕，坚决相信人民会胜利，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榮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多尔沃什

对工人们說道，“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仅仅有3天的時間，他被迫离开了工厂。这是在法西斯分子冲进工厂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人委员会”以后。他們在获悉多尔沃什是共产党员以后，就决心把他杀死。可是多尔沃什在3天以后就来了，因为工人们坚决起来保护厂长和其他共产党员。

我們乘車来到工厂門前。有一小圈人从大門里走了出来。我們向其中的一个人詢問道：“多尔沃什同志現在在这儿嗎？”馬上有几个人很快走到我們跟前，打听我們在談些什么：也許又有什么新的謠言吧？某次有一个匈牙利人在与我們談話时指出，在叛乱期間“市内的謠言簡直象流彈那样多。”許多人直到現在还对各种新聞感到莫大兴趣。当知道我們来找多尔沃什以后，每个人都馬上指着大門那边說，多尔沃什在厂里。还有一个工人要領我們去。我們在傳達室前面站住了，准备进行登記。“这些人是找多尔沃什同志的，”帶領我們的人对守門人說道：“找多尔沃什同志的？”守門人臉上的严峻的表情消失了，“那么就請进去吧！”

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仅能从窗戶往右放一張办公桌，对面放一張沙发，另一个角放一張小圓桌和几把椅子，以便进行談話。屋里有個40岁光景的身材短粗、寬肩膀，穿着一件旧皮大衣的人向我們迎了上来。这人就是多尔沃什同志。他正要到什么地方去，可是知道了我們是来找他以后就笑容滿面地伸出了他那只工人的結实的大手。多尔沃什很乐意地敘述了工厂的情况，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喜爱自己的事业。

“我們所有的人在你們已經知道的这个事件中都經受了許多苦难。現在，当許多問題都已弄清楚以后就可以看到，

工人当时不了解他們是听信了人家的挑撥。現在人民才看到，那些蠱惑人心者的口号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就自行离开了挑衅分子。当然，法西斯匪徒还在地下潛伏着。就在你們来到这里的10分鐘以前，鄰近的一个工場还給我打电话問：

‘听说有苏联軍隊开到了你們的工厂并且占領了管理处和所有車間，这是真的嗎？’这些謠言就是反动的地下活动所做的工作。”

我們打听了工厂的情况。

“我們正处在困难时期。很可惜的是，有一些墮落分子鑽到了工人当中，直到現在还想混水摸魚。他們对于人們还有一些影响。對我們說来，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使工厂生活得到改进，讓工厂充分發揮它的力量。可是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进行許多工作。煤不够用，这就是說，电力不足。現在只有75%的工人上班工作。然而他們的劳动紀律还很差。巩固紀律——这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会和工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工厂中的生活很复杂。在昨天举行的工人委员会的一次會議上爭辯得很激烈。正象其他各地一样，我們也选出了一个这样的委员会。人們的发言很热烈。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們心中有过許多的苦惱。現在大家都了解到，如果不是匈牙利劳动党陷于瓦解，它的領導也脱离了群众的話，那么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我感覺到了自己身上的官僚主义。厂長沒有任何表現主动的可能：他被各种各样的指令把手足都給束縛住了，而这些指令时常还是錯誤的。

許多人在工人委员会上談到，为了进一步发揚民主，必須使工人支持政府的計劃，帮助改进工厂中的劳动紀律和工

作。为了滿足人民的要求，必須建立起經濟基础来。”

多尔沃什談得很簡單，时常停下来，挑选恰当的語汇。这就使他的話更有分量和說服力了。他微笑着說道：“工人委员会的主席昨天受到非难了！”

他所說的工人委员会主席是一个富农的儿子。他到工厂来的時間还不久。在此以前他曾嘗試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工作，然而大部分時間都是磨磨蹭蹭，而沒有真正进行劳动，因此他在任何地方都呆不長。在叛乱时期，他突然出头露面了，公开进行煽动，主張交还富农40霍尔特的土地。他有一次曾經怒叱多尔沃什：“为什么你把藥品交給苏联军队？”多尔沃什望着这个工人委员会主席的那双迅速轉动的小眼睛，坚决地說道：“目前苏軍还没有要过任何藥品，如果將來需要的話，我一定会把它們交給苏联军队使用的。”这个主席听了就向后退了几步，被多尔沃什剛毅不屈的精神弄得很窘。就凶惡地眨了眨眼睛，威胁着說要長久記住這句話。但是，他終究是害怕多尔沃什的，因为工人們坚决地保护着他。

“昨天工人們把他从主席的位子上撵走了，”多尔沃什接着說道，“工人們說：‘我們不願意讓資本主义卷土重来，我們与它进行过長期的斗争。还在霍尔蒂統治期間就有許多人在这一斗争中牺牲了性命。我們將尊重每个人的意見。可是对于那些不願意堅持社会主义立場的人，我們要讓他們滾出去，讓他們离开我們。’工人委员会支持了这些先进的工人，并且采取了这样的决定。那个前任的主席在散会后来找我，要求留在工厂內工作。好吧，讓他留下来吧，我們从来也不阻止人們改正自己的錯誤。”

有一个披着斗篷、戴着帽子的男人未經通报就走进了多尔沃什的办公室，向厂长要玻璃以便安装某处被打坏的窗户。看来，所有的人来找多尔沃什都是不经通报的，因为他没有设立秘书来管这件事，因而这种做法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习惯。多尔沃什很少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几乎所有的時間他都在工人中間度过，因而总是了解工人的情緒。在我們与他在办公室談話的期間，一共有將近20个工人来找厂长請示問題。

“即使根据工人委员会昨天举行的一次會議的情况来看，我們也可以判明目前在工人情緒上所发生的变化。工人階級已經开始了解到，法西斯分子向他們提出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因而坚决拒絕了它。你們一定已經知道，我們还有不少人多年以来都在收听‘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而他們过去也就相信了它。現在这些人已經确信在那些虛偽謊言后面所隱藏的东西以及‘自由欧洲’电台号召他們干的是什麼。他們現在說道：‘够了，这些謊言已經使我們厌烦了！不要妨碍我們过正直的生活吧。’

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要知道，我們过去犯过不少錯誤，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盲目抄襲苏联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我們能采用的，还是不能采用的，这种做法使我們蒙受了极大的損害。敌人利用了这一点。你們显然都知道，匈牙利人民曾經長期处在法西斯思想意識的影响之下，它曾是世界上第一批法西斯国家之一，因此，了解苏联的真相这一点對我們說來是有着特別的重要性的。可是有时候我們所获得的却是歪曲的报导。我們需要加强与苏联人的密切联系，时常与你們苏联人見見面。我很久以来就已經想去你們苏联

了。

目前在共产党人中間，有些人又想一切都模仿南斯拉夫。然而这是不正确的。抛开其他条件先不提，即使是我們兩國过去的历史也是不一样的。不，我們不應該这样走极端。我們必須根据我国的条件和特点来发展我們的国家。”

多尔沃什最后站了起来，拿起了鈴声响了很久的电话听筒。他在向一个什么人道歉过以后，就繼續与我們談話。这次談話使他本人所受的感动并不下于我們。

“目前最主要的是恢复党的威望，我們共产党人过去犯了许多錯誤，可是，如果我們現在开始热情地工作，我相信工人们会支持党的。我們在1945年曾經有过一个困难的时期。共产党人把国家从經濟瓦解的困境中引导出来了。工人阶级在那一时期并没有袖手旁观。当然，他們現在也不会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的。他們会全力支持党的新方針的。”

在我們記錄他的这些热情洋溢的語句时，他沉思了片刻。这位厂長的臉上具有显著的特点，他的額头很高，上面橫着很淺的几道皺紋。多尔沃什很兴奋。看来，他打算對我們再說一些他認為重要的話，他轉过身来，对着窗口，一面望着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的城市，一面接着說道：

“有些人还在爭論：‘我們这里所发生的事件是革命呢，还是反革命呢？’当然，在大学生的要求之中有一些是公正的，必須予以實現的。可是10月23日的示威游行却被法西斯分子利用来达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了。这是真正的反革命。

苏联第二次把匈牙利从法西斯主义的羈絆下拯救出来，拯救了它的未来。我們共产党人在面对着援助我們的苏联士兵时都感到慚愧。要知道，我們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原是应

該由匈牙利共产党人預先加以防止的。應該讓所有的苏联人都了解：我們有許多正直的人，他們都感激苏联人民。”

我們怀着惋惜的心情与多尔沃什告了別。我們在短短的談話中就感觉得出这个人有一种誘人的魔力。街上在下着小雨。第一班的工人正在离厂回家。已經是下午兩点鐘了。布达佩斯有許多工厂仅仅工作到这个時間：这是因为电力不足的緣故。市內的电車暂时也只能在三点以前开动。

我們从工厂步行到阿尔帕得街。这条街离工厂很近，只需沿着罗若街走过几个街区。有一个12岁左右的小男孩从拐角处朝我們这边跑了出来，由于突然碰上我們的关系竟松手把書包掉在我們脚下。

“你叫什么名字？”

“雅諾什”。

“你是从学校来嗎？”

我們的女翻譯一面笑着，一面翻譯着他的答話：

“不是，学校現在还关着哪。我和同學們一起假裝上学玩。我很想再上学讀書……”

我們又想起了多尔沃什的热情洋溢的話，和他那想尽快医治国家所遭受的創伤、使生活正常起来的热烈願望。为了讓工厂的烟囱象从前那样地冒起烟来，讓每个家庭里都能点起电灯来，而雅諾什可以回到他那亲爱的学校去，應該工作，工作！工作！

別拉·佛加拉希談科学

“你們想和我談一談嗎？我很乐意在我家里接待你們，”

这位65岁的教授在电话中很高兴地说着，“不过我不能派我的‘胜利’牌汽车去接你们。很遗憾，这辆汽车也积极地参加了这次事件。”贝拉·佛加拉希在电话听筒中大声地笑着。

“它是怎么参加的？”

“这是我们这一时期中的一段颇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这辆汽车在事件的高潮中失踪了。谁把它开走了，开到哪里去了以及为什么原因，——这些都闹不清楚。我已经决定不再寻找了。可是昨天我的一个学生——要知道，我是卡尔·马克思大学的讲师啊——把全部故事都告诉给我了。”

有一伙大学生开走了这辆汽车，打算跑到奥地利去。这些积极参加骚乱的大学生被要把青年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荒谬谣言吓坏了。

这辆汽车在离索姆巴哈依不远的克尔门德市被扣留了。过了4天以后，他们全体都被释放了。他们给我打了电话，并且向我道歉。大概明天汽车就会到家。”

现在我们坐在位于布达的一条山坡上的、捷利克街上的一所孤零零的楼房的二楼上。这里住着一位国内最有名的学者——匈牙利科学院副院长贝拉·佛加拉希。

这位教授坐在那里，向后靠在安乐椅的椅背上。银灰色的头发从他那顶黑色的小帽下面露了出来。在他背后，一排排的书籍摆得几乎快到房顶上了。在书架中间的上面，挂着一幅斯宾诺莎的肖像。

“这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教授解释道。

在侧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虽然不大，但是刻制精良的版面——列宁象。

我們在院子里曾碰到一位正在打扫甬路上的树叶的妇女。这是一位長着一付温和、善良面孔的，有些駝背的老妇人。原来她就是教授的妻子。她坐在堆满了各种手稿、青銅器和瓷器的大書桌的那一边，也参加了我們的談話。在被傍晚的雾气所遮住的窗外是一片房頂、尖塔和圓屋頂——这是多瑙河彼岸的佩斯。

“写一本書要比談論最近发生的悲剧性事件还要容易得多。”教授說道，“这个事件說起来真是一言难尽，而写出来現在又沒有時間。”

我們向教授建議，这次談話可否采用問答的形式。他欣然同意了。

問題：教授，請您談一談，學者們對於國內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反应如何？

回答：匈牙利的学者并不是清一色的，他們中間有着各种派別。法西斯政权在我国存在了25年，过去的影响还相当大。然而可以肯定地說：优秀的科学家并没有积极参与反革命活动。某些个别情况，举例來說，象紹普朗大学有几个講師逃往奥地利一事，並沒有很大意义。

在我們科学院中以及各大学中有过完成所謂和平革命的嘗試，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学术性的‘全国委员会’。但是，它們對於科学家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进步的学者們都贊成工作，贊成整頓國內的生产。他們願意支持这一方針，願意帮助国家解决摆在面前的困难任务。

問題：帮助或妨碍科学发展的都是什么？

回答：社会主义的各种条件給了国内的科学发展以很大的推动。这一点在那些必須有巨大的試驗場和实验室的科学

部門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匈牙利還從來沒有過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得到的這樣一些發展科學的條件。我堅信，社會主義，做為一種制度，乃是科學的真正基礎。

但是，我們也有過一些嚴重的缺點。過去的領導者是以忽略學者的權威性意見為其特徵的。時常向學者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任務。舉例說吧，有個大物理學家亞諾什·萊奧施院士從英國回到祖國來了。你們一定聽到過他的名字，他曾在都柏林與史列丁格一起工作過，他的著作很有名。有人向這位物理研究所所長要求說：“立刻把原子能發電站建立起來吧！”這位院士解釋說：“我們首先需要培養物理學的干部，即使有個原子反應堆也好，而不是要什麼發電站。”可是他們竟對他說：“立刻就來吧，不能等待20年！”

這種態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我國學者正常的工作。可是，即使如此，我們也沒有任何權利忽略我國在科學上的巨大成就。

問題：您能不能簡短地談一談，匈牙利學者們在哪些科學部門中成績最優越？

回答：首先是在數學方面，法依爾和里薩的著作已被譯成一切國家的文字。他們這一學派培養了大批數學家。你們要問：“為什麼在數學上的成就最大呢？”這是由於，這門科學在幾世紀以來都不需要什麼物質條件。而霍爾蒂，舉例來說吧，根本就不給什麼錢來發展實驗科學。我們在物理學上也有成績，——我已經說到亞諾什了。在醫學上情況也滿不壞。我可以舉出內科醫生魯斯尼亞克，生理學家恩斯特以及在馬寧格爾魯醫院工作的巴甫洛夫的追隨者李特曼。我們在人文科學方面也有一些成就。

反動分子企圖誣蔑我國科學院和學者們，指控他們的某種國際主義。但是，他們大概忘記了，賴以理解匈牙利民族文化的科學基礎正是我們建立的。我們可以引為自豪的是，我們在最近10年中，在這方面還做了一些事情。我們的學者們第一次写出了匈牙利藝術史，第一次出版了匈牙利古典作家的全集。研究匈牙利民歌的某個叫佐爾坦·科達依的作曲家有一次對我說：“在舊時的匈牙利，我簡直做夢也想不到在工作中能得到這樣的幫助。”

所有這一切都是事實，而不是空話。

問題：目前擺在匈牙利學者們面前的都有哪些任務呢？

回答：目前在思想意識上面臨着最巨大的工作，這是比修補被破壞的房屋和恢復街頭上的秩序更重大的任務。我們教育青年的工作在許多方面存在着學究氣，反動勢力將利用我們在思想教育方面的錯誤。但是我們不允許反動分子掌握科學和大學教育的領導，應該首先為爭取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勝利進行思想上的鬥爭。

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這場鬥爭必須用說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強迫的方法。經常有許多青年、大學生和研究生的到這間房子里來。在與他們閑談時，我常常為他們的迷失方向感到震驚，他們之中有些人竟然不懂得，如果蘇聯軍隊不進入匈牙利，那麼不但會爆發國內戰爭，而且整個歐洲也會爆發戰爭。在引証歷史材料時，應向青年解釋這一事件的真正性質。

至於進步的學者們，他們將把自己祖國的科學推向前進，堅決反對反動派以任何形式在匈牙利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

✕

✕

✕

我們沿着很陡的樓梯從二樓上走了下來，走進一個小庭院里。佛加拉希教授穿着一身褐色的在家里穿的短上衣，戴着一頂黑色便帽，坐在上面的平台上，他妻子伊利查羞怯地微笑着，坐在他旁邊。六個月的鬚毛狗普魯東，臥在她的腳下，警覺地盯著我們。它身上的毛長得象布達佩斯的夜晚那樣的漆黑。這只狗就是位於捷利克街最高處的這座小房樓里的第三個居民。

工作日結束了。我們得走很遠的路，公共汽車里擠滿了乘客，於是我們對於那輛“勝利牌”汽車參加了不久前的事件，而還沒有回到它的合法主人身邊一事感到非常遺憾。

我們穿過了人聲嘈雜的，象風洞一般的隧道，人群把我們擠到橫跨多瑙河的鏈橋上。在那里，我們看見了這座暮色蒼茫的城市難于重見的美景。

兩個家庭

布達佩斯從第五層樓的高處看來，顯得特別壯觀。直到很遠很遠的地平綫的盡頭，整個空間都填滿了樓房的屋頂：紅色的方形瓦片，青銅色的圓頂，銀灰色和深灰色的平面。在它們的下面，幾乎有200萬人過着複雜的塵世生活。往那邊說，這些屋頂無邊無岸地一直延伸到霧氣迷蒙的佩斯的邊緣，消失在朦朧的雲霧當中；往這邊說，這些屋頂一直伸展到多瑙河。多瑙河今天一點也不發藍，而是黃褐色的，在遠處的水面上可以看到國會大廈的尖頂倒影——它矗立在河岸的這一邊，而對岸則矗立着不斷冒煙的許多工廠的煙囪——

这些工厂已經不在布达，而是在奥布达了——人們把市内这个最古老的工人区域叫做奥布达。

这一切，我們都是从与多瑙河岸平行的波若尼亞街44号楼房的窗戶里看到的。今天我們在約瑟夫·盧卡奇和阿格涅莎·多博夫妇家中，在他們位于五层楼上的漂亮的住宅中做客。今天是星期日，人們不必忙着到什么地方去，可以安靜地談一談。

“对不起，我們这里很冷，”阿格涅莎·多博說道，“鍋爐房每天只燒2小时，因为煤不够。”

阿格涅莎把玩具推到一边，坐在很矮的一只長櫃上。她穿着一條藍色的毛呢長褲——順便說一句，現在几乎所有的布达佩斯的妇女都穿这种褲子——以及同样是藍色毛織的套头帶領的毛衣。阿格涅莎是一个內科医生，看样子有三十岁左右。她那黑亮的头发剪得很短，而肥厚的嘴唇則使她的臉孔帶有某种稚气而又有点頑皮的表情。

她的丈夫約瑟夫是个头发斑白，長有兩撇很細的小胡鬚，寬肩膀，略微有点胖的男人，他在屋里緩緩地走动着，有时坐在很低的欄杆上，然后又站起来。这些欄杆是用来把堆着各种玩具和木馬的、供儿童玩耍的一角与屋內其他部分隔开的。約瑟夫是哲学家。他在科学知識普及协会工作。

我們談到剛剛过去的几天的情况以及將来的問題，因为不談这些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在談論这些东西。

“您談到您們曾与一位大作家談过話，”阿格涅莎說道，“而他對你們說，反革命政变的危險似乎並沒有过去，是吗？很可惜，許多誤入歧途的知識分子也都这样想。可是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从暴乱最初几天起就有过几十人在医

院里经过我亲手治疗。

曾经有过这样的危险，——甚至那些带着合法要求到街头和广场上去的最初一批人也都亲眼见到了这一点。我记得，在骚乱开始以后的某一天，有一个受了伤的青年被带到山多尔·裴多斐旅馆来。这个青年是个好小伙子。思想纯洁，眼睛明亮，过了几天以后又有一伙受伤的暴动分子到大厦里来。我亲眼看见过这样一个青年，当他看到他在走上街头时所怀着的光明磊落的思想竟被这些亡命之徒所沾污的时候，他都悲伤苦惱得哭了起来。你们知道他们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吗？他们就在医院里分起赃物来！在只不过是几天以内就产生了这样的蜕变。如果不是苏联军队开到城里来的话，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阿格涅莎用两手抱起膝来，坐得更舒适了一些。

“知识分子们都想些什么呢？”我们问道。

“大部分人拥护社会主义，”她说道，“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要是我国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话，我是永远也当不上医生的。社会主义彻底肃清了知识分子中间的失业现象，而从前这却是司空见惯的事。”

阿格涅莎沉思了起来……在隔壁的房间里——那是一间饭厅，可以听到孩子们宏亮的声音以及祖母的小声嘟囔，她在打算让吵闹的孩子安静下来。

约瑟夫参加了谈话。他说得简洁而清晰，好象在做报告。他一面说，一面在一座很高的书橱和一架摆满了小瓶和玩具的穿衣镜之间来回踱着。

“我认为，政府归根结底会依靠知识分子的支持以恢复国内生活的，我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于他们迄今还不太相信

与反革命积极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当局在不久以前逮捕了某个叫山多尔·安得拉什的人。他是一个作家。知识分子由于这件事而愤慨得很，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控告他！”

“请原谅，”我们反驳道，“要知道，他正是一个在骚乱期间没有袖手旁观的人啊。他发行了一种典型的亲法西斯派的报纸。他要求把共产党员消灭掉。他坚持，举例说，斯大林沃罗什市应该改换名称，成为匈牙利新国家的首都。为了这一目的，他要求西方的军事援助……难道说这一切不是证据吗？”

“是的，”约瑟夫有点不太确定地说道：“可是知识分子们不清楚这一点……许多人根本就不了解反革命与革命之间的界限，不了解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譬如说，爱国主义，这是很好的东西。可是当爱国主义与沙文主义混淆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毫无用处了。而目前我们有許多人正是这样做的，这是不正确的。”

“科学普及协会准备做些什么呢？”我们问道。

“在我所工作的这个协会面前有着十分巨大的任务。我们过去在知识宣传方面犯过许多错误，最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知识方面犯过许多错误，以致现在不得不遭到报复。举例说，我本人，作为一个哲学家，研究你们党的历史已经有好几年了，可是匈牙利劳动党的历史我们却没有任何人进行研究。难道说这样的一些错误犯得还少吗？”

约瑟夫重又坐到细小的栏杆上，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

“应该进入研究院里去——这会帮助我分析多方面的题目。我们将组织俱乐部、演讲会……”

阿格涅莎笑着说道：

“咱們今天去看電影吧，不是很久都沒有看了嗎……”

※

※

※

城市的另一端，另一個家庭。

阿戈什唐街11號院內的梨樹大概有一百年以上了。它的軀干在多年重壓下略微有些彎曲，它的粗大的樹枝廣闊地伸向四方。枝干現在是光禿禿的。稀疏的小雪花自由自在地從這些枝干中間飛過來，落在地上融化了。在這些光禿禿的枝干的復蓋下，有一間在院內凸出來的低矮的木板房，院內一部分地方種植了小花叢和發育不良的小葡萄樹。

“我們住在这里，在這奧布達，已經有四十多年了，”一個戴着被壓扁得象烘餅那樣的便帽的、干癟的小老头費力地選擇着俄文語匯這樣說道：這個老头名叫利波特·萊普尼克，今年已有81歲，很久很久以前，在1916年的時候，他曾在戰俘營中呆過，在那兒學會了一點俄文。他現在費力地說着，久已忘掉的語匯，象河里的石頭一樣，緩慢地翻滾着。

“我這一生真算是經多見廣了，我走遍了半个地球。我在1907年到過美國，在紐約尋找過幸福，在英國做過事，在法國也流浪過，然而不行，這塊土地又把我給弄回來了。看來，世界上沒有比我國更好的地方了。”他狡猾地微笑着，并把我們讓到房間里去。

我們低着頭進了屋。這裡相當寬敞，——孫女阿利莎在一星期以前出嫁了，帶走了一部分傢俱。屋內有點涼。牆角的小洋鐵爐子對於這麼大房間說來顯然是不夠的。一張很大的雙人床佔據了足有屋內三分之一的地方。牆角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一個矮小的，正在匆忙地收拾着桌上東西的生氣

勃勃的老太太，走过来迎接我們。这是利波特的妻子。

我們走进了第二代所住的另一半房間。这第二代人的住处是这两个曾經一度健壯，而今已如此衰老的人給分出来的。这里住着造船厂的钳工帕耳·修基，他的妻子瑪尔吉特和女儿华列丽姬，第二个女儿阿利莎，今天在这里做客，她現在与她那当工程师的丈夫住在一起。

帕耳是一个42岁的膀宽腰圓的大个子，他那晒得黑黑的臉長得很漂亮。双头肌仿佛把他的短上衣狹窄的袖子撐得鼓鼓的。瑪尔吉特，恰恰相反，是个瘦小的女人。她的身材还不到她丈夫的肩膀，与他并立在一起的时候显得衰弱无力。

他倆長得如此不同，使人不禁提出这样的問題：使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湊在一起的是什么呢？也許是共同的痛苦吧？

瑪尔吉特的前夫在战争期間死掉了，而帕耳的前妻，——順便說一說，她就是瑪尔吉特的亲姐姐，——在布达佩斯市內被希特勒匪徒枪斃了。她留下两个孿生的姊妹在帕耳的身边。瑪尔吉特对她们产生了母爱的感情。于是他倆便結婚了。

我們坐在桌旁，帕耳把他那双粗大难看的手放在干淨的、还保留着熨平的皺褶的桌布邊緣上。阿利莎弯身向着燒紅的铁爐，她剛剛洗完剪得很短的头发，正在烤干。华列丽姬坐在爐旁的門檻上瞋着我們，她的母亲以自豪的心情把6只淺平的小紅盒放在桌上，然后就坐在低矮的窗台上开始縫紉了。

我們看着帕耳的劳动獎狀。獎狀很多，各式各样的都有。有裝着彩色鑲珞的五角星、獎章、榮譽獎狀……是的，

这个人做了許多工作，贏得了这么多的榮譽！……

“昨天，星期六，我們發生了爭論，”帕耳說道，“區工人委員會建議宣布罷工十天，可是我們拒絕了。現在差不多每個人都願意工作，只有那些過去從來沒有真正地工作過，而現在則利用各種借口來逃避勞動的人才躲避工作。然而這些人已經不是什麼工人了，還不如說他們是流氓無產者呢。”

“那也難說！”阿利莎（她已經在牛奶廠當了七年的實驗員）反駁道，“我們那里正好相反，不願意勞動的恰恰是工人貴族。”

“他們都是什麼人呢？”

“是一些自認為比普通工人高貴，裝做勞動的樣子，而實際上並不工作，却在各車間游蕩的人。他們是各式各樣的高級技師、機械士、出納員。……說來很可笑，他們在这次事件以後，突然彼此叫起先生來了。他們在見面時彼此招呼道：‘您好，先生！再見，先生’。”

“到了停發這些人工資的時候了，”華列麗妮，這個穿套頭帶領毛衣的尖鼻子的姑娘生氣地說道，“在我們暖水瓶工廠，事情已到了這種程度：已經決定補發騷亂期間的工資，但是只給已經開始工作的人。在發薪的當天，人們都來了，——簡直擠不動。可是有人領了錢以後直到下次領錢時才露面。然而我們却天天工作，得到的工資也一樣多。”

“你們工廠都選舉什麼人到工人委員會中去了呢？”我們詢問帕耳。

他微笑着，攤開兩手說道：

“我們車間有28個人。我們商量了一下，選舉誰好呢？

所有的人都不坏，于是我們就把全組整个都选入了工人委员会……”

大家都大声笑了起来，可是帕耳却調皮地向他那好象在集中精力縫紉的妻子眨了眨眼皮。阿丽莎也笑了。她坐在很热的火爐旁边，兩頰烤得通紅，好象西紅柿一样。往屋里望着的祖父也笑了。

“有一些工人委员会，”帕耳繼續說道，“建議撤掉所有的厂長。但这是不正确的。那些官僚化的厂長是应当撤掉的，可是那些明白事理并与群众有联系的应当讓他們工作。”

我們沉默着，聚精会神地望着从半开着的鉄爐的小門里竄出来的火舌。

老太婆利用全屋沉默的机会，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收拾了桌子，准备开飯。她在桌中央放了一大湯盆冷的，粘稠的蜜餞干果，里面有大量半透明的梨——这是大門旁边那棵大树結的果实。

我們在布达佩斯的暮色蒼茫中回了家。我們先走到联結工人区与市中心的路綫的淺橘黄色的电車站去，然后就去乘地下火車。布达佩斯的地下火車与我們莫斯科的截然不同。这是很狹小的地下路綫。很小的，象玩具似的火車开到日光灯照耀下的車站，接着便开进方形的，低矮的地道，帶走了在入口处排队的一部分乘客。

在上面，在我們頭頂上的什么地方，几支青年队今天都在进行星期日的义务劳动：打扫街道上的廢物和垃圾，安装商店櫥窗的玻璃。

阿格涅莎·多博和約瑟夫·盧卡奇一定已經从距他們最

近的一家电影院回家了，他們不是打算在今天去看电影的嗎？华列丽娅显然会打扮得好好地，忙着去赴约会。阿利莎應該趁天亮的时候回家去找丈夫——要知道，这个新家庭恰恰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建立的啊。

帕耳·修基一定在考虑今后怎样工作，——要知道，他現在正象他那队里28个工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样，成了工人委员会的委員了。他的妻子瑪尔吉特，一面唱着歌，一面在燒得通紅的铁爐边准备晚饭，盤算着怎样在她的新住宅中擺設家俱。还在9月时就分配給他們一所新住宅，他們等着有瓦斯以后再住进去。

年老的利波特·萊普尼克大概正一个人在他那張大床上翻来复去，回忆着他那过去的81年。而那棵活过100岁的梨树的光亮亮的树枝則正在十二月的暖风中颯颯地作响。

……人們住在各个角落，他們在城內各間房子里想着多方面的問題。我們帶着他們住宅的溫暖以及与他們友好的握手离开了他們。

光怪陆离的几頁

在街头上

布达佩斯的人們正过着矛盾百出的、光怪陆离的生活。健康的和腐敗的，好的和坏的都攪成了一团，要把它們分

出来，暂时还是非常不容易的。然而这是毫不足怪的。全国所遭到的大震动的反响还可以听得到。反革命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思想武器，“自由欧洲”电台还在继续干着向匈牙利人散布谣言的龌龊勾当。在居民中时常散布着各式各样的，有时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谣言。夜间，在墙壁上经常出现一些传单，其目的在于散布对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并制造混乱。这些谣言、传单以及虚伪的报导将人们引入迷途，妨碍他们正确了解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次事件的意义和性质。

因此，布达佩斯的人对各种政治问题的兴趣自然而然的就很灵敏。全市的每个居民都被卷入了这次事件的漩涡中。年轻的和年老的，工人和职员，主妇和学者——所有的人都想在这复杂的形势中寻找自己的论点。到处都在争辩：不管是在商店里和饭桌旁边，还是在工厂的车间里和报摊旁边，甚至在电车上和人行道上，只要聚集到十多个人，就热烈讨论起激动他们的各种问题来。

党报、党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以及一切正直的匈牙利爱国者，在这些复杂的条件下，要想战胜反动分子大量引用的谎言和诬蔑，有时是很困难的。但是不管怎样，健康的、正确的意见正在一天一天地聚集着力量，显然将会得到胜利。

……星期日早晨的布达佩斯的街道，静悄悄的阒无人迹。明媚的阳光照着街心花园。但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好像全市的人都出来散步似的。布达佩斯人有的单独一个，有的双双对对，有的全家一起，在人行道和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着。

“‘人民自由报！’‘人民自由报！’”报贩们喊道，一面向行人伸出来一叠油墨未干的报纸。

今天的“人民自由报”轉載了“真理报”的社論：“爭取社会主义力量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买到报纸的人通常都走到一旁，开始去讀，在他旁边很快就会聚上来另外几个人，跟着爭辯的声音就会从那里傳过来。

有一个穿白斗蓬的高个子，把“人民自由报”扔掉了，他臉上的肌肉顫动着。报纸的内容显然不合他的口味。他把这份报纸揉成一团，当心地向四下里看了看，就把它扔到圍牆后面去了。有三个人——看来是夫妻倆帶着女儿——看到了这一幕，都笑了起来。

“‘体育消息！’‘体育消息！’”一个面龐削瘦的男子的喉音压倒了街市的喧囂。

几十个过路人，年輕的和年老的，立刻跑到他跟前，真正的捧場者到处都一样。他們急忙打开报纸，專心一志地讀起来，一面走一面讀，不管拥挤的行人和生气的叫喊：要知道，这份报纸上登載了来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消息啊！

在共和国广场的党市委大厦旁边挤满了許多人。这座大厦由下面起很潮湿，窗戶都釘死了，牆上有許多窟窿。人們都挤在距門口不远的——一个深达10公尺左右的大坑旁边。在反动派猖獗的日子里，强盜們在这个广场口殘暴地杀死那些不願意把祖国交給法西斯匪徒去侮辱的爱国者們。大坑乃是相信挑撥者的話的人們挖掘的，他們当时为的是搜寻似乎藏有无辜人們的地下室……即使是当时被运到广场上来的挖掘机，也沒有找到根本就不存在的地下室。然而，今天也还有一个头上戴着系帶子的天鵝絨帽子的肥胖男人压低了嗓音，对站在他旁边的人說道：“再挖一挖也許好一些……”

四周有几个年龄不同的人，在观看了一会大坑以后，他们的好奇心已经得到了满足，就讀起“真理报”的那篇社論。可是现在那个戴天鹅絨帽子的肥胖的男人走到这几个人跟前。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狭長的紙条，塞到这几个人的中間。发出了兴奋的声音，这个人紅着臉，匆忙地躲到一边去了。

我們所看到的，匆忙貼在通到約瑟夫街的一个偏僻的小巷深处一座樓房牆上的傳單也正是这个样子。傳單上的字体很难看，写着的匈牙利文也似通非通：“不要工作！罢工吧！”这张紙条証明了許多問題。它不是玻璃版印刷机印的，也不是手搖式油印机印的，甚至不是打字机打的，笔迹也显然不是出自匈牙利人之手。而最重要的是在于：人們对于这些傳單已經不那么感到兴趣了。

在伸延到剧院大楼前面的人行道上的低矮的小販攤附近，喧嘩的人群在激动、沸騰着。“上等的皮帶！”、“买提包！”、“玩具！玩具！”——小販們乱哄哄地叫卖着。而在他們旁边，有一个穿着大衣，把領子翻起来的家伙在贼头贼腦地东張西望，偷偷摸摸地把表拿出来給人看。

在大街拐角处聚集着一小群指手划脚的行人，他們談論着一切。有更多的商店开张了。武装的恐怖分子威胁要对每个願意工作的人进行报复，但是乔凱里街上鋪設了电車軌道。有人給切佩尔打了电话，要求他們停工——原来，这也是挑衅行为……

流放的神話是怎樣產生的

“流放”一詞在西方變得很時髦。關於匈牙利青年似乎已被流放（或遣送）到西伯利亞的聾人所聞的消息充塞了許多資產階級報紙的篇幅。反動派的傳聲筒“自由歐洲”電台，對此大肆叫囂，“美國之音”也重複着它的論調。某些外交官也不惜帶着這個虛構的消息爬到聯合國的講演台去。

流放一事實際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誰製造了這個謎呢？為什麼要製造呢？我們確信，這樣做是有一定的目的的：在居民中間造成混亂，從而妨碍匈牙利生活的正常化，散布對蘇聯的敵意，同時掩蓋自己陰險的勾當。我們現在只談到幾個情況，說明流放的謎霧在事實面前是怎樣破滅的。

確實曾經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一個右達佩斯人突然失蹤不見了。然而他的足跡，據後來查明，根本不是走向蘇聯，而是很近的一個地點，並且還就在匈牙利，也許他是走向邊疆；不過不是東方的邊境，而是西方的邊境。

經濟學院一個23歲的大學生安得烈·維爾麥施突然在布達佩斯失蹤不見了。尚格爾茨街5號樓房里的人們都絕望地說道：“他當然是被趕到西伯利亞去了。”可是過了一個星期，安得烈……竟敲了自己住宅的門，這一時期他究竟在哪裡？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到尚格爾茨街去找安得烈·維爾麥施。這個高個子，灰眼睛的小伙子甘心情願地向我們講了他的遭遇。他甚至還要求我們把他的遭遇在報上發表，他說：“這對許多人都是有益處的……”

“你們知道，反革命分子散布了各种各样的謠言，”他開始敘述道，“我成了这些謠言的犧牲者。我相信了匈牙利青年將被赶到西伯利亞去的說法，因此就決定逃到南斯拉夫去。”

这几个青年偷偷地逃往边境，一共走了四天四夜，——有时徒步走，有时乘坐順路的汽車，有一次甚至乘坐拖拉机。他們成功地越境到达了南斯拉夫。他們被那里的边防軍人扣留了，并被送了回来。

“当我們在匈牙利边防軍人那里的时候，又有5个我們这样的‘逃亡者’加入了我們的行列，”安得烈繼續說道，

“而在一夜之內就增加到56个人。他們每个人都相信了將被流放的謠言。边防軍人对待我們很入道，于是我們都睜开了眼睛。我們大家，56个人全体，都在想着一个問題：我們必須在这里，在匈牙利工作，工作和进行建設！不能在祖国遭到困难时期把她抛弃……我們所有的人在第二天都被釋放回家了，許多人甚至是被用汽車送到家里的。

“讓这一情况，”安得烈說道，“教育其他的人分清真理和謠言吧。要知道，我根据切身經驗相信：挑撥性謠言是毫无价值可言的。”

如果說在布达佩斯有一些人故意散布关于流放一事的謠言，那末，他們的目的是与西方挑撥者完全一样的。

布达佩斯第10区的“卡別尔”工厂的工人委員會主席，某一个叫霍尔多·巴洽的人，于11月21日吵了起来：有兩個工人，一个叫伊斯特万·瓦尔伽，一个叫約瑟夫·卡普什失踪不見了。工人們都惊惶不安起来：

“他們到哪兒去了？”

“他們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了。”霍尔多·巴治設法使大家相信这一点。

“一定得查明这件事。”工人们这样决定了。他們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出发到位于博伊奇—治林斯基广场第4号的伊斯特万·瓦尔伽所住的那所房子里去。代表們打开了屋門……瓦尔伽本人就在屋里！当他們在維舍林街第66—68号房子里找到正在家中睡觉的约瑟夫·卡普什的时候，他們更加惊异不置了。

欺騙工厂里的工人的霍尔多·巴治，从前是个霍尔蒂的軍官。此外，他还参加过希特勒軍隊，作过战。我們不禁产生了一个問題：这两种情况——挑撥性的謠言和散布这些謠言的这个人的过去历史——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呢？……

制造关于流放之谜的技术并不是很复杂的。如果有一个人与朋友見面的時間比通常稍迟一些，他住的这所楼房里就会傳出謠言来：“又有一个人成为流放的牺牲者了。”一个人从布达佩斯到外省去看亲戚或出差——就又有人制造一个奇談，說他亲眼看到这人被送到西伯利亞去了。

有一个名叫帕耳·帕什科的清扫工人，于11月27日惊惶地来找匈牙利人民軍中央軍官俱乐部主任皮斯科尔上校，他說道：

“我儿子列饒已經好久不在家里了，我和我妻子認為他是因公出差了。可是昨天有他的两个同事来了，說他們亲眼看到列饒被苏联士兵捉走了。請帮助我們把他释放了吧。”

可是帕耳·帕什科剛說完，屋里就走进一个人来，这人正是……列饒。于是一切情况馬上就弄清楚了。原来他是到他未婚妻那儿去了，她住在离布达佩斯不远的地方。

帕耳·帕什科生起气来：

“列饒，你的同事可真不錯啊！多么不忠实，多么卑鄙啊！我得跟他們算算帳！”

他轉身朝着皮斯科尔說道：

“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不痛快。現在我只要一听到关于流放的問題，我一定会把我儿子的事講出来……”

挑撥者利用某些青年人的缺乏經驗，慫恿他們散布謠言。在第四区某电灯工厂的一个青年女工瑪利姬·科瓦奇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瑪利姬今年19岁，她与父母一起住在第20区伊什科拉街47号，她已經上班了好几天，因为电灯工厂重又开始生产了。但是瑪利姬在11月38日沒有到車間去。当她第二天到車間时，她的女伴們都拥到她跟前來說道：

“瑪利姬，可憐的人儿，你一定吓坏了吧？你說一說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吧。你母亲剛才給工厂打来電話，說你被苏軍士兵捉走了。”

瑪利姬叙述了一遍，昨天早晨她象平常一样地来上班。她下了公共汽車以后就到阿蘭尼亞·雅諾什街去換电車。可是她沒有走到电車站。这輛公共汽車剛剛开走，瑪利姬在潮湿的人行道（从早晨起就下着雨）上走了几步，这时候就有兩個穿着苏軍制服的人朝她跑来。一轉眼之間，瑪利姬已經坐在一輛綠頂的汽車里了。她連叫喊都沒有来得及。

在市郊的一个很远的地方她被推出了汽車，被推进了一間小房子。在这間房子里，据瑪利姬說，已有20个象她这样的姑娘。她們所有的人都怕得要命，等待着馬上会把她們裝上車廂，从匈牙利运走。她們在惊恐中渡过了一夜。拂曉时

分有人打算把門弄开，她把門打开了，于是所有的姑娘就都跑出来了。瑪利姬就打了个電話給她母亲，告訴她事情的經過，然后就直接到工厂来了。

姑娘的叙述对許多人产生了強烈的印象。有一些姑娘立刻就拋弃了工作并离开了工厂。但是任何人都沒注意到瑪利姬的臉上的精神很好，大衣也沒有揉皺，她那條灰藍色的褲子也熨得很平，好象是一整夜都整齊地搭在椅背上似的。第4区民警分局的局長立刻就发现了这一点。姑娘是跟工厂中的一个叫別标克的老工人一起到分局去的，因为他希望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瑪利姬在对民警上校重述她的遭遇时，說得就不象她在工厂时說的那么肯定了。她时常言語支吾，滿臉通紅，她显然是神志不清。她最后終於承認，她被綁架的整个故事都是杜撰出来的。

瑪利姬确实曾乘坐公共汽車上班，可是她在市中心区下了車，打算去瞧一瞧她的女友，某个也姓科瓦奇的姑娘，因为她就住在附近的涅帕舍列格街3号。她在那里呆到傍晚，由于害怕一个人單獨回家，就在那里过夜了。第二天早晨，当她要走的时候，她的女友很神秘地对她低語道：

“你回家或到工厂去以后，你就說昨天沒有工作是因为苏軍士兵想要把你从匈牙利运走”。

“为什么这样說呢？”瑪利姬惊奇地問道。

“你應該这样說……”她的女友意味深長把手指放在嘴唇边說道。

我們就在当天，在11月29日，与瑪利姬見面了。她是个苗条而又漂亮的姑娘，穿着一件花色的裙衣。她坐在椅子边

沿上，屈強地不肯抬眼皮。

“你怎么会同意重述这种谎言呢？”

姑娘把头垂得更低了。她感到很羞愧。

“明天我要对全体工人講出来，”她在沉默了片刻以后回答道，“我說說了。我要講一講关于流放一事的真相——流放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

匈牙利国内生活的逐漸正常化，使反革命分子簡直气得发瘋，然而人在气愤时是想不出好主意的。人民政权的敌人繼續执拗地一再重复所謂流放的捏造，他們已經落入了可笑的境地。布达佩斯人在听到关于青年被赶到西伯利亞去的叙述以后，已經愈益經常地說“驢鳴犬吠”了。

他們不在西伯利亞，而是在奧地利

不錯，流放一事是并不存在的。圍繞這一問題的喧聲也是為了要掩飾把匈牙利青年帶往西方的事实而制造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感到自己已經失敗了，就用威胁以及“美好的生活”的謊言強迫几千名青年男女越过了奥匈边境。

当我們在匈牙利的时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曾給奥地利政府送了一份照会。照会中說到，有許多孩子的父母請求外交部帮助他們，使逃往或被劫到奥地利共和国去的孩子們回到祖国来。在10月和11月間，有許多未成年的人，或者是为了獵奇，或者是受人慫恿，有的則是出于恐惧，因而离开了祖国領土，有一部分則是被劫走了。例如，很大一部分紹普朗的学生都是受到法西斯恐怖分子的威胁并被劫上卡車送往奥地利去的。他們中間包括十五、六岁的紹普朗林业

技术学校的学生。照会在下面还谈到，匈牙利外交部表达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意见，要求奥地利公使馆协助，使未成年匈牙利公民尽快回到祖国。

“自由欧洲”电台在11月报导说，每个来到奥地利的匈牙利人都立刻被发给了1000美金的现款，而且有良好的工作和住所等着他。但是实际上，情况却是很苦的。甚至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们不得不承认：匈牙利的流亡者正处在非人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住在满是窟窿的帐篷或旧的货车里，而冬天已经来临……每天发给他们一盘子豆汤和一块面包。一群狡徒——各公司和商店的代理人——在营中乱窜。招募廉价的劳动力到矿山和矿井、到森林采伐区、咖啡园和橡膠园去……姑娘们被骗到夜酒店和形迹可疑的咖啡馆中去“工作”。更有人加紧诱使青年男子参加法国的外籍军团。

于是，昨日的流亡者今天正都纷纷重返家园。人民政府诚恳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得到了救济金和从前的工作岗位，没有任何人追究他们所犯的錯誤。这些虽然正直、但却误入歧途的人现在都变得成熟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悲剧重落在依然继续相信西方煽动者的其他匈牙利人身上。

安塔尔·瓦尔伽在奥地利为流亡者准备的各营房里长期流浪以后回到了布达佩斯。他在到家以后，立刻就写信给广播电台的编辑部，要求把他的信排在最近的广播节目单上。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刚从奥地利回来。咱们的人在那边的情况很困难。我看到营房中挤满了被宣传所欺骗的人。现在他们很悲惨。我看到许多男女，泪流满面地从这个营房转到另一个营房，寻找着自己的小孩。看到他们以后，我心里想道：‘我干的是

什么事啊！为什么我要把我的孩子弃而不顾呢？他们需要父亲来教育他们热爱劳动，使他们成为正直的人！’让所有那些至今还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好的人都了解了解这些情况吧。让他们了解，在奥地利等着他们的只是沉重的工作和饥饿吧。要知道，许多匈牙利人只看到西方生活的表面情况——西方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是颇为美妙的，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实际情况。

当我转回家乡，走近边境的时候，我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我怕我会被送到监狱里去。可是我竟受到了很热情地接待，甚至被用汽车送回布达佩斯。

现在，当我到过奥地利以后，我了解到，一切美好生活的诺言都是虚伪的宣传。在奥地利，等着匈牙利人的没有任何好事。

我号召所有的真正匈牙利人都回家来，以便与全体人民一起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建设我们的匈牙利！”

拖拉机工厂的调度员卡罗尔·迈耶尔也在同一天回到了布达佩斯。他也怀抱着同样的感情。他也给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兄弟姐妹们！在奥地利期间使我确信了：那边的情况与‘自由欧洲’电台所报导的一点也不一样。我在维也纳遇到过一个刚刚去过萨尔茨堡难民营的匈牙利人，他说，匈牙利人正在那边挨饿，他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良好的工作。他们被尼拉什分子和霍尔蒂分子弄糊涂了。但是，我们匈牙利人不需要这些人，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带给人民的是什么。我在奥地利经受了許多苦难。因此我现在向每个年轻和年长的匈牙利人呼吁：不要再想到外国去。我们应该在这里，在匈牙

利，建設我們的祖國。

我希望那些遠離家鄉的人能聽到我的話。不要害怕回到祖國來，在匈牙利沒有任何流放的事情。我認識許多早已回家來的匈牙利人，他們在家中都過得很幸福。

寫這封信是出自我良心的驅使。”

現實打消了那些不久前還想逃出匈牙利的人的妄想。茱拉·薩波，工學院講師，在11月底與他的一個女學生談話。她老實地承認，她打算到奧地利去。但是剛好昨天她的幾個朋友從那裏回來了。他們都已筋疲力竭，疲憊不堪。他們的關於在異鄉漂泊的痛苦消息使這個姑娘大為震驚：這幾個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竟成了滿身烏黑的礦山工人……於是她放棄了她出走的意圖。

杰爾吉·突涅，制藥廠的一個青年工人，甚至已經到了奧地利的邊境，可是後來終於又回到布達佩斯來了。

“為什麼你不往前走了呢？”我們問道。

這個穿着藍色工作服的，精瘦的，身材不高的小伙子沒有立刻回答。目前他本人已經了解到，他的意圖顯然是不正確的。

“還是在往邊境去的路上，我就時常碰到一些載着從奧地利回來的人們的馬車。當然，我問了他們那邊的情況。我已經感到困惑：為什麼他們突然都回來了？他們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肯定說：‘你這個小伙子，回家去吧……’”

在靠近邊境不遠的松尼市，有一些人卻恰恰相反，他們勸我繼續前進。可是在我眼前站着那些不久前到過奧地利的人，他們的神色告訴我，應該聽他們的勸告……總而言之，我開始考慮起來。怎麼辦呢？最後，我決定回家來。……

从奥地利回来的人日益增多了。这些人在政治上已成熟起来了，回家来与人民一起，使尽管动摇不定，但却已走上复兴之途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恢复正常的生活。

真假工人委员会

当我们在飞机场头一次与工人委员会的代表见面时（读者还记得他叫鲍利斯吧？），我们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根据总工会的建议产生的，因此，它们应该奉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奇怪：为什么飞机场的工人委员会所采取的立场这样不明确呢？它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呢？在飞机场上有一批人工作着（烧锅炉工人、清扫工人），而另一批人则在罢工（无线电报员）……工人委员会主席——就是这位鲍利斯——行为非常古怪。他好象一切都毫无所知，好象一切都是在另一个什么地方，而不是在他的组织内部发生的……

然而，我们在布达佩斯住得愈久，我们与居民的谈话和见面愈多，也就更清楚地了解了这些新的工人自治机构的建立与行动的情况，现在已经有充分根据可以肯定地说，工人委员会，正象一个较大机体的细胞一样，反映了在10月23日以后国内所产生的复杂过程。

最初一批工人委员会的成立时间在它们身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它们是在事件高潮中，——10月底和11月初——也就是当反革命势力在国内猖狂活动的时候成立的。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仆从安插进新的政权机关，而这一点他们往往得到了成功，况且，在头几次选举中，照例仅有少

邀工人参加，随便对准一个企图反对的人加以攻击，往往就被当作拥护这一个或那一个候选人的“论证”了。例如，在“甘茨”造船厂就是如此，布达佩斯的许多其他企业也是如此，在外省中也时常发生这种情况。

许多工人委员会，在一些劣迹昭彰的人物的煽动下，首先成为工农革命政府的反对派，反对政府为了国内生活正常化所作的努力，这是毫不足奇的。举例来说，在布达佩斯第四区车厢修理厂工人委员会中扮主角的是前尼拉什分子帕耳·貝拉，对于这个工人委员会我们还能期待它有其他表现吗？而第1区计划局工人委员会主席費倫茨·凱維西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从前也做过尼拉什党党员，他还能够提出什么良好的建议来吗？他从解除他那机关中的一切共产党员的职务来开始他的活动，这就不再偶然的了，某个叫伏达什的公开反动分子，吉厄尔车厢制造厂工人委员会的首领，也是与凱維西和貝拉相差不远的……

在这些工人委员会中，凡是由工人、正直的劳动者构成巩固的多数的地方，情况就完全不同。政府的政策在那里得到充分的支持。例如我们上面谈到过的那个第4区的制药厂，或者是第9区电灯泡工厂和纺织联合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就曾坚决反对布达佩斯市工人委员会布署罢工的企图。

11月22日，政府颁布了关于企业中的工人委员会的组织 and 活动的法令。工人委员会必须由工厂全体职工在大会上以秘密投票的办法选举出来。工人委员会有着广泛的权利。不久，各个工厂中都开始了改选工人委员会，而这已经是在平静的环境下，在由工人本身广泛参加的情况下进行改造了。

誠然，並不是一切都能立刻正常起來的。有些地方，違反着法令，在機關中成立了工人委員會。那個費倫茨·凱維西以及他的同伙就是非法選舉出來的。在第15區公用住宅管理科中也出現了一個自封的工人委員會，它的頭目是一個曾因偷竊而被判罪的人。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從科長那里取得保險櫃的鑰匙和機關公章。

即使在合法的工人委員會中有時候也混入了一些不應該存在的人。在第19區機器廠的工人委員會中有六名從前的刑事罪犯，兩名前法西斯政黨的黨員和兩名過去的憲兵！

有兩種情況促成了工人委員會的這種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局面。許多企業中的黨組織還沒有鞏固。早先混入工人委員會的形迹可疑的分子目前還在掌權，還在對政變發生着影響。而且，布達佩斯市工人委員會又指示加緊進行選舉運動。這一指示的動機非常明顯：儘速把他們的走狗安插到新的工人委員會中去，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可靠的支柱。

市工人委員會的這一路線並不是偶然的。從它產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想要成為國內的第二個政府。儘管這一委員會只是布達佩斯的，但它卻簡稱“中央工人委員會”。甚至有过建立全匈牙利工人委員會的企圖，可是沒有成功，在12月間所查明的一些事實表明了布達佩斯市工人委員會是在誰的指揮下行動的。

它的首領山多爾·拉茨，從前當過霍爾蒂的上尉……他與他的同伙山多爾·巴里一起把工人委員會變成反革命的工。具。他策導着地下組織，煽動進行罷工，利用誤入歧途的青年散發反對政府的傳單。拉茨和巴里威脅工人委員會的正直的委員們，強迫他們支持自己的決定。

此外，他們还与反革命分子直接进行接触，号召推翻政府，并与“自由欧洲”电台保持密切联系。拉茨長時間地图謀取得发行自己报纸的許可，不难想象，他需要一个合法的新闻机关是为了什么目的]

市工人委员会的秘书是一个姓巴巴依的，他在霍尔蒂政权时期当过一个紡織工厂的总管。他当时曾是法西斯首領薩拉什的积极拥护者，而現在則帮助拉茨制造混乱。

老牌奸細謝別什金在工人委员会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懂得好几种外国語并向资产阶级报纸記者提供情报。很自然的，关于工人委员会举行會議的消息在这些會議还在繼續进行的时候就已经由倫敦和紐約的广播电台加以广播了。

与这几个人相媲美的还有这样的工人委员会委员：因詐騙罪曾被判刑的一个过去的資本家的儿子伊姆雷·涅美什克思·吉什和公开号召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的，瘋狂的反动分子安得烈·美施特尔。

还有什么可說的呢，这一束花放出来的是什么气味，这已经是毫無疑問的了。

政府下令禁止成立区域性的工人委员会，因为这沒有任何必要。12月9日，布达佩斯市工人委员会，象其他区或市的工人委员会一样，由政府下令解散了。拉茨及其同伙不願意走下舞台。他們千方百計地煽动举行新的罢工，可是毫無結果。而这本来就不会有什么結果的，因为工人們都已經相信，布达佩斯市工人委员会并不是他們的組織，它奉行着敌人的路綫，而盤踞在那里的只是一些距离劳动人民很远的人。工人們了解到，每一次罢工都使他們本身的幸福受到損害，使整个国民經济受到打击。

克列孟得·哥特瓦尔德工厂所发生的事件是很有意义的，工人委员会秘书卡罗尔·季波里，前尼拉什分子报纸“乌依·马札尔沙格报”总编辑的儿子，是个瘋狂的反动分子。他与他的伙友詹涅什·马特（过去是霍尔蒂禁卫军中的一員）、費倫茨·赫斯（前盖世太保工作人員）一起，决定支援拉茨及其同伙的号召。他們以恐吓和强暴的手段迫使一部分工人回家去。但是，工人们在次日早晨就把这些挑衅分子赶出了工厂！

各企业中的工人自治机关都在清除异己分子。真正劳动人民的代表，先进的、进步的人愈来愈多地参加了工人委员会的工作。例如，在第9区机米厂的26个工人委员会委員之中就有23个共产党员。这一事实，正象类似的一些事实一样，都说明了一个問題：健康的、正确的、正直的东西一定会战胜的！

生活复苏了

“工作就是生活！”

我們亲眼看到，匈牙利首都的生活每日每时都在变化着。昨天还在举行罢工，可是今天，全市各地已都在工作。昨天在街头上既看不到电车，也看不到公共汽车；而今天，在十字路口上就听到了电车的叮当声以及深蓝色的公共汽车

的喇叭声。

这座城市，好像一个沉重的病人一样，在危机之后苏醒过来，做着深呼吸。危机过去了，事情显然在好转。

“工作！工作！”现在成了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及其未来的基本的、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激动着所有的人。我们在11月23日与市内电车和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人谈过话。一位姓菲尔得瓦的，头发斑白，面孔狭长的运输工人，使劲地挥着手对我们说道：

“不，我们不同意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关于罢工48小时的决定。尽管我们受到阻碍，我们已经工作，而且还将继续工作……最近，在埠际公共汽车修理厂的主要车间的大门口站着几个武装人员，不让工人到车间里去。

伊妮雷·卢斯齐格，一个脸皮粗糙，并蓄有剪得很短的胡鬚的年纪较大的司机打断了他的话：

“这算什么，匪徒们把我们几个司机都打死了，推翻了他们的汽车，这都是因为他们随意工作的缘故。如果一个司机窃駕駛盤伸过手去，难道说还能够阻止他吗！”

“他说得对，”贝拉·科薩什，一个黑头发的中年男子支持司机的意见，“电车在开行，而且还将继续开行。”他在这样说的時候，他那茨冈人的黝黑的面孔上現出了几乎是威吓的神气，“如果电车不行駛的話，工人怎么到工厂工作去呢！”

“工作！工作！”这样的话在这一时期到处都傳播着。我們看到玻璃窗上橫貼着用白顏色塗写的字体瀟灑奔放的標語：“打倒通貨膨脹——工作吧！”維列施·馬爾蒂廣場上停着一輛旧公共汽車，在它那寬大的車尾上写着：“罢工

——这就是飢餓和貧窮。工作吧！”在貼在牆上的大小象一張鋪開的報紙的紙塊上，我們讀到了用墨水寫的一付標語：“不勞動者不得食！”房屋的牆壁上貼滿了用玻璃版印刷機印成的比學習筆記本還小的五光十色的小紙條，上面的圖畫和標語都說明着同樣的意思。有的畫着一個小孩坐在父親的膝蓋上說：“爸爸，想一想我們吧！工作吧！”有的畫着一個婦女拿着提包，帶着兩個孩子在小攤販旁邊走過，小攤上擺着蘋果。說明上寫着：“難道你願意蘋果賣1,000福林一斤嗎？工作吧！”有的畫着一個民警人員抓住某位可敬先生的衣領，上面寫道：“又少了一個投機商！”畫有諷刺性的以及嚴肅的圖畫的類似的標語很多，以致沿着街道兩邊都是白色的斑點。有一些標語用紅色鉛筆勾畫出來，有些被撕毀了一半。這當然是出自不願意人民工作的挑釁分子之手。我們在兩三個地點看到用打字機匆忙打出來的，對罷工者的号召，上面寫着大字：“工作吧！”

市內顯然活躍起來了。側面畫有方格條帶的小汽車疾馳而過——這是市內頭一批出租汽車。裝載肉類、面粉、建築材料的卡車行駛着。街頭上買賣很興隆：賣書、賣皮帽、兒童玩具、有着柯樹特〔注〕徽記的獎章、冰糖做的公雞以及淺紅色的煙斗。

奧克托閱廣場上的婦女服裝店很擁擠，我們費了好大力氣才找到經理，他在櫃台後面張羅着，幫着售貨員的忙。胖胖的，中等身材，穿着藍色布工作服的山多爾·巴拉對我們

〔注〕柯樹特（1802—94），為匈牙利民主革命領袖之一。1848—49年間，他與偉大詩人裴多菲領導了反對封建地主制度和爭取獨立、反對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革命鬥爭。

叙述說：

“在混亂期間，強盜們打破了商店的櫥窗，劫走了他們能够拿得走的一切東西。九天以後我們又重行開了張，而現在買賣比以前做得更多了。”

這時候他有事出去了，一個淺色頭髮的年輕女售貨員，瑪麗姬·法爾卡施與我們繼續談話。她一面羞怯地微笑着，一面告訴我們，不久商店就要運來新的貨物了。

“一切都在好轉，”她說道，“只可惜我的小兒子拉斯洛還沒有能上學去……”

透過一小塊櫥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走過來觀看直接貼在玻璃上的傳單的人們臉上的表情。人們的臉上帶着微笑。這塊紙上寫着什麼呢？我們在走出商店以後讀到如下的句子：“爸爸和媽媽，快到樅樹節了。我們需要玩具。工作吧！”

是的，這個意味深長的語句顯然已經肯定地在市內占了上風。

11月24日（星期六）乃是一個轉折點。布達佩斯的勞動生活開始了，滿載乘客的公共汽車和電車一清早就在各街道上行駛了。工人們忙着去上班。到機器旁邊工作的人比罷工以前多得多了。至少有11,000工人進入了“切佩爾”冶金聯合工廠的大門。幾乎所有的紡織工人都到“沙羅克沙拉”紡織聯合工廠去上班了。“馬瓦格”工廠、“甘茨”工廠、電燈泡工廠和山區設備工廠有一半工人已上班工作了。市內有許多區全部企業都開工了。

使匈牙利愛國者歡欣鼓舞的不僅是這一些，“切佩爾”在11月23日生產了價值40萬福林的产品，而星期六則已經生

产 150 万福林的产品了。化学工厂在 multi 停工以后第一次传来了汽笛声。“馬瓦格”二厂的工人把召号停工的挑撥者赶出了車間。电綫工厂也开始进行生产了。

我們在这一天到过布达佩斯的好几个区。第 14 路和第 16 路電車在第 4 区行駛了；第 14 路的第 55 号和第 104 号公共汽車在第 14 区行駛了。这两个区内的所有食粮和日用品商店都开张了，所有的机关、政府部門、修建机构、办公处和劳动組合都开始工作了。

布达佩斯的中心区，象任何大城市的中心区那样，挤满了人。有許多笑盈盈的人，有城市所特有的种种喧囂以及那种活跃的市面，这种活跃的情况足以說明：人們怀着希望和信心看着明天。

如果有一种可以測出某个城市脉搏的器具，那么它在布达佩斯就会指明，脉搏是愈来愈平稳了。不过，即使沒有这种器具，这一点也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我們看到路人回家甚至都要比前一天晚上迟得多，几乎是在晚上，在暮色四下之际还有行人。馬路和广场上，公园和街心花园里的明亮的玻璃珠似的电灯重又大放光明了。電車和公共汽車延長了两个小时。无軌電車在通衢大道上行駛着。商店旁边排队的行列已开始变短，后来則完全沒有了。在被毀坏了的房屋旁边出現了建筑工人，自动卸貨卡車又开始咕嚕咕嚕地响起来了。堆成小山的紅色磚堆愈积愈高。青年突击队出动去清扫街道了。在被破坏的电車道上可以听到铁錘和十字鎚的鏗鏘声，沉重的电綫捆滚动的声音。甚至那些最初聚集在修路工人附近的好奇的头兒們，現在也都毫不动心、不以为奇地走过去了。在星期日(11月25日)，我們在車站附近听到了火車头

的汽笛声：旅客列車开往外省去了。

大白天，街上的人群减少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开工了，所有的工人都上班了。

煤炭很困难，电力不足。但是有着主要的东西——工作的願望。劳动效率每天都在提高。当然，切佩尔又走在前面了：11月28日煉鋼工人在許多天以后第一次几乎完全达到了生产定額！11月29日他們被第19区的紡織工人超过去了：每日的生产定額他們完全达到了。又过了几天以后，布达佩斯对这些消息已經不感惊奇，而仅仅是感到欢欣了。

这种日益加速的生活节奏現在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了。我們还在莫斯科时就已經听說，布达佩斯市工人委员会在它那不光荣的結束以前曾企图再一次阻碍国内經濟的恢复。該会宣布了罢工。可是，尽管有着动用了武器的反革命地下活动的积极支持，这个号召在絕大多数工人中間並沒有得到支持。

最近来自匈牙利的消息說明，这个国家的生活已經一往直前地走上了复兴之路。

“切佩尔”鍋出爐了

“切佩尔”联合工厂位于距城几公里的一个同名的島嶼上。大卡車迎面駛来，令人联想到水虎的三輪小汽車和被泥水濺得成了灰色的摩托車在奔馳着。剛才落下来的雪花在車輪下融化了。在道路的左右兩側，在半溶的白雪形成的許多小島上，有很多沒有收割的白菜呈現着鮮綠的顏色。

“看，切佩尔冒烟了，”司机說道，一面使着眼神示意

矗立在前面的几十个烟筒。

是的，这是切佩尔重又冒出烟来的第几天了！……它不仅是个工厂，而且是由十八个企业组成的联合工厂。这里生产摩托車、鋼材、縫紉机、鋼管、自行車、鑄造物以及其他許許多多東西。这是匈牙利最大的一个企业。

切佩尔的烟筒冒烟了！……这对于国家、对于重又开始劳动的人民，今天有着多么大的意义啊！……

寬肩膀、健壯的費倫茨·赫吉——联合工厂的副厂长——使劲与我們握了握手，立刻就津津有味地与我們談起来了。

“你們当然会对今天有多少人上班的事感到兴趣，是吗？在25,000人中已有14,000人上班。这已經很好了。”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上班工作呢？”

“噢，这有許多原因。第一，电力和燃料不足。并非所有的工厂都能开工。第二，运输情况还不太好。第三，我們只不过在不久以前才与工人委员会談好，讓工人上班工作。我們爭辯过很久。临时工人委员会贊成罢工，而厂方和大部分工人則主張工作。就这样，整整一个星期也沒有达成協議。現在已經談好并建立了联系，”赫吉接着說道，“要知道，有許多偶然分子混入这些临时工人委员会中去了。”

“在这些委员会中也有坏人嗎？”

“当然有罗。党已开始影响这些委员会，这是很重要的，首先应该热爱自己的工厂。这是主要的……”

他走到窗戶跟前，打开了窗帘，若有所思地望着厂院，这时給他做翻譯的是一个年輕的，有点羞怯的鋼管制造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叫乔治·奧蘭涅，俄文很精通。他于六月間

从斯維尔德洛夫斯克回到切佩尔，他在那里的大学毕业了。

“我在这个联合工厂工作了20年，”赫吉朝我們轉过身來說道，“我对工厂了如指掌。我热爱它，我为我們的切佩尔在混乱期間沒有受到苦难这一点感到很幸运。10月23日，有一伙人冲进了热电站并要求热电站停止发电。你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嗎？破坏热电站，——这就是剥夺布达佩斯的电力。我們把匪徒們赶跑了。260名工人在联合工厂里守卫了11天。我們徑直把冲进工厂的那伙武裝的挑衅者驅逐出工厂去了。

你們問，我們現在需要什么？我們需要煤炭和电力。應該使矿工懂得，他們的采煤工作還沒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最近我們正等待着第一批运苏联煤的駁船。其中要有四分之一立刻交給热电站，其他則交給煉焦厂。那时候我們就可以完全开工了。四座馬丁爐現在只有兩座工作。

我們走进了馬丁爐車間。这个煉鋼的地方有兩種鮮明的对比使人感到惊奇：一方面是灼热，另一方面是由敞开着的通风小門吹来的冷气：一方面亮得刺眼，另一方面是燒得烏黑的爐蓋。爐旁正在进行热火朝天的工作。技師，一个头戴油污的氈帽，有点駝背的高个子，打开了金屬的栓塞（他沒有說他的名字，而且执拗地請求我們不要打听他的姓氏）。

一股光芒四射的金屬从小鑄杓流到一个正方形的东西中。四周都是兴高彩烈的，臉被烤成紫紅色的煉鋼工人。

伊斯特万·日达，一个身材短粗的年輕的煉鋼工人，欣然地與我們交換着对过去事件的各种印象。

“現在我們这里已經沒有不願意工作的人了。几乎所有的人都願意工作，應該糾正过去的錯誤，——这是主要的。

我們的雙手是從來也不會感到疲乏的。”

頭戴氈帽，有點駝背的那個技師肯定地說道：

“應該首先提高工資，然後再開始工作。”

“可是為了多掙工資，就應該多做工作，”雅諾什·貝達堅決反駁道，一面把他那付深藍色的眼鏡推到帽沿後面去，“否則國內就要通貨膨脹了。我們已經在戰爭年代受過它的苦處了，謝謝吧！”

駝背的技師皺了皺眉，可是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

“應該由工人委員會來改選廠長。”他繼續說道。

“可是我認為，應該首先建立真正的，而不是臨時的工人委員會，”伊斯特萬·日達說道，“工人委員會不應混水摸魚，而應該幫助搞好共同的事業。要知道，在許多工廠里已經建立起這樣的工人委員會了。”

“不，應該首先改進工廠的工作，”站在遠處的雅可布·菲門尼爾，一個很胖的老頭說道。

他微笑了一下，他那聳立如錐的灰白色胡鬚顫動着。他今年62歲，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這裡，在切佩爾工作。當我們走到他跟前時，他彎下腰來，問我們說：

“聽說你們蘇聯頒布了一個關於養老金的新法令，是嗎？我原來已經打算要靠養老金過日子了，可是仍然到馬丁爐前面來了。等我們把情況改善以後，我就要去休息了。”

整個這一段談話，是短促而有間歇的，是在馬丁爐掀蓋的間歇時間里進行的。煉鋼工人三三兩兩地聚集了幾分鐘，然後重又分散到爐旁的各個崗位上去了。

開始出鋼了。身穿石棉衣服的煉鋼工人打開了熔液出口。熾熱的金屬的瀑布傾注在對着馬丁爐的出鋼口的一個大

漏斗里。切佩尔鋼象一条瀑布，火星四濺地流了出来。我們与煉鋼工人們一起瞧着初生金屬的生命之火。

傍晚了。連續不斷的人流涌出工厂的寬敞的大門，挤滿了整個廣場。有一些人扒在挤得滿滿的电車欄杆上，另外一些人騎上了自行車，在挤滿了行人的街道口前進，还有一些人要求搭乘过路的卡車。

切佩尔的工人在前進。在成千上万的工人背后，一个个烟霧了繞、高聳入云的烟筒矗立着。匈牙利人民的緊張的眼睛都在怀着希望和次欣望着这些烟筒。

欢乐的預言

在一个星期日，12月25日上午9点鐘，切佩尔工人俱乐部的沒有生火的大厅里挤滿了人。有三百多人——这座联合工厂的党的活动分子——都到这間大厅里来了。在这一段時間里有多少令人兴奋的事情啊！这許多人在一个痛苦的漫长的时间里彼此都不認識，而今天第一次聚首了。

党的区委書記德查·古什同志也很激动，他宣布开会。他談到應該團結党的一切力量来完成各种新的任务。

“不應該使工人階級失去党的领导，特别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刻，”省委書記貝拉·比斯庫同志繼續着他这个意思說道。

把党恢复起来，领导劳动人民为恢复国家的經濟而斗争——这种思想占有了厅內每个人的心头。有一些黨員到講坛上去講了話，他們講得很热烈，很热情。

“應該与轉入地下的反革命坚决进行斗争。我們必須緊

密地團結起來，必須把整個工人階級都團結起來。”

“我們應該表現出組織性和工作良好的榜樣來！”

“我們唯一的道路就是社會主義的道路，馬克思——列寧主義給我們指出的這條道路！但要考慮到我國的特點！”

“蘇聯軍隊在1945年把我國從法西斯主義手中解放出來，”切佩爾的老工人，運輸機器廠的伊姆雷·巴吉說道，

“蘇聯軍隊現在又把我們從法西斯主義手中解放出來了。蘇聯戰士紀念塔竟被那些肆無忌憚的亡命徒給破壞了。我提起這事來就感到痛苦。恢復這座紀念塔是我們的神聖的責任。我提意向那些為我們而犧牲性命的人們起立致敬！”

頓時，全場都靜默下來了。

想要發表自己關於黨，關於國家的命運的想法的人很多。切佩爾的黨的活動分子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支持工農革命政府，盡一切力量使“紅色的切佩爾”的過去的光榮不被沾污。

“自由人民報”——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機關報——在此期間寫道：

“在過去幾周的狂潮中產生了一些新的機關，他們的作用我們目前還不能充分予以估計。但是，它們無論如何不能夠代替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不僅體現着匈牙利的，而且也體現着整個國際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的百年來的經驗。人們需要並期待這樣的黨。勞動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的優秀兒女，感覺到了它的必要性。這些工人階級的優秀兒女在過去曾始終不渝地與各種錯誤進行鬥爭，堅決反對各種罪行。他們認識到，如果黨的活動廣泛展開了，那麼生產狀況就會得到改善，我們就可以沿着通往美好的未來的道路

前进……”

我們將把黨重建起來，整頓好自己的隊伍。組織性給我們以力量。只要新的黨一採取有組織的行動，它就已經成為一個力量並能夠完成自己的使命——領導工人和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

在國內各個地方——在工廠和礦山，在機關和企業，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國營農場——都恢復了黨的組織。社會主義工人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目前我們還沒有新的黨章，它將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產生。現在，執行委員會確定了入黨的手續。它規定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它遵行列寧的學說。

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首先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它吸收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以及一切為獨立、自由、社會主義的匈牙利而鬥爭的人們加入自己的隊伍。

一切不稱職的，不會和不願意與人民建立密切的、經常的聯繫的工作人員，都從黨的領導崗位上被撤掉了。然而同時，“自由人民報”寫道，“我們應該堅決反對借口與拉科西和格羅的政策作鬥爭而將成百成千忠實的，大家所尊敬的，來自工人中間的黨的工作人員、廠長以及來自工农的蘇維埃主席、軍官等解除職務。如果我們不停止這種做法，我們就會失去自己的優良幹部。如果我們自由放任地實行蠱惑人心的口號——“撤換一切人”，就會破壞黨內和國家生活上的一切，其結果則是在那些老的，久經考驗的工农幹部的崗位，正象已為若干現象所証明的那樣，可能輕易地被那些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所奪取。”

是的，反革命勢力現在正千方百計地阻礙工人階級政黨

的恢复。前匈牙利劳动党的党员时常受到恐吓，说什么如果他们重新宣布自己的党籍的话，就要受到报复。各级党组织的建立与工作的开展都受到了反动分子的阻碍，特别是在他们对工人委员会有影响的地方更是如此。可是劳动人民的敌人是毫无办法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队伍反而日益扩大了。进行了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许多工人和农民，对所发生的事件了解得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刻，因而提出了入党的申请。就在不久以前，在12月初，有一群工人去找布达佩斯第8区橡皮工厂的党委书记。他们说，他们仔细地研究了政府的政策以及它的宣言之后，现在已下定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了。

国内的一切正直的力量都团聚在党的周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为人民的更好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他们的威信正在日益增长。

党的组织的话，作为国家全面复兴的欢乐的预言，已经显得愈来愈加有力了。

代 跋

我们尽力象文献纪录那样确切地叙述了匈牙利所遭遇到的最困难的日子。

生活在前进。生活是停止不住的。不管国际反动派怎样努力，是不可能把生活的洪流，强大而有力的生活的洪流，推向后转的。

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坚持下来了。匈牙利走着建设社会主义（照顾到民族的特点）的道路。前面还有一段巩固人民政

权、纠正过去错误的艰难的道路。匈牙利人民还面临着与转入地下的反革命残余进行长期斗争的任务。

匈牙利人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这种工作和斗争呢？

有的，匈牙利人民有着足够的力量来建立新的生活！

在本书结束时，我们愿意不加任何删节地全文引述布达佩斯普通工人伊斯特万·瓦沙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他本人要求在苏联报刊上发表的：

“我们这里有成百成千的正直的工人与我的想法一样，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生活在他们中间。

亲爱的苏联朋友们！

我以自豪的心情回想起你们的优秀儿女，他们勇敢地保卫了我们工作的成果，保卫了我们的自由，我所写的这儿行字乃是我和其他正直的工人共同亲眼看到的真实的情况。

当示威游行开始时，就已经有武装的法西斯匪徒混入了示威者的队伍。他们向士兵、警察射击，向人民射击，许多正直的人都牺牲了。

在示威游行时就已经传出了敌对分子的口号：“把土地、工厂、银行都归还旧主！”正直的工人这时都离开了示威者的队伍。

我的一个朋友叙述说，在街上，有一个匈牙利话说得很不好的人走到他跟前，通知他说，在马尔吉特岛上停着一辆卡车，在车上的稻草下面有一些特别的工具，也就是武器，可以使用。

前霍尔蒂军官和德国党卫军分子每天都在进行凶杀。他们把在街上遇到的那些正直的工人杀掉了。

有着这样一些情况：把人从高楼的窗戶里扔出来，而他

的全家都被杀死。首先割掉他們的耳朵、鼻子，然后砍断胳膊，再用同样的方式扔下去。另一些人被吊了起来，用刀子切开胸膛并把心臟挖出来。还有这样的情况：两个人在一起被活埋。人們在他們上面埋上土，当他們还蠕动的時候，就在他們上面踐踏。

我看到在伏罗希洛夫街上有兩個人被用繩子捆了起来，然后往他們身上洒上煤油，点起火来。当时有一个外国記者在場，他惡心得吐了一口唾沫。

我的一个朋友也曾看到，在巴尔托克·貝拉街上第23号楼房旁边，有一些戴着臂章的武裝人員向他們所看到的一切人射击。他們打碎了櫥窗的玻璃，进行搶劫，拿走了衣服和其他商品。

列宁街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法西斯匪徒扒掉了工人們的皮大衣。他們在搶劫以后燒掉了商店，像这样的事情我还能講出許許多多。

法西斯匪徒們得到美国外交官員的汽車的帮助。他們从这些汽車里得到一些小包裹，里面是武器和手榴彈。

你們苏联的优秀儿女，与法西斯匪徒們进行着斗争，总是保护人民和包括教堂在內的各种文物。你們的士兵給居民分发罐頭、面包以及其他食品，而法西斯匪徒則向領取这些食品的人們射击，他們杀死了3个小孩和一个年近60岁的老人，有一个苏軍战士也牺牲了。这一切都是发生在阿卡茨佛街上的。

当布达佩斯市宣布停火后，法西斯匪徒們又开始向苏軍战士以及居民射击。但是你們的軍官和战士們都沒有还击。

我們匈牙利的工人都愛戴苏联人，今后也永远愛戴你

們。對於你們的士兵駐紮在匈牙利的國土上這一點，我們並不生氣，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國內還有許多隱藏起來並進行反動宣傳的法西斯匪徒。他們在於這種勾當時得到了美國方面以及英國外交官員的幫助。我們親眼看到，有許多匈牙利的法西斯匪徒坐着外交官員的汽車在街上走。如果你要看一看是誰在進行反動宣傳，那你就會完全清楚了——這都是些經常在飯館里游蕩的游手好閑之徒，都是那些資本主義制度的忠實奴仆。

我寫這一切話都是為了讓正直的人士以及全世界都了解一下在我們匈牙利國土上所發生的事件的真相，讓他們了解一下西方法西斯主義者都企圖對我們祖國以及勞動人民干些什麼。

法西斯分子聲稱：‘在蘇聯軍隊離開匈牙利以後，我們將要一切從頭做起，將比從前干得更聰明，更有組織。’他們希望從西方得到更大的幫助，說這樣一些話的人乃是前霍爾蒂軍官、工廠主和資產者。

我們工人在這一時期學到了許多東西，我們將更緊密地團結起自己的隊伍來反對法西斯分子，我們要把他們從自己的隊伍中驅逐出去。

親愛的蘇聯朋友！

感謝你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要求你們繼續幫助我們驅逐法西斯分子和人民的叛徒，以便使我們的人民重過幸福的生活。

我本人從來也不曾是一個共產黨員，可能將來也不是，然而每個正直的匈牙利人都會像我這樣說的，我在‘甘茨’車輛製造廠工作，你們會很清楚地知道這個工廠，因為你們

当时曾帮助我们重建这一工厂。

感谢苏联政府和苏联领导人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以兴奋的心情讀着这封信。在信內可以听到匈牙利人民的真诚的呼声！